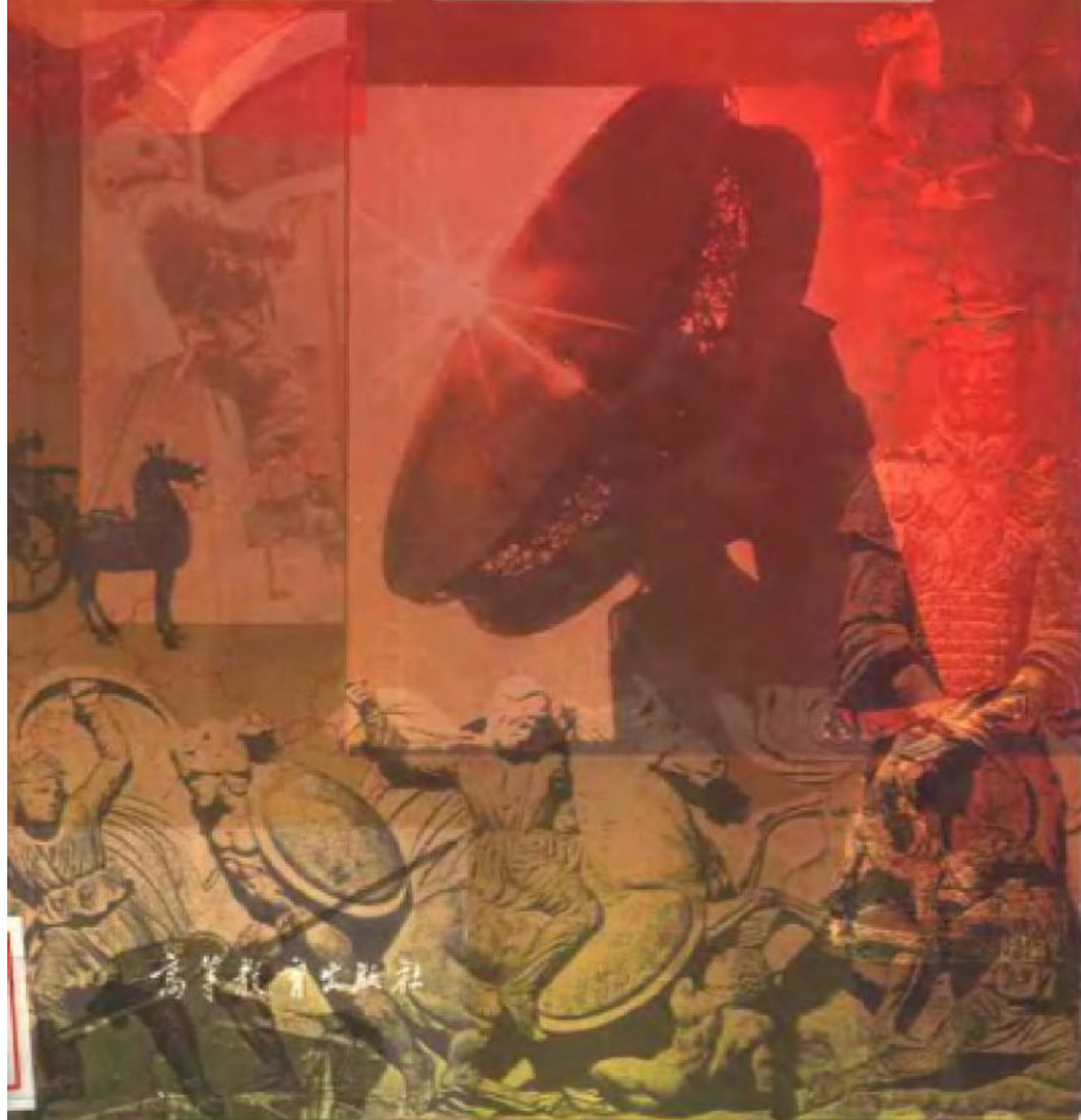


史学概论

● 庞卓恒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教版历史专业系列教材

——适用于高校本、专科、中学师资培训、教育学院、
函授和自考

书 名	主 编
史学概论	鹿卓恒
中国古代史(第二版)上册	唐子庆
中国古代史(第二版)下册	唐子庆
中国古代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唐子庆
中国近代史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	蒋世弟 吴振棣
中国现代史 上册	王桢林
中国现代史 下册	王桢林
中国现代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	王桢林 郭大钧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上册	赵波元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下册	赵波元
中学历史教学法	于友西
世界上古中古史(第二版)上册	朱 寰
世界上古中古史(第二版)下册	朱 寰
世界上古中古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	朱 寰
世界近代史	刘宗绪
世界近代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	刘宗绪
世界现代史	王斯德
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	王斯德
世界当代史(1945-1991)(第二版)	王斯德 钱 洪
世界现代—当代史辅导与习题	本书编写组
世界当代史参考资料	王斯德 钱 洪

ISBN 7-04-005324-1



9 787040 053241 >

定价:9.00 元

史学概论

庞卓恒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概论/庞卓恒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2001 重印)
ISBN 7-04-003324-1

I. 史… II. 庞… III. 史学理论-高等教育:电视
教育 教材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975 号

史学概论

庞卓恒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8.5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0 次印刷

字 数 220 000

定 价 9.0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请与图书供应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史学概论是为适应卫星电视教育历史专业的需要而最新编写的教材。内容包括历史和历史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学科结构,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历史认识的过程、层次和检验,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历史研究的方法、表述形式,历史学的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并附有复习思考题和参考书目。全书对史学理论作了简明扼要、具体生动的阐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对提高学生的史学理论水平和实际研究水平将起较好的作用。

本书还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专科、教育学院和函授的教材,并可供自学者学习参考。

前 言

这本《史学概论》是为适应卫星电视教育需要而编写的教材。在内容安排上,我们力求与《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相吻合,同时也根据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史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际发展的要求和有关学术研究的新的进展,做了相应的调整。为了使教师和学员在使用本教材时便于把握各章节的基本内容和教学要点,在每节的末尾附有复习思考题。学员可利用复习思考题作为掌握各章节基本要点的线索,教师则可围绕复习思考题进行教学辅导和考核学员对本课程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

本书基本理论观点的阐述范围,大体上涵盖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专科《史学概论》教材的主干内容,而在阐述方式上,为适应卫星电视教学特点,尽力做到深入浅出,力求以明白易懂的文字,多运用具体实例,来阐明基本的理论观点,以便于学员在不易有较多面授机会的条件下,也能以自学为主掌握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因此,本书也可以供师专、教育学院、函授和广大自学读者使用。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成果,各章作者和所在工作单位如下:

第一、二章:朱卫斌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第三章:王渊明 杭州大学历史学系

第四、七、八章:张耕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第五章:庞卓恒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第六章: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全书由庞卓恒统改定稿。

我们由衷地欢迎对本书的缺陷或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意见。

编 者

1991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和历史学	1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2
一、历史与历史著述的区别和联系	2
二、历史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	6
第二节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	13
一、“科学”与“艺术”之争	13
二、历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 科学	20
第二章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学科结构	24
第一节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4
一、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24
二、历史学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30
第二节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36
一、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37
二、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39
三、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45
第三章 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48
第一节 古代、近代的中国史学	48
一、中国古代史学	48
二、中国近代史学	60
第二节 古代、近代的西方史学	64
一、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学	64
二、西方近代史学	7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史学	80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与早期发展	80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	87
三、当代西方史学	91
第四章 历史认识的过程、层次和检验	97
第一节 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97
一、历史认识的主体	97
二、历史认识的客体	102
三、历史认识客体的三个层次	104
第二节 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	106
一、“鉴往知来”与历史认识的开端	106
二、历史认识的形成	110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真理及其检验	112
一、历史认识的真理及其检验层次	112
二、历史认识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17
第五章 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126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125
一、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125
二、社会历史观转化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128
第二节 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	131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131
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	142
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上的文化现象	155
第六章 历史研究的方法	164
第一节 搜集史料史实和辨识其是非真伪的方法	164
一、史料搜集的方法	164
二、史料辨伪的方法	167
三、史料校勘的方法	169
四、史事的考证	171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新方法	177
一、比较史学方法	177

二、计量史学方法	182
三、心理史学方法	187
四、口述史学方法	193
第七章 历史认识成果的表述	199
第一节 史学著述的体裁和体例	199
一、史学著述的体裁及其演变	199
二、史学著述的体例	205
三、史学著述的语言	209
第二节 史学著述的撰写程序	215
一、研究课题与写作大纲	215
二、史料的积累和整理	220
三、札记和论文的写作	226
第八章 历史学的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231
第一节 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历史学的功能	231
一、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231
二、历史学的功能	235
第二节 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使命和基本素养	245
一、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45
二、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253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64

第一章 历史和历史学

有位史学家新言,给“历史”下定义比撰写史书还难。甚至有人说,古往今来,有多少位史学家即有多少种关于“历史”的定义。此乃极言“历史”之难以把握。确实,“历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经常被模糊地在几种意义上使用着。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里是很难见到的。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这里,“历史”显然指过去发生的一切;“要尊重历史”,即是尊重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强调今天的言行必须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但是,我们又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既然发生于过去,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历史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复活,那它怎能告诉我们以经验呢?这里的“历史”是指用文字写成的历史,它相对于客观的历史而言,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包含着人的好恶是非、价值判断。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实际上读的是写成书面的历史。因为历史事物和过程发生于过去,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可能读到它。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对历史的阐述,即历史书。

除上述两种意思外,“历史”还可以指一门学问、一门专业、一门学科。某大学生说“我是学历史的”,他实际上是把“历史”视为一门学科、一门专业。某史学工作者说“我是搞历史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可见,“历史”一词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与过程,即客观历史本身;二是指有关过去的记录与研究,即历史著述,即是经过人脑的思考、加工而形成的主体化的历史;它还指一门学科,或一门专业。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对“历史”一词的这三层基本含义认识不清,即

即使是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著述也往往混淆了三者的区别。

在“历史”的第二层含义,即主体化的历史中,也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指对过去的记录,即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的历史记录;一是指对历史事件或过程阐述观点或看法的著作,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但一般说来,这两方面的划分界线十分模糊,因为没有纯粹的不反映记录者观点的客观史料。任何历史记录都或多或少渗透着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比如《史记》,我们今天把它当作重要的史料来利用,但实际上,《史记》里对一切史事的记述都包含着司马迁本人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它是一部历史学著作。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一、历史与历史著述的区别和联系

历史,广义说来,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它是一切事物固有的属性。没有无历史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给历史界定过范畴: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①

相对于广义的历史而言,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史即是狭义的历史。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就是以这狭义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它发生于过去,而与现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绝不会因任何人对它们加以否定或肯定而改变其存在。

历史著述则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和性质。所谓历史著述,是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历史记录者、研究者、认识者通过对客观历史的记录、描述、研究而形成的历史书籍。它是客观历史经过记录者、研究者的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含有主体烙印的历史。

历史著述以其主体对客体反映的程度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历史记录属于初始层次，它是对历史事物、现象的记录，其基本特点即是侧重记人、记事、记物，而较少分析其因果关系或相互联系；史学著作则属于较高层次，它是历史认识者、研究者通过对历史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把握，借助于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对包括历史记录在内的各种史料进行鉴别、分析而达到的对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相互联系或性质、特点等等的认识。所以，严格说来，初始层次的历史记录还谈不上是历史学著作，而只是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

历史著述与历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实际上人们却经常把它们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甚至在部分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存在这个现象。70多年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在强调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时指出：

“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资治通鉴乃至 Herodotus, Grote 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①

①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198页。

可见,李大钊已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活生生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著述是两种意义、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通常既用来指客观的历史事物、现象和过程,也用来指历史著述,因而极易导致历史一词不同意义的混用。如果我们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分别以历史、历史著述来指称历史一词的这两层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一词产生误解。

地球上自有人类出现以后,便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然而,人类历史与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记述却并不同步。人类社会的历史据估算已有 300 万年左右,但人类的文明史即文字产生以来的历史却不过五、六千年。只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才开始用文字记述自己的史事。历史本身是活生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而历史著述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和反映。前者是客观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向前运动发展着;而后者则是主观认识的产物,反映着人们对历史过程的看法。所以,历史与历史著述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是,强调历史与历史著述之间的差异,并不排斥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被加工原形”与“加工产物”的关系。任何历史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客体历史本身,即使是经著述者本人故意歪曲了的历史著述,也在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折射着历史的真实。

先看看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情况。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 460—前 396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即是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公元前 431 年至前 404 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争夺希腊的霸权,爆发了战争。修昔底德亲历了这场战争,并曾作为雅典十将军之一指挥过色雷斯一带的军事行动。所以,这场战争对于他来说即是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史。修昔底德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固然也难免在描写某些情节时添加他自己的主观意图,但总的来说,他是以严肃认真、批判求真的态度来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

的。他为了写这部书，曾广泛游历，实地考察，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对于目击者的讲述、传闻从不轻信，总是做一番考证、辨析工作。正由于他的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当代人写当代史可以写出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著作。那么，后代人写前代史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举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史记》涵盖的时间跨度达 3000 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西汉武帝在位年间，既有当代史的记述，也有前代史的描写。《史记》中有关当代史的记述，其可信程度已有定论。即使是前代史，其可信程度也很高。因为，《史记》中对前代史的描述并非仅凭想象、推测。它是以大量的口碑资料、实地考察、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在作者本人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了删抉选择。这就决定了它对前代史的撰述仍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真相相吻合。

我们说当代人写当代史或后代人写前代史都可以写出在不同程度上符合历史本体的著述来，为什么说经著述者故意歪曲过的历史著述也在不同层面上折射着历史的真实呢？一般来说，经著述者本人故意歪曲的历史著述，其提供的历史信息是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它提供的是一些矛盾的、扭曲的、虚假的信息。我们通过对矛盾的、扭曲的、虚假的信息进行破译、分析，就会得到隐含在里面的真实的历史图像。比如，在明朝官修史书中，我们看不到朱元璋与明教、小明王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经过篡改的、歪曲的史料。因为，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后，认为他先前与明教、小明王的臣属关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便极力抹煞、销毁这一方面的史料。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种历史动因背后对歪曲的史料进行剖析，恢复它所折射的历史的初始面目。

由此可见，历史著述是以客观历史本身为基础、为反映对象的，离开客观历史本身，历史著述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决定了历史著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客观历史的真相相吻合。但无论如何，两者的吻合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一致。这是由客

观真理的绝对性与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决定的。

前面说过,历史认识者、研究者不可能直接接触已经过去了的活生生的历史,他所能接触到的直接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历史本身,而是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历史的残留物,比如遗址、遗迹、遗物、文献资料等。这些残留物绝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本身,它们与昔日存在过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真实相比,何异于九牛一毛!残留物与历史本体在数量上、质量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切,不可能复原历史的全部。但是我们却可以弄清历史长河中的某些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风俗民情,并进而对历史运动的整体作出规律性的把握。但即使是这些可以弄清楚的部分,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认识它、穷尽它。因为无论哪一个认识者、研究者,都难免会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方面、在对历史资料的考察研究方面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善。所以,任何历史著述在真理性方面只能相对地接近客观历史本身,这个接近可以是无限的,但绝不会重合。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历史著述有时会背离客观历史本身。人为的、故意的歪曲、篡改、伪造历史且不说,即便是作为严肃的研究成果的历史著述,也难免与历史本体发生背离。这也是由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决定。如史料不足,会导致研究者作出错误的推测、判断。由于阶级立场或政治立场的局限往往也会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战争、革命问题所作出的错误分析和结论即是明证。时代的局限也会制约着人们的认识能力,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史观长期占据着历史观的核心地位,这使基督教史家不能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描述。此外,诸如人们的认识水平、能力大小、搜集和驾驭史料能力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对客观历史的正确描述。

二、历史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

历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

过程。

有了人,就有了人类历史。据考古资料推测,人类历史大约有 300 万年了。在此之前,地球上只存在着自然界。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变化的产物。

300 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演化。开始时,人类刚学会直立行走,只能使用简单的天然工具,比如,以木棍和石块挖植物的根或捕杀野兽。后来又前进一步,发展为打制、磨制石器,出现了青铜工具。人类的生活方式逐渐由狩猎变为农耕,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形成村落。氏族组织也完成了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氏族内部及部落之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出现了私有财产、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现象。这样,原始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随之出现了阶级、国家、文字,人类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自阶级、国家出现后,阶级斗争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事物、现象都是历史的一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无论今天的人们是否认识到它,是否承认它,都丝毫不能改变它曾经存在的事实。

比如我们说,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公元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欧洲大战爆发。这些事实都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今天的人们,无论怎样看待它们,都不能改变它们的客观实在性。

一般来说,要人们承认只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不会太难。但是,要人们承认历史事物和现象的原因、性质、特征、因果联系,人类历史的发展循着一定的规律前进等等具有客观实在性就比较困难。事实上,不仅一些单个的历史事物、现象具有客观实在性,历史过程本身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这一过程有自己的运动

规律,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都无法改变这一过程的运动轨迹。

所谓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和确定不移的趋势。当然,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这就使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充满着人的主观因素。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①为什么作为人们按各自目的、意图进行活动的结果的社会历史,其进程会具有客观必然性呢?这是由人类历史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单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尽管是有目的、有意图的,但是,每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必然会受到其他人的不同的目的、意图的制约。因为,每个人只有与他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否则,他的活动即不具有社会性。正是由于创造历史的每个个人都抱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意图,这些不同的个别意志互相制约,互相抵消,才使得作为每个人共同活动结果的历史进程出现不以任何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另一方面,各个个别不同意志也可以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合力”,而这个“合力”所最终起作用创造出的历史也是个别意志所预料不到的。这种人的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历史进程具有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其次,人的活动的历史前提也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的发挥。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作为历史的产物,每个特定时代的人们从他们先辈那里所承继下来的历史前提是既定的、别无选择的。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人们不可能利用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他们的先辈遗留给他们的生产力仍停留在手工操作的简单劳动水平上。对于他们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页。

说,这种低下的生产力是前定的,他们无法拒绝它。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面对现实,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去逐渐地更新、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正是这种历史联系决定了每个时代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这种历史的制约机制也决定了人们创造的历史具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可见,客观实在性是历史的基本属性。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资格,决定了客观历史可以为人们所认识。

然而,由于认识者、研究者的历史观不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及对资料理解的不同,往往导致对历史事物或现象产生认识上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认识。即使是历史观相同的人,往往也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这难免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个客观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呢?对于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基本上作了否定的回答。

西方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对历史一词所下的定义已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之多。这些定义的内容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是指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陈述或记忆。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存在着这两种历史,但实际上,当他们阐述问题时却往往抹煞第一种历史即客观历史的存在。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历史相对主义思潮泛滥于西方,导致学者们纷纷否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宣称:“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①他认为,历史事实因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离开历史学家对它的发现、创造,它就是不存在的。随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离开了人们的心灵这个“熔炉”,就无法锻造出历史的真实。^②

① 转引自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

②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页。

类似的观点俯拾皆是。如法国学者亨利·马鲁认为,“历史是人类的过去的知识”;^①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则说,“历史乃是回忆”;^②美国学者特纳说,“历史,是社会各部分发展演变的记述”;^③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说,“历史就意味着解释”,“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④另一个英国学者奥克肖特甚至说得更直截了当:“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⑤上述各种观点都否认客观历史的存在,它们把历史归结为一种知识、一种回忆或一种解释的学问。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客观主义者则承认在历史研究者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客观的历史,这个客观历史可以被认识。这种观点以19世纪德国的兰克学派为代表。

兰克学派的开创者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是享誉欧洲史坛的大历史学家。他的治史名言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⑥即如实直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弄清事物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他看来,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体,而这个历史客体是可以被认识的。那么,怎样认识这个历史客体呢?他认为,只要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之详加考订、辨析、去伪存真,然后加以纯客观的叙述,即可达到弄清事物真相的目的。他的这套治史方法确曾弄清了不少历史细节。但是,兰克不可能真正达到弄清历史真相的目的。原因在于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虽然承认历史个体的客观实在性,却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不承认事

①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历史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72页。

② 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③ 特纳:《历史的意义》,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④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1页,第7页。

⑤ 特引自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9页。

⑥ 见兰克:《教皇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

物、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相反,他认为历史只不过是精英人物的思想或动机表现出来的结果,而且最终是由上帝意志决定的,他认为冥冥之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操纵、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上帝的旨意即是通过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在起作用。所以,在兰克的史著里,到处充塞着英雄和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一般民众的社会活动却难以见到。兰克虽标榜“客观主义”,主张在历史著述中“消灭自我”(即不把著述者的主观意识带进历史著述中),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恰恰在兰克的著述里随处可见他自己的主观意识的表露。比如,他歌颂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信奉“西欧中心论”,崇尚神意等,即反映了兰克的主观和偏见。

可见,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虽承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但由于其唯心史观的局限,仍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客观性,从而不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真相。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历史客观主义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的错误见解,指出,历史相对主义、历史客观主义都只认识到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且过份地将这个侧面夸大了。历史相对主义过份夸大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实际上是主张不可知论,这必然会导致否认客观历史的存在。历史客观主义虽然承认客观上存在着历史自体,但却过份地夸大精英人物及其思想的历史作用,抹煞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这必然导致对历史的客观性作片面的理解;在史学认识论上极力强调排除自我,否认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因素,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主张:第一,历史本身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独立于认识者、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之外。不论你承认与否,也不论你认识与否,它都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并存在着。第二,人类历史是以往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它有其自己独特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运动规律。第三,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可以被认识,只是它被认识的途径、特点、方法与其

它学科有差别罢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的上述三个结论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第一个结论前面已有分析,不难理解。第二个结论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实际上,到今天为止的整个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人类诞生以来,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直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直朝着更高的形式演化。与此相应,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些社会形态的演进,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随着这一进程不断发展。这一过程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第三个结论指出人类历史可以被认识。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类的过去。既然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则它可以被认识。只不过认知途径、方法、手段与其它学科有所不同。人类历史虽一去不返,但却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体,历史与现实虽有时空差距,但其基本属性及其运动规律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类能够认识现实,同样也能认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虽已过往,但却遗下了大量的残留物,诸如遗址、遗迹、文献资料之类,在这些残留物里包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我们只要借助一些特有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即能释读这些残留物里所隐含的历史密码。在弄清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而发现人类历史的规律。

复习思考题

1. 历史与历史著述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2. 为什么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
3. 为什么说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都是片面的?

第二节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

一、“科学”与“艺术”之争

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还是像文学、绘画、电影、戏剧那样，属于对社会和人生加以描绘的艺术？抑或两者都是或都不是呢？这就提出了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已持续了一百多年之久。这场争论与近代科学的发展、分化有密切联系。自15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领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与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首先确立了近代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相比，历史学的发展则显得缓慢、沉闷。因此，英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进行学术分类时，认为史学是基于人类的记忆而研究过去的一种学问，它在本质上是对这种记忆的描述、记载，因而史学与科学不同，它不能采用观察、实验、推理的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培根的这个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上的差距。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分化加剧，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电的发现与应用，生物进化论的确立与传播，标志着科学在自然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带动了历史学的发展。19世纪便是史学向科学迈步的关键时期。所谓史学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

19世纪以艺术来要求史学的学者首推英国史家马考莱(1800—1859年)。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詹姆士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完全是出于为当政的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即辉格党人的利益服务的。这部作品的最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以生动的文学笔调讴歌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马考莱认为，写历史的

目的就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他的史学实践表明他完全把史学当成了一门艺术。他认为,历史著作应当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产品,也就是说,要把艺术的想象力与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结合起来。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历史根本无规律可循。任何人都可以从历史资料库里抽取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的渣滓”,^①历史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把她装扮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所以,马考莱从不在意历史资料的真伪,却十分注重写作技巧。他的著作一问世,其销量竟超过了文学家司各脱的小说和诗歌,成了仕女梳妆台上最时髦的读物。可见,在马考莱那里,史学纯粹是一门艺术,恰与小说、诗歌、历史剧一样。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为了讨好辉格党和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②

与马考莱同时代的另两位英国史学家卡莱尔(1795—1881年)和弗劳德(1818—1894年)也是倾向于把历史学作为艺术来对待的。卡莱尔是“英雄崇拜”论的鼓吹者,写过不少历史著作。与马考莱一样,卡莱尔也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无客观规律可循,历史只不过是由一幅幅生动的图画组成的历史场景。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图画进行描绘。卡莱尔的作品以文学式描写见长,但史料却经不起推敲,为了维护自己的偏见或说明某个观点,他有时甚至不惜歪曲史料、捏造事实。比如,他为了把克伦威尔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伟大而诚实的人”,首先勒定了一个充满主观偏见的框架,然后搜寻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见解,当有些材料不利于自己的观点时,他即弃而不用或加以歪曲。所以有人说,卡莱尔对许多事件的歪曲可能会使克伦威尔本人也感到困惑和惊奇。卡莱尔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一门适应现实需要的艺术。在这方面,弗劳德深受卡莱尔的影响。

①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3页注120。

弗劳德正是在读了卡莱尔的作品后，慕其文章风格而弃文从史的。弗劳德也写过不少史学作品。但人们认为他更多的是个文学家而非史学家。他主张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因为所谓历史事实不过是“孩子们的一匣子字母片，我们爱把它们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①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戏剧，是为了教育今人，鉴往知来。所以，他的书里史料错误俯拾皆是，偏见、臆断随处可见。

上述三人都把史学当作一种艺术，一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艺术。就在同一个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不是一门艺术。

客观主义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兰克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所谓“客观主义”，用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实直书，在书中“消灭自我”。也就是说，历史学欲成其为科学，必先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偏见，消灭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利目的。史学家只需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历史事实加以纯客观的追寻叙述，就会求得历史真实的真相。那么，客观历史事实又怎么得来呢？只有通过“科学方法”对史料加以搜集、整理才能得到。兰克治史的“科学方法”也即史料批判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史学研究必须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这些资料要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务必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兰克的代表作《教皇史》即体现了他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这部三卷本的巨著引用了大量的经过批判处理的第一手资料，史料扎实、准确。而且，兰克作为路德派新教徒，却能够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描述新教徒的敌人——罗马教皇的历史。他为此曾自夸道，人们无法从这部书里判断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还是敌人。

在兰克学派那里，历史学是被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其科学性

^①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在于客观地叙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对史料的批判方法的运用。但是,如前已指出,史学家并不能像兰克主张的那样“排除自我”而“客观地”叙述历史。实际上,兰克史学中只有史料批判方法具有科学的价值。

与客观主义史学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科学主张又前进了一步。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1798—1857年)。孔德认为,科学研究须以“实证的”事实为前提条件,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着“实证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些“实证的”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可作出像几何学结论那样可靠的结论来”。^①但可惜的是,孔德本人并没有以实证主义思想写出一部历史著作来。真正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用于历史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泰恩(1828—1893年)和英国史家巴克尔(1821—1861年)。泰恩是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精通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在1863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与心理学、动物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即在于发现一般规律。与泰恩相比,巴克尔在实证主义史学的探索道路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一书中,巴克尔明确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只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学才能上升为科学。巴克尔提出,对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主要有两类: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自然规律反映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精神规律则反映道德和知识对人类的支配作用。在这两类规律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规律。尽管巴克尔的这个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他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并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加速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① 见 N. C. 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正当史学踌躇满志准备跨进科学大门之时,却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一是哲学领域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导致了人们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怀疑。主张历史相对主义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明确提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至少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二是从艺术角度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诘难,即认为历史学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此后,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艺术之争即激烈地展开着。这里我们要谈的是科学与艺术之争。

最先从艺术角度对“科学的”历史学发难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年)。1893年他写出题为《纳入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的论文,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只有一个责任,即叙述事实”,叙述单独的、互不联系的个体事实,而对个体的描述恰恰是艺术的天职。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无规律可言。实证主义史学企图寻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是徒劳的。克罗齐认为,历史学甚至连“描述性的科学”也算不上。因为,历史学既然是描述性的,不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就谈不上是什么科学。这就否定了兰克学派“科学的”历史学的概念。历史学既然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呢?克罗齐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但又不止于艺术。因为,艺术是对可能的事的表述和描绘,而史学则限于对发生过的事加以描述。所以,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真实的艺术。^①

克罗齐此论一出,当即受到欧洲史学界特别是德国、英国学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1903年,英国史学家布瑞(1861--1927年)在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作了题为《历史科学》的演讲,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兰克史学的辩护。所谓“不多”,即是说历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此外无他;所谓“不少”,即是说,依据兰克的批判方法已足以写出真实

^①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16—220页。

客观可靠的历史。^①布瑞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哲学家罗素(1872—1970年)和史学家屈维廉(1876—1962年)的批判。罗素1904年发表《论历史》，1954年发表《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屈维廉1913年发表《克莱奥——一位缪斯*》，阐述了他们的看法。在屈维廉看来，历史学既没有自然科学的实用价值，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来。历史学的价值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它的教育功能。历史学之所以不能概括出普遍规律，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千万个不同的心灵，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这些心灵间找出共性。所以，“在历史业务的最重要的方面，历史(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这等于否认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屈维廉还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史学家在积累资料和鉴别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是遵循着一套科学方法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是科学。史学家在经整理过的史料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出推测和概括，但其结果并不就是历史规律。最后，史学家用文学形式把上述两个步骤的结果表达出来，这显然是关于叙述的艺术。所以，历史学的艺术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它对人类心智的教育类似于其它艺术，另一方面在于其叙述纯粹是一种艺术形式。^②

罗素的看法与屈维廉相似。他否认历史学可以成为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或人文的学科，而“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而这却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③更何况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材料上，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罗素并不否认历史学同时具有科学的性质。他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

① 参阅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1981年版，第359页。

* 古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共有9位，其中克莱奥司历史。

② 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75—198页。

③ 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51年版，译序第11页。

决定于下列两个方面：从弄清历史事实这方面来说，历史学无疑是一门科学；从寻找历史事实因果规律这方面来说，罗素认为，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即便真的存在这类规律，其普遍适用性也令人怀疑。至于史学是艺术方面，他认为，史学家撰史必须有激情，有文采，这样才能写出有趣味的史学作品。所以，罗素特别强调撰史技巧，认为正是撰史技巧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艺术。

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肯定历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又承认艺术对历史学的补充作用。它认为，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因为，与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的任务即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探求历史事物、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不过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门科学。同时，历史学也离不开艺术。首先，历史学离不开文字的表达，史学成果、史学发现欲为人知晓，必借助文字形成书籍流布传播。文字表述需要讲求表述的艺术。其次，史学研究在规律的论证上虽主要采取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等科学认识形式，但在对个别事物的描述上却离不开形象思维即艺术思维方式。但这不是说，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而是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著作编纂、对史学个别描述的巨大作用。在这里，史学的艺术倾向显然是以不损害史学的科学性为先决条件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史学的内容是科学的，其表现形式是要讲求表达艺术的。

只有认识了史学的上述特性，我们才能在史学实践中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写出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的佳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史学实践上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这部名著中，通过对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状况、人物个性和心理的分析与描述，揭示了这个特定时期法国阶级斗

争演变的规律,指出路易·波拿巴这个庸人发动政变并最终皇袍加身成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在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时,显然是运用了法则归纳式和科学的演绎方法,逻辑推理严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马克思当时并预言,一旦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则拿破仑一世的铜像就会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果然,在马克思作出这个预言后的9个月,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再过18年,巴黎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拆毁了旺多姆圆柱,推倒了拿破仑一世的铜像。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给马克思著作带来的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力。但同时,马克思的这部作品的表述形式又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性。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个人经历、性格、心理特征以及他发动政变的经过,采取了个别描述式的方法,语言生动、准确,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历史图景。谁会否认马克思的这部作品不同时是一部艺术杰作呢?

二、历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

我们肯定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非一门艺术。那么,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呢?历史学是如何成为一门科学的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要涉及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历史,即人类社会既往的各种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探寻和描绘,揭示寓于其中的历史规律。所以,一句话,历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

我们在上一节里曾把历史著述区分为历史记录和史学著作两个层次,其目的在于强调历史记录并不就是历史学著作。历史记录是历史观察者或听闻者对历史事件、人物、过程等的记录。虽然它也掺杂有记录者的主观意识,反映记录者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带有某些理论观点,但一般说来,它不会对历史现象和过程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揭示历史过程

的内在规律。历史记录主要地还是资料性的东西,它不能提供对历史过程的总的看法。所以,它只是人们认知客观历史过程的媒介体,它本身包含有大量的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信息密码,通过对这些密码的破解、释读,我们才能了解客观历史的真相,并进而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用文字对这一研究过程、研究结果进行表述,就形成史学作品。

那么,历史学是否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样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科学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是渗透着人的主观思维活动的社会历史,但它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与生物学所研究的动物、植物,物理学所研究的力、电、热等自然现象一样,具有独立于研究者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特点,都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是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经验事实,这与史学研究首先确定事实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两者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差异。第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不能仅仅停留在确定事实并描述事实这一层面上,它必须揭示事物、现象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事物、现象发展运动的规律。自然科学如此,历史学也同样如此。如果史学研究仅仅满足于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描述,那它充其量也只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互不联系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而只是史料学。所以,历史学必须在确定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客观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而这就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正是这一任务,使得历史学得以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

当然,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研究对象上,历史事实具有在时间上一去不复返,在发生当时的空间上不

可接近的特点,而且历史事实具有强烈的个别性和一次性的特点,这与大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重复性、无时空差异性形成鲜明对照。但这种差异最多决定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手段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历史学成为科学。历史领域同样存在规律,存在逻辑必然性。只是这些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比,具有更复杂、更隐蔽的特点,如果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则难以发现它。在历史规律的探求上,同样要用到自然科学里普遍应用的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方法。两者在科学研究中所遵循的过程、步骤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尽管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异,但在科学性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样的。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说它年轻,是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生发展史并不长。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算起,至今也只有一个半世纪。但时至今日,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彻底的唯物史观,并把唯物史观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中起作用的基本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基本内容,第三章会详细谈到。这里只是指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历史学,原因在于与以往其它一切历史学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性:

第一,它把社会历史视为客观自然过程,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使得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了客观实在性。而任何科学得以成立的首要前提便是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历史学只有当它确立了自己的客观研究对象,才能据以建立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并进而构建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也才能使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客观的检验标准。而这些是历史学成为

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恰恰在历史客观性这一点上,以往一切历史学都没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第二,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并进而创立了一系列反映历史现象真实联系的概念、范畴与方法论体系,这给历史认识和研究者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人们已完全能够从表面上看来互不关联、杂乱无章的史实或现象里找出本质和规律。而发现规律恰恰是任何科学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由于它不仅能正确地描述个别的历史现象,而且能够发现历史事物和现象间的本质、规律,才奠定了它的科学的地位。

复习思考题

1. 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的谬误何在?
2. 为什么说历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

第二章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及其学科结构

第一节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方法,都是以揭示客观世界运动的某个领域内的规律为任务。就科学性而言,它们是一致的。这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共性,有着相通的一面。但同时,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的历程为研究对象,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又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

首先,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统一于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科学与史学也因而具有统一性。

自物质世界裂变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后,物质世界的发展便沿着两条道路行进,一是自然发展史,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史实际上也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着: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类向大自然作斗争,从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及自然对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人们的社會关系。人类在这两方面的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即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知识体系与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存在内在的统一性。

既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那

么,适用于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与范畴即同时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这些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与表现形式,不仅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在人类社会同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历史中的两对基本矛盾,正是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哲学正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规律进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统一的契合点。

我们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同时也承认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人类社会是由有思维、有意识的人组成的,其运动发展规律较自然规律更为隐蔽,更为复杂,更难于为人们所认识。所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两者在研究对象、手段、任务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不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的某些理论、规则、公式生搬硬套到历史学研究领域,往往会犯错误。比如,生物进化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若将之套用于人类社会则未免简单化,因为人类社会比起自然现象来,是更为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其复杂性、多变性为自然界所无法比拟。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是犯了把生物进化论生硬搬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样一个错误。

但是,这并非是说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都不能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实际上,由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上的统一性,两者之间在某些理论、方法上也应存在着共同性。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虽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历史研究,但某些理论、方法经哲学升华后,往往具有普遍适用意义,若将它用之于历史研究领域,会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深入。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史学研究空前繁荣,有价值的成果不断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自然科学理论、方法的借鉴作用。

第二,自然科学的发生发展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不仅表现在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是从自然科

学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方面去加以研究的。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宽泛,举凡人类社会过去的一切皆成为其研究对象,自然科学本身是人类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总结,当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自然科学史实际上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它既具有自然科学的一般性质,也兼有历史学特有的反思性质。比如,科技发展史由于它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科技的发展状况,所以它属历史学范畴。它必然要对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水平高低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找出它与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受他们影响的程度,这赋予了它反思的性质;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史在历史的纵向发展的每个点上,又必然要述及各该个时期科技的实际发展状况,这又涉及到各门具体科学技术的内容,属自然科学范畴。大量史学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即记载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史记·历书》、《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很多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史记·河渠书》谈到了河渠的开凿及使用。自《汉书》以降,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皆有关于农耕方面的记载。

把自然科学史纳入史学研究领域,除了史学本身研究对象的要求之外,还由于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史学研究自然科学,即是试图把握住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前已提到,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其经验、认识即成了自然科学知识;一是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其经验、认识即成了社会科学知识。其中,自然科学知识的多寡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快慢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即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而人类社会的演进主要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起作用的结果。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转化为巨

大的生产力。在历史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人们的常识。这样,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水平,而生产力的变动又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进一步带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动。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之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研究历史,研究每个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结构、特点、性质,都必须弄清导致生产力变化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只有弄清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才能全面把握生产力高低变动的原因,从而才能揭示生产关系变化的内在根据,才能揭示社会历史演化的动因。

第三,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特别是在今天,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中,自然科学对史学的作用更为明显。这首先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诸学科,如天文学、地史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历史气候学等学科,它们的发现、成果对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恩格斯认为,天文学是自然科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因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①天文学中跟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即是历法的制定。人们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把握天象,进而确定年、季、月、日的概念,制定历法。历法当然首先是为了适应人类生活的需要,但同时却为历史纪年所必不可少。由于古代人类认识的局限,各国、各民族、各朝各代所定历法有很大差异。比如在中国古代,纪年即相当混乱,今天的人们如果没有古天文历法的知识则无法推出其确切年代。三国时魏蜀吴并立,三国皆有其纪年法,陈寿的《三国志》即有几种不同的纪年方式。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各政权割据,周边少数民族杂处,史书在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述这段史事时纪年十分混乱,给后人阅读、研究带来不便。另一种情况是中外历法不同,中外历法换算也必须借助天文历法知识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离开了天文历法知识,甚至连时间概念也无法弄清。还有,古书中一些年代不清的问题,由于其中提到了某种天象的出现,现经过运用天文学知识进行测算,即可得出其确切年代。实际上,不少史实的年代问题正是借助于天文学的知识才获得解决的。

地史学、古生物学、历史气候学、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人类史前史研究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地史学是研究地球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古生物学是研究古代生物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历史气候学是研究地球气候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古人类学是通过对古人类化石及古人类遗物、遗迹的研究,揭示人类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地史学、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天文时期”和“地质时期”两大阶段,而以距今 46 亿年前为界线。“地质时期”又可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5 个时代。新生代从距今 6700 万年前开始,人类正是在新生代的第三纪和第四纪的交界处即距今 300 万年前由古猿转化而来的。那么,古猿是怎样变成人的呢?一系列古人类化石的出土及考古发掘资料给人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证据。1859 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1871 年又出版《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生物进化理论确立了它的科学地位。随之,1876 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从而正确地回答了人类的起源问题。正是这些学科的成果有力地批驳了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把人类史前史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天文学、地史学、古生物学、历史气候学、古人类学对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然,自然科学领域中与史学研究关系密切的学科远不止上述几种。实际上,即使是这几种学科,也不能离开自然科学领域中其它各门学科而单独存在。比如,天文

学离不开数学和力学,地史学离不开物理学、化学,古人类学也离不开化学、生物学的一些分析方法与检测手段。离开自然科学领域中其它学科的配合,这些学科就无法建立和发展。从这种层层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难看出自然科学体系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

自然科学对史学的促进作用除了其成果可以直接为史学所用之外,还表现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手段经哲学升华后可适用于史学研究。如对出土化石、文物进行年代测定,以往根据地层断代,误差很大。现在根据放射性同位素(如 C_{14} 、 K_{40} 等)的衰变规律进行测量则精确得多。北京的山顶洞人头骨化石出土后,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曾根据其地层位置推算出它大约距今 5 万年前,现在利用 C_{14} 重新测定,得出其绝对年代为距今 18865 ± 420 年,精确度大为提高。再比如,计算机、电脑发明后,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史学可以借助于计算机的快速运算能力、电脑处理资料的能力来帮助研究历史。以前治史者研究历史完全靠手工操作,纵使皓首也难以穷经。现在利用电脑处理很多复杂的史料,将它们分类、整理、编次、排比,使历史研究者驾驭史料的能力空前提高。史学不仅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学中的这些手段,且也可以利用其某些方法。如数理统计方法进军史学领域,给史学造成不小的冲击,形成了所谓“计量历史学”。将计量分析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中是有哲学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的规定性,事物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质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的规定性,量则是外在的表现,对事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事物特有的质。这种质和量的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广泛地存在着。我国建国以来的史学实践比较忽视对事物、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在证据不足、概念较为模糊的情况下往往急于下结论,进行定性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经不住检验的。计量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当然,在计量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

还必须谨慎从事。因为并非所有的社会历史现象都可以量化。一些精神现象或者因具有极为特殊的质而不能量化的事物和现象则不宜采用计量方法。

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相互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提高。同样,历史学也间接地推动着自然科学朝深度、广度发展。一方面,史学具有反思特性,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史总结着本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有利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提出任务。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就会更为明确、清晰,而不致“在黑暗中摸索”。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取得的成果,总结的规律,得出的经验教训具有普遍意义,必然会影响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和认识者,从而促进或制约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并最终反映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上来。

二、历史学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 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

历史学与哲学之间既存在着巨大差别,又存在着密切联系。历史学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描述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哲学则不然,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思辨色彩极浓。但是,这种学科性质的巨大差异丝毫没有妨碍到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实际上,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远较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密切。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并非并列平行的关系,而是一般和个别、指导性理论和实证性基础的关系。由于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概括,它的理论、观点对其它学科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所以,哲学为历史学提供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不受任何哲学影响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反过来,历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哲学内容的更新,历史学为哲学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经验和史实的依据。

历史学离开了哲学的指导,就寸步难行,实际上,不受哲学指导的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人都有权否认他的历史研究曾受过某种哲学的指导,但这种否认是徒劳的。实际上,任何学术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即使是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学派也最终摆脱不了唯心史观的影响。兰克的史著里即渗透了个人英雄史观、宗教史观、西欧中心论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承认历史学受哲学的指导,而在于历史学受什么样的哲学指导。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即有什么样的历史学。这恰恰是史学深受哲学影响的最好证据。古希腊哲学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后,即以求实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方法研究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哲学研究的这种特点深刻影响着历史学。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波里比阿、李维、塔西陀,整个西方古典史学都明显地摒弃了神学的影响,人本主义观念得到极大弘扬。同时,批判方法被运用于史学实践中,求真精神成了史学家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正是在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值得称道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述。接着,从公元5世纪开始,基督教神学主宰着中世纪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哲学成了基督教神学的论坛,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圣经》成了历史学的最高典范,教会发展史成了历史编纂的中心内容。14世纪后,西欧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人文主义史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后,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直到本世纪以来的相对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哲学思潮,无不给历史学打上深深的哲学烙印。可见,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密不可分。

历史学与哲学之间这种指导理论与被指导的实证基础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

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第一次实现了自然界物质运动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在科学基础上的真正统一,使哲学变成了科学。历史学也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第一次成了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历史学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在整个物质世界坚持唯物辩证法思想,且在社会历史领域正确地处理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指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变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指出正是生产力的变动推动人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不断变革,从而导致人类历史有规律的自然运动过程。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历史学就不致在科学探索道路上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历史学提供唯物史观的同时,也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适用于人类历史的研究。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史学研究中,使得历史学的研究更为严密、更为科学。我们只有切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才能在历史研究中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分析历史问题,全面、完整地把握历史事物、现象的本质,从而对各种历史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判断。

哲学虽然在理论上、方法上给历史学以指导,但反过来,历史学对哲学的意义也不容低估。既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对于历史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哲学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哲学必须对历史学领域新的发现,对于不断延伸着的历史过程进行新的概括、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以充实、丰富哲学内容和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为哲学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素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在总结前人优秀成果特别是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比如,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说,那不是他的发现。19世纪30年代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

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即已提出了阶级斗争概念,但他们回答不了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不可能真正弄清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指出阶级只与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本身即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在总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这种批判继承关系即是一种历史的联系,表明哲学离开史学就难以充实、发展。

正确地认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哲学虽对史学研究有理论指导作用,但是理论本身并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因为,史学是一门重实证的科学。它虽然以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目的,但它必须首先关注于具体历史现象、事件的描述、分析,只有在大量实证史实的基础上才能具体地揭示出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但是,我国史学界曾一度忽视了历史学与哲学相区别的特性,要历史学去与历史唯物主义争地盘。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科学的哲学认识,它不仅不能代替具体的史学研究,反而要从史学研究的成果中汲取养料,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

史学与哲学除了上述关系外,两者还有学科上的交叉融合,这主要表现在哲学史和历史哲学两个方面。哲学史是对哲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历程所作的历史考察。对哲学史的研究适用一般历史研究方法,故哲学史同时又可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史学范畴;但同时,哲学史的考察对象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其内容必然涉及到各种哲学思想、理论、方法、流派、思潮,它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又属哲学学科之一。历史哲学则是对历史的哲学考察,它主要不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总体上、从宏观上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哲学把握,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总体趋势(传统的历史哲学一词包括历史哲学与史学哲学两层含义。这里所用的历史哲学一词仅指第一层

含义)。它既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 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历史学是最具有综合性的一门社会科学。这决定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活动领域及其过程,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人类社会的某个特定的方面或特定领域及其规律。如经济学侧重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应经济结构、制度和组织;社会学侧重研究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及其相应的结构、制度和组织;政治学侧重研究人们的政治交往活动及其相应的结构、制度和组织;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侧重研究人类的原始社会或早期社会的群体关系、文化、宗教、习俗和社会制度;心理学研究人们的内心世界,如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包括社会境遇、群体组织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社会因素对人们的人格、性格形成的影响;……等等。可以说,各个专门领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主要在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侧重研究那些对象的现实状况,而且主要侧重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历史学则侧重其历史状况,而且侧重于从其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简言之,历史学侧重从历史纵向上整体地研究过去的人类社会,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则侧重于截取现实社会的横断面中某一领域加以解剖。

由于历史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同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内容上、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目的上都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具体说来,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历史学的总体性、综合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在研究对象上与其它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交叉重叠之处。历史学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具

体方面的状况,通过把握各方面的联系,揭示人类历史的总体运动过程及其规律。而这各个具体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即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史,这势必又涉及到研究社会某个方面或特定领域的专门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文学、思想文化学等各门研究“现在”的学科。特别是各种专门史,这些专门史即是历史学与其它各门社会科学的契合交叉点。

第二,上述特点决定了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之间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既是一个“通才”,又是一个“专才”,他仅仅掌握了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还不够,他必须同时具备其它各门学科的知识,熟悉它们的理论与方法。只有这样,他的研究工作才有牢靠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才有一定的深度。同样,研究其它社会科学的人必须懂得历史学,如果不懂历史学,他就谈不上对本门学科有完整的认识。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其研究对象和学科本身的发生、发展史,若对该学科的“昨日”不了解,何谈对该学科“今日”的理解。

第三,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关系又决定了它们之间在研究理论上、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比如,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进史学领域之后,已成了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所谓历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是指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本世纪初,美国“新史学”代表鲁宾逊(1863—1936年)即主张在史学研究中采用跨学科方法。法国年鉴学派在史学研究中广泛采用跨学科方法,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如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地中海与非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是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杰出史学作品。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熟练运用者。以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为例,该书为了回答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而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综合考察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政治方面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政教合一、分封制、科举官僚制、皇帝、军队；经济方面涉及到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农业制度；此外还涉及法律、宗教、城市体制、行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所有这些方面，韦伯并非泛泛而论，而是从美学、语言学、文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角度，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加以比较，从而考察中西历史的异同。最后通过对儒教与清教的比较得出结论，儒教同近代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亲和性，故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虽然，人们很难赞成他的这个结论，但他所运用的跨学科方法至少已使他的研究达到了一定深度，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同样，其它社会科学也可借鉴历史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比如，考证、辨伪方法运用到法学领域，可以澄清事实，历史的因果联系的理论运用于政治学领域，有助于揭示政治学领域的特殊规律。可见，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在理论上、方法上有相互借鉴、渗透的一面。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2. 怎样理解历史学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第二节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历史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它包括了一些更为具体、更为细密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所以它们都有独立存在的资格。下面，我们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整个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粗略地归纳为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和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等三大部类，加以具体探讨。

一、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对客观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是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所以,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构成了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基本部分。

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按研究的范围来划分,有世界史、国别史和地区史;按研究的时间跨度来划分,有通史、断代史;按研究的历史活动领域来划分,有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科技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专门史。

世界史是从总体上研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联系和总体趋势的学科。它不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简单的汇集,而是致力于探讨和展示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共同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的展现。在上古中古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大都是分散地、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着,彼此间缺乏相互的交往和联系,因此,严格说来,那时还谈不上存在着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史。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性市场的逐步形成,地球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经济交往和联系逐渐增强,政治和文化交往关系也随之而日渐频繁,由此才逐渐形成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然而,世界史学科在考察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时,仍需从上古中古时代开始,才能展现出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从分散、孤立状态汇合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世界历史的全过程和总趋势。

国别史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中国史、印度史、日本史、美国史等等。在各国的国别史研究中,本国史都占据着优先而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学家研究本国史,在利用本国史料和语言文字方面拥有研究外国史不可比拟的便利条件,还因为人们要认识历史,最为切近的当然是本国的历史。与本国历史关系最为深远或影响最为重大的国家的历史,在国别

史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程度,仅次于本国史。在国别史中,还有以一国之内某些地方历史为侧重研究对象的地方史学科。近年来,各国的地方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是研究日益深化的表现。

地区史是以历史联系较为密切或具有较多历史共性的、包含若干个国家和民族的某一地区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亚洲史、东南亚史、中东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等。在各国的地区史研究中,一般说来,与本国历史联系最为密切或影响最为重大的地区史研究,也优先受到重视。

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都按研究的时期跨度的不同而划分为通史和断代史。通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古到今贯通的。断代史则侧重其中某一特定时段的研究。如世界史中有世界通史和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中国史、日本史、英国史等等国别史中,也有各国的通史和古代、近代、现代等断代史之分。各个地区史也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

各专门领域的历史,如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科学技术史、思想和文化史、宗教史、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等等,都是按所研究的人类历史活动领域的不同而划分的分支学科。这些专门史,按研究的范围来看,也可分为世界的、国别的和地区的专门史,按研究的时间跨度来看,也可划分为各专门领域的通史和断代史。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作为历史学中的分支学科来看,可以说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的发展演变史的一个专门史学科。

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和按时间跨度划分上述诸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没有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深入研究的成果,就很难写出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世界史;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世界史研究成果作为依托,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也容易陷入偏狭和片面。通史和断代史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相互依存和相

互补充的关系。

二、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客观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但历史过程一去不复返的特性决定了研究者不能直接接触认识对象,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客观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信息去解读历史密码。这些信息的载体就是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与风俗习惯等。它们都是研究客观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是:它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缺乏史料或史料不可靠,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史料不可靠而得出的结论比没有史料更为可怕。郭沫若曾说:“无论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①实际上,流传到今天的历史资料很多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单就文字史料而言,在我国也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其间历经无数次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很多文献或散佚、或残缺,即便是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往往也错误很多。因为古书多系辗转传抄,错字、错句、衍文、脱字俯拾皆是。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才得以广泛刻印传播。但在判刻过程中,也难免各种谬误。所以若不对这些古籍进行校勘、注释、理顺文句,则难以加以使用。另外,由于史书流传久远,各朝各代皆有为古书训诂作注者,限于阶级偏见和学识,往往有很多错误。更有甚者,古书作伪现象非常严重,托前人之名作书者代有所出。这就要求我们对见到的古籍来一番辨伪、审核工作。所以,研究历史,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一番搜集、整理、鉴别工作,以保证历史研究建立在可靠、厚实的基础之上。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在我国,以文字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史料学,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已开始萌生,到清代和现代已发展成为包括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训诂学等各门更为专门的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

目录学 是研究文献图书著录的学科。目,指书名、篇名;录,指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一般包括书的篇数卷数、基本内容、学术价值、作者简介、流传情况等方面内容。目录学是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辅助学科。清人王鸣盛在《十七世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我国文献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若不讲方法,贸然一头扎入古书堆,虽穷毕生之力,也不能百读一、二,且终是劳而无功,不得要领。目录学则恰以茫茫书海中一盏明灯,教人有所选择地读想要读的书,借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国古代学人即十分重视目录之学。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曾受朝廷之命,把所搜集到的书籍加以整理、校对,并对各书目录加以编次,写成《别录》、《七略》,其宗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它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体制完备的目录学著作,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目录学著作代有所出,至清朝中叶编纂《四库全书总目》集其大成。《四库全书总目》按经、史、子、集四部把全部典籍分成44类,它著录了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今天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四库全书总目》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版本学 是研究版本的渊源、优劣、行款版式、流传情况从而确定其价值高低的一门学科。版本指刻本、印本,它是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刻本书是公元868年中国唐朝刊刻的《金刚经》卷子。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多靠手抄流传,称“手抄本”或“写本”。无论是“写本”还是“刻

^① 《汉书·艺文志》。

本”书。其错讹、谬误都在所难免。故版本学研究的对象不限于刻本、印本书,也兼及“写本”书。

写本书多有不同抄本传世。如战国至汉初,《论语》即有古、齐、鲁三家抄本。三家抄本不仅文字有异,且篇数也不相同。《尚书》也有古文及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其文字不同者竟有 700 多个。刻本书由于刊刻时间、地点不同,刻工有精细、粗劣之分,故同样存在各种错讹之处。一般认为,宋朝刊本较元朝刻本为佳,元朝刻本较明朝刻本为优。宋朝、元朝刻本可称为“善本”。明朝书最劣,但并非绝对,如明初刻本错讹之处即远较万历以后刻本为少。在清代,书籍的刊刻在规模上远盛于前代。按刻制者即可将书籍区分为“殿本”书(康熙、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刻之书)、局本书(各省官书局所刻之书)、坊刻书(书铺所刻)及私家自刻之书。可见版本之复杂与混乱。清乾嘉时代学者重考据、校勘之学,故经当时著名学者之手精校细勘后刊刻的书籍均是善本书。

校勘学 校勘,也叫校雠、校订,一般是指在各种版本中选择原本、初刻本或善本书作为底本,参以其它不同版本作比勘,以校正同一书籍中的错误,从而恢复书籍的原始面貌。

书籍由于屡经传抄、刊刻,其错误势不能免。同一书籍的各种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差异。仅在文字上即有错、脱、衍、乱等现象。错指错字,脱指文字的缺脱,包括个别文字与整段整章文字的缺脱,衍指多出的文字,乱指文字的错乱、颠倒。如不对这些错误进行订正、校勘,则会误解甚至曲解原书的本意,所以清人叶德辉曾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①

校勘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其源起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但大规模的校书是从汉代刘向父子校群书开始的。以后历朝历代长盛不衰,至清朝乾嘉时代达至极盛,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精于校勘的学者。今人陈垣在所著《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提出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法,对校勘理论作了完整的归纳。

① 叶德辉:《藏书十约》。

辨伪学 是辨别伪书的一门学问,其主要任务在于鉴别古书之真伪,揭示伪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

古书之作伪,先秦即已有之。时诸子百家争鸣,即有人“案往旧造说”,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①表明孟子已有辨伪的思想。此后两千年来,书籍作伪问题相当严重。考其缘由不外两个方面:有的是托古人之名以广传播,因为古人多“尊古而贱近”;^②有的是伪作古书献朝廷邀赏;有的是从伪造的古书上寻找论据战胜自己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对手。清人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中提到的伪书即包括经部 73 部、史部 93 部、子部 317 部、集部 129 部。伪书的大量存在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首先鉴别书籍的真伪,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班固在作《汉书·艺文志》时即已辨出了部分伪书,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伪书的辨别。明代胡应麟著有《四部正讹》,提出识别伪书八法。近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书中系统地总结了辨伪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传统的辨伪方法是以文献证文献,局限很多。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实物史料的出土,以实物证文献的方法引入了辨伪学领域,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辑佚学 是关于搜求、整理古佚书的方法、原则的一门学问。古书问世后,往往传之不远,散佚现象十分严重,尤以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抄本散佚最为严重。马端临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③古书古籍散亡率如此之高,除传播条件所限外,主要是战乱导致大量古书被焚被毁,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封禁、焚毁某些书籍。史籍的大量散佚对

① 《孟子·尽心篇》。

② 《淮南子·修务篇》。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

历史研究是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搜求、钩沉散佚书的史料成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便是辑佚古书的工作。南宋时王应麟即已辑出《周易郑康成注》、《三家诗考》等书。此后,辑佚书屡有所出。但大规模的辑佚工作是在清朝乾嘉年间进行的。为编修《四库全书》,清政府曾组织学者校核《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不少古佚书,其中著录于《四库全书》的就有 385 种,4926 卷,另有 127 种佚书存目。这是古书辑佚工作上的巨大成果。为史学研究搜求出大量有用的史料。但是,辑佚书也有缺陷,除了容易出错外,一般的辑佚书都只是辑出了原书的一些断章残篇零句,从根本上恢复原书的面貌是不大可能的。

训诂学 训诂即是对古书文句的训释。清人黄季刚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①由于很多古书年代久远,文字的音、形、义都有很大变化,故很多古书文句深奥难懂。若不对其文字进行训释,则无法弄懂其本义,遑论利用它进行历史研究。训诂学即是关于训释古文字的方法、原则的一门学问。其目的在于注解、训释古籍的文句。训诂之学发轫于先秦后,两千多年来,训诂之书不绝于史。

考据学 考据,又称考证,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真伪的鉴别。我们谈到考据学,通常是把它狭义地理解为一种专门考证历史事实的学问。事实上,考据学方法与上面提到的目录、版本、辨伪、校勘、训诂等诸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广义的考据学即包括上述诸学科的方法。因为,欲考证史料的真伪及其价值,首先必须明目录之学,以广泛搜求有关书籍及史料,其次再论版本之好坏,然后进行辨伪、校勘、注释、训诂等项工作,在综合运用以上诸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对史料进行正确的鉴别。这就是考证的整个程序。考据方法在我国使用较早,汉代即有人

① 黄季刚:《训诂之意义》。

以之治经、治史。但只是到了清代,考据学才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所谓“乾嘉考据学派”。

与史科学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互相交叉的一个学科,是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也运用目录、版本、辨伪、校勘、辑佚、考据、训诂等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学与史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研究范围只限于历史文献,并不涉及历史文献以外的史料;它的任务则不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史料,而是为系统地搜集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 传承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服务。史科学的研究范围则不仅限于文献和典籍史料,还包括文献典籍以外的文字史料,如铭文、墓志、公私文书和档案、司法和行政记录、日记、书信、近代以来的报刊杂志……等等。史科学还要研究和利用口述史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现场调查中获得的史料。史科学的直接任务是如何为特定的历史研究目的提供充分而可靠的史料。如上节提到的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分支学科,都需要有为本学科服务的史科学。这就决定了史科学是在吸取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基础上直接为研究客观历史服务的一个学科。例如,中国古代史的史科学,就需要吸取中国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分别对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真伪是非及其利用价值做出系统的阐述。中国现代史的史科学则需吸取相关学科成果,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遗存下来的各种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的真伪是非及其利用价值做出系统的阐述。

考古学是以实物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研究古代人们遗存下来的各种遗址和遗物、诸如原始栖息遗址、村落、宫室、墓葬、遗骸、古尸、房屋、生产工具、武器、车船、生活用具、礼器、工艺品、钱币等等,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本世纪初,在我国传统金石学基础上诞生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考古学。它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长足发展,对我国各主要地区、各个历史时代和众多专门领域的文化遗存和各种文物,都

已有相当系统的发现和研究,对全面认识我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考古学不仅是单纯研究实物史料的学科,而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它把现代化学、物理学、航空航天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引入自己的学科,使它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先进。

三、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历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需要对历史研究的成功和失误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以促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其中,主要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史学史是研究史学自身发生、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从纵的方面描述和总结史学领域内的各种现象,从而对史学本身的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有规律可循的轨迹。史学史虽然研究史学家及其著作,但史学史绝不能等同于史家传记汇编,绝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史。它在探讨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异常广泛,举凡史学领域内的一切现象的发生、发展史都可以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大致说来,史学史至少应研究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历史意识、历史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历史观的演变。这是贯穿史学史研究中的一条主线,只有把这条主线搞清楚了,才能真正认识史学发展变化的历程,认识史学历程中的一切现象,把握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2)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纵向考察,包括历代史家对史学实践的理论探讨、方法论的总结。(3)对史学家及其著作的研究。涉及对史学家的生平、治学、史学成就、史学思想的介绍和评说,对史著的体例、方法、理论、价值等的评价。(4)对史学思潮及史学流派的研究。史学思潮及史学流派虽是晚近才出现的社会现象,但它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巨大,在史学史的探讨上占有十分

重要的位置。还有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史学功能演变的历史,也应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内。以上诸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融、渗透。如对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显然离不开对史学家及其著作的评价。对史家及其史著的探讨必然涉及到评价其历史思想及方法。

史学理论是史学对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省、反思和认识的理论产物。它不是探讨具体的历史过程,而是对历史学的理论思考。它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个组成部分。

史学本体论又称历史本体论或历史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历史观。诸如,历史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发展演变有没有规律或有什么样的规律?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怎样看待历史发展演变中的因果关系?怎样评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怎样看待人民群众和个人、以及不同的阶级、阶层在历史上的作用?怎样看待自然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怎样看待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前进与曲折?等等,都是属于史学本体论或历史理论问题。对于此类理论问题是否能做出科学的回答,从根本原则上决定着历史研究是否能反映客观历史真相。

史学认识论又称历史认识论是人们对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的性质、特点等进行的理论探讨。史学认识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在史学认识之中,它与客体历史的关系怎样。一般说来,历史认识论要回答下列问题:历史认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历史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是什么?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怎样?历史认识获得的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如何?历史认识采取哪些形式?历史认识与时代的关系怎样?历史认识能否检验?有无标准?作为历史认识结果的历史著述还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历史研究成果是否应该或

怎样才能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历史学的学科特征，从而才能自觉地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

史学方法论 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它并非是对具体的研究方式、方法的个别描述，而是从整体出发，对比各种史学方法的优缺点，弄清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它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怎样认识史学方法的特性和史学方法与其它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怎样理解各种史学方法的适用范围、局限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写作的方式、方法或体裁、体例与研究成果的内容的关系如何？等等。历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正确认识，才能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理论体系都必然受到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局限的制约。因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理论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成果。实践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做出符合历史研究的客观实际的科学论证，从而促进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复习思考题

1. 历史学有哪些主要的分支学科？
2. 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三章 历史学的发展 历程与现状

第一节 古代、近代的中国史学

一、中国古代史学

历史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当原始先人们开始使用原始的工具进行生产劳动,面对严酷的大自然,为自己群体的生存繁衍而艰苦卓绝地奋争时,便开始思考他们的现在与过去,开始记忆、思索自己的历史。

当时还没有文字。人们使用结绳、刻木、绘画等形式记载自己的历史,“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①结绳、刻木和绘画无法清晰完整地记录历史,原始先民往往还要靠口头历史传说,通过口耳相传、辗转复述的形式将人类自身的一部分历史保留在记忆之中。

在遥远的远古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极其低下。面对强大的自然力和不可抗拒的历史变迁,他们只能把自然力形象化、人格化,夸大为全知全能的神来加以理解和解释。原始先民的历史传说往往被包容在神话传说中。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产生了内容丰富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羿射九日、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等。这些神话传说或反映了原始先民探寻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朦胧意识,或用神话形式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部落战争和交往的历史。我国远古时代的不少历史

^① 《周易正义》引郑玄注。

传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后世的不少书籍正是依据这类传说，才记录保留下了诸如传说中的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及社会状况等方面的珍贵的史实。

历史记述和历史学产生于文明社会诞生之后。文字和历法的发明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基础。随着文字和历法的产生，人们遂能记年载事，历史知识的积累遂由口耳相传进到史书的撰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用文字记载史实的国家。传说我国从很早起便设置史官记事，“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①迄今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是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在记年载事，在反映历史意识方面较甲骨文又前进了一步。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我国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之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设史官记事，大都有了自己的编年史书，如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秦国的《秦记》等。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过“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史学发展盛况。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春秋》、《左传》相继问世。《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记编年史，孔子依据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史法加以修订。《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242年，用鲁国纪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纪年”，年年相次，从不间断。其内容以鲁国史事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它诸侯国，涉及124国之事。《春秋》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述历史，属辞比事，记事有取舍详略，于记事中寓褒贬，将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春秋》之后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克服了《春秋》记事过于简略等局限性，取材广阔，内容丰富，记事详尽，叙事完整，语言生动简练，基本上写出了春秋时代二百余年间的重要史

^① 《后汉书·班彪传》。

实,在史学思想上也多有建树。《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史书,对我国后世史学影响很大。《春秋》、《左传》等史籍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中国的史书撰述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形态。

中国史学形成于先秦时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继续发展提高。中国封建社会中历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战国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随着社会巨变,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系统的编年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诸子百家纵论治国之道,大都引经据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如韩非子等人的历史进化观,孟子、邹衍等人提出的历史循环观,对后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时,史实的考证也受到了重视,史学家们还重视史实的评价和修史笔法,初步形成了“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秦并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朝之后,为加强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高压政策,焚书坑儒,严重阻滞了史学的发展。秦朝历十数年而亡,刘邦在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汉朝。秦亡汉兴的重大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了震撼,激起人们对历史的重视和思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两汉时期出现了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史学的大发展。

司马迁(前 145—前 87 年?)生活在西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他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宗旨,写出了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创立了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互为补充,联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记史,上下三千年,内容广泛,分析独到,堪称为立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司马迁矢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历史运动的底蕴。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已成为代表官方的统

治思想,他们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史观。司马迁则提出“亦欲究天人之际”,重新探讨历史发展中人与天的关系,努力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意加以淡化,着重从人事出发去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董仲舒等人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却要“通古今之变”,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发展变化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在论述历史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不仅以“人谋”论兴亡,还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力量的历史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试图从经济条件的分析中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

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①他“敢述汉非”,对暴君和暴政敢于揭露批判,对于勇敢抗暴、揭竿起义的下层民众及起义领袖给予同情乃至歌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东汉班固(32—92年)撰写的《汉书》,是这一时期另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汉书》断代为史,集中记叙西汉一代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在历史编纂体例上对司马迁的《史记》作了继承和改造,将《史记》创立的纪、表、书、世家、列传合并为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汉书》开创的断代史和纪、表、志、传四部分的历史著述体例,多为后世史家所仿效。《汉书》不仅在历史编纂体例上有了发展创新,也扩大了历史记叙的内容范围。在历史思想上,班固坚持儒家封建正统史观,宣扬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思想,但也表露了历史变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经济因素的作用。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南北对峙之中。社会矛盾的复杂尖锐、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迫使这一时期的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重视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纸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张的广泛采用,汉儒经学统治的松弛,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 修史者众,史书的数量、种类和体例都比以往多。在过去,史书主要由史官编修,而这一时期私家撰史之风盛行。史书的数量空前增长。自殷商至两汉1800年间,所成史书不过200余部,而曹魏至隋400余年,所修史书竟有1200余部。史书的品类除已有的通史、断代史、纪传史、编年史有了新的发展丰富外,还涌现出了史注、史评、起居注、地理方志、谱学、实录等多种史书。

2. 史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学术领域内逐渐取得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在两汉时期,史学还附属于经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摆脱了对经学的附庸地位,取得了独立。在图书目录分类中,这一时期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和分类次序。后赵君主石勒还建立“史学”,创立传授历史知识的学馆。南朝宋文帝时,官方设立儒(经)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种专科学校,史学为四学中独立的一种。

3. 反映士族门阀制度影响的谱牒之学和人物传记十分盛行。谱学为研究谱系之学,辨其氏姓贵贱、门第高低,为当时的封建国家选官和门阀士族的联姻等服务。这时,名门大姓各撰有家谱,由此发展出综合各家记载的谱学,并产生了不少谱学专家。

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推动了人物传记的兴盛和得失荣辱与名教思想的流行。这时,传记史书门类繁多,家传、耆旧传、名士传、忠良传、孝友传、列女传、高僧传、神仙传、五花八门,既有分类传记,也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传记。传记史书的重点是臧否人物,浸透了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

4. 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发展。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立国后,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纷纷撰修自己国家的历史。汉人政权下人们编写的历史著作也大多增加了记载各少数民族的内容,民族融合和民族统一的思想倾向得到加强。

（一）唐、宋、元时期

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适应这时社会发展提出的明变的要求，史学更注重通变。杜佑提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郑樵力图做到“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天下之变”的“会通”，马端临着眼于“推寻变通张弛之故”，司马光欲“穷探治乱之迹”。王通明变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通史著作空前流行，人物传记被冷落，而典章制度史则受到了高度重视。

中国封建史学中几部较为重要的通史著作大都修撰于唐宋元时期。唐代杜佑（735—812年）修撰了《通典》。《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史的通史专著，它将中国典制分门别类，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大门类，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的沿革嬗变，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宋代郑樵（1104—1162年）所著《通志》，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郑樵主张“会通”，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在史书编纂上，他主张既要师法古人，继承前人成就，又要“别识心裁”，革新创新。《通志》中的“二十略”，富有创新，把旧史书志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

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编纂的《文献通考》是《通典》之后另一部宏大的典章制度史。较之于《通典》，它记载的内容范围更广，门类更多，节目也更加精密。《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被后人合称为“三通”。

宋代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唐、宋、元时期，历史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在撰修史书的数量上、史书种类和体例上，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

考证上,在历史研究内容的拓宽和史学思想的深化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唐初设史馆修史,政府垄断了纪传体正史的编纂,这虽有碍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对史学发展具有某些消极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对史书编纂的高度重视,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封建正史中的廿四史有八部撰于唐朝,成书之多,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史书体例方面,除纪传体通史、编年体通史、典章制度通史外,唐朝还出现了专记一代典章制度史的会要体。在编年体史书中,宋朝朱熹(1130—1200年)编撰了《通鉴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宋人袁枢(1131—1205年)编纂《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也卓有成就,宋代成就尤大,《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均在这时成书。宋代还兴起了金石学,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

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认识也走向深化。兴亡论、封建论、民族论及王霸义利之辩等几次大辩论,使历史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刘知几、杜佑等人都提出了较前人更为明确系统的历史进化观。有关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了空前的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可以唐代刘知几(661—721年)的《史通》作为代表。在《史通》中,刘知几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相互联系,而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提倡“书法直笔”,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对于搜集和利用史料,他认为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

(四)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这时,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强化,迫使一部分史学家向注重文献整理和考据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末清初也吹起了一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宋明

理学和各种陈腐历史观念、提倡经世致用史学的清新之风。

明前期，史学发展平平无奇。朱明统治者多推崇理学，对史学不够重视，私家修史之风兴起。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促使人物传记史再度兴盛。但明代理学肆虐，空谈“义”“理”“心性”，史学思想平庸，建树不多。

明后期至清初，反理学思潮兴起。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年)，黄宗羲(1610—1695年)，王夫之(1619—1692年)，顾炎武(1613—1682年)等人，奋笔疾书，痛斥宋明理学，鞭鞑专制主义，倡导史学经世致用。李贽提出：“经史相为表里”，认为“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①主张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空谈义理。嗣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勸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这些进步的思想对后世史学发展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

清王朝巩固政权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触犯清王朝的历史家和史书大肆镇压和禁毁，另一方面又开设各种史馆，引诱笼络知识分子，在“博古”“稽古右文”的幌子下，把史家引入考据、训诂的轨道。在这种环境下，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尤盛。钱大昕(1728—1804年)，王鸣盛(1722—1797年)，赵翼(1727—1814年)等人在史实、典制、史书的考证，在古史书籍的订伪、纠谬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就。但这些史家大都“博古而不通今，知人而忽于论世，言事而不能论理，只能遵循‘圣旨’而不能成一家之言”。^②

然而，同处在乾嘉时期，章学诚(1738—1801年)却继续提倡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他的《文史通义》是继唐代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论著作。章学诚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详尽地

① 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

②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阐述了“六经皆史”的思想,既反对空谈心性的“宋子”,也反对脱离“经世”,务求考索的“汉学”学风。《文史通义》对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和总结,对“史法”、“史意”、“史德”和历史编纂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把史学理论的研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继续高举史学“经世致用”的旗帜,批判史界流行的烦琐考据之风,批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研究总结历史,以探寻挽救民族危亡之道,呼吁变法图强,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学发展呈连续发展、不断提高的态势,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水平之高,举世无匹。我国古代史家为后人留下了世界其它国家所根本无法比拟的丰富的史学典籍。史书编纂的体例、种类在古代中国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我国古代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史家及其著作,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古代世界史坛上都是出类拔萃、鲜有匹敌的。

古代中国长期维持了官修史书的传统、官府开馆修史,对史学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历代封建王朝对史书编修的重视,对于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推动力,尤其对于史书数量和史书体例、种类的增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官修史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由于史学受封建王朝的控制影响较深,封建正统史学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天命史观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封建王朝正统思想是史评的基本标准,臧否人物的纪传体正史是占主导地位的史书体例。

天命史观是中国古代的正统史观。夏、商、周三代的史籍中便有所谓“夏道遵命、殷人尊神”^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②之类记

① 《礼记·表记》。

② 《诗经·商颂·玄鸟》。

载。到西汉,董仲舒将天命史观加以整理发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封建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及至宋朝朱熹宣扬“天理”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变化归结到“天理”上,并视程朱理学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源自“天理”,为封建统治秩序披上了神圣的、合法的外衣。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大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这类史观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天命史观往往与历史循环论互为表里,相互补充。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邹衍提出“五德终始”的理论,把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看作土、木、金、火、水五德的循环。他认为,五德循环反映的是天意,每一转变关头,天必显示种种迹象予以昭示,“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乎下民”^①,此即“符应”。汉代董仲舒将五德终始说加以发展和系统化,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历史运动是按黑统、白统、赤统这三统依次循环而改朝换代的。夏是黑统,商为白统,周是赤统。相应三统的变化,改朝换代时应“改正朔,易服色”,以便“顺天志”。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则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此为“三正”。

在古代中国,天命史观往往也是帝王英雄史观。它宣扬“君权神授”,把君王看作天意的执行者,是“天子”,是“奉天承运”来治理凡间万民的。中国的封建正史,从《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几乎大都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编纂而成的,很少反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国封建社会中正统的历史观,便是这种以天命为本、以历史循环为形式、以帝王英雄为中心的史观。

在古代中国天命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缺乏与之对立的合理的历史思想。相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史学家大都力求淡化,甚至反对天命史观,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内容。司马迁、刘知几、王夫之、章学诚等杰出史学家都对

^① 《吕氏春秋·有始览类编》。

天命史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司马迁在董仲舒的天命史观得到官方支持而占统治地位之时，提出“亦欲究天人之际”，向其提出挑战。他批判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天命思想，批判阴阳家祖师邹衍的理论“使人拘而多畏”，“其语闳大不经”，称其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在记项羽自刎前发出“天亡我”的怨叹时，指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刘知几也批判了“天人感应”、“五行灾异”之类理论，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进步史学家、思想家在批判天命史观时，也批判了正统的历史循环论。其中不少人已提出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并试图探索历史变化的规律性。

战国时代的韩非已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思想。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认为，经过三个时期，文明日益进化，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史学家刘知几、杜佑等人把历史进化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柳宗元曾指出：人类社会由群而众群之长（部落）、众群之长而诸侯（部落联盟）、由诸侯而方伯、连帅，而统一天下的天子。这种进化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封建制（分封制）的产生也是由“势”所决定的，“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也，势不可也”。后来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亦“非圣人之意，势也”。^① 这里探寻的“势”，实际上已接近于历史规律了。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历史进化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也作过论述。王夫之认为人类历史是由野蛮而文明向前发展的。他说，三代以前的人“狃狃獠獠，人之异于禽兽无几”。没有物质文明（“衣裳未明”），就是到了燧人、神农发明了火食、粒食，也还是

^① 柳宗元：《封建论》。

“鲜食艰食相杂”、“九州之野有不粒食”的。^①那时“婚姻未别”^②，“昭穆之序未审”，没有丧祭制度，更没有政治组织。一直到后稷把农业生产普遍化，才奠定了文明社会的基础。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野蛮而趋文明、由万国而日趋统一。历史每进一步，“风教日趋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③历史的这种进步来自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势”。何为“势”？“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④历史发展乃“理势合一”。势之必然，源自理之当然。何为“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理”，^⑤“随处见人欲，随处见天理”。^⑥天理寓于人欲，“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惟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⑦在王夫之看来，人们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即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动力。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不少史学家在探讨历史变化的“道”或“势”时，还看到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司马迁引用《周书》所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进而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⑧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看作人类生活的基础。司马迁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人们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认为社会的奴役关系，是由人们占有财富的多寡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则什则率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⑨经济地位也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他引用并发挥了《管子》的话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

① 王夫之：《诗广传》卷五。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③ 王夫之：《黄书·宰制》。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

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

⑥⑦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

⑧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⑨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①

中国古代史学家提出的上述朴素的唯物史观、进化史观，不仅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中璀璨的瑰宝，而且就其历史认识的深刻性、合理性、理论阐述的系统性而言，在上古、中古时期的世界史坛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史学家努力探索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道”或“势”，在正确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正确的答案，未能真正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的思想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战胜和取代天命史观，不少人虽提出过一些合理的思想，但最终仍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

二、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史学的主流是资产阶级史学，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近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后期，大量外国史学著作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译成了中文，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社会历史思想。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方面，严复（1854—1921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严复系统介绍了近代西方的进化史观，并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进行了批判。他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人权理论，对于批判中国封建正统史学，使史学脱离封建桎梏，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从严格意义上说，梁启超（1873—1929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他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对中国封建史学作了批判性总结，倡导“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他指出，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指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斫书”、“墓志铭”、“蜡人院”，这样的史书，中国人“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因此，他倡导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他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史学”的理论，认为新史学应当“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新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为基础，也接受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及文化史观等思想。这些非科学的历史观使梁启超未能把他倡导的新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石之上，但他对中国封建史学发聩震聋的批判和对“史界革命”的疾呼，对“新史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开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之新风。

梁启超从理论上阐述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与原则，夏曾佑(1863—1924年)则把这种理论原则贯串到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实践中去。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是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具有示范意义的一部历史著作。

《中国古代史》贯串了今文经学与近代西方社会进化论相结合的历史进化观点。夏曾佑按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历史进化公式论述中国史前史，按“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和“耕稼社会”的历史进化顺序进行考察叙述。他还按进化论观点，依据考古学等方面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大时代，“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更化期”七个时期，把中国历史放在连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考察，试图展示中国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明确表示，该书“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即“一为关乎皇室者，如宫廷政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所及者，无不详之，其一人

一家之事无不从略；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如匈奴、西域、西羌、事无大小，皆举其略；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虽然该书中有“社会”的内容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很少涉及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且具有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倾向，但与以鉴诫为目的，中心在帝王将相活动的传统史学相比，还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史》突破了传统史学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大体例的限制，采用篇、章、节的历史编纂体例，以年代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变化为纬，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简明扼要而又完整明晰地描述出来。

王国维(1877—1927年)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代表。王国维对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并运用此方法对中国古史，特别是殷周史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何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自己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他又说：“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迎新，亦不拙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②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考证开拓了新的道路。但它毕竟只是一种考据方法，只能用于考史，而不能论史。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章太炎(1869—1936年)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也作出过建树。他撰写了《馥书》、《史学略说》、《中国通史目录》等多种史学著作。章太炎重视历史的现实作用，认为欲“寻求政术”，必须“历览前史”。历史不是单纯“褒贬人物，牖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③他用历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

② 王国维：《殷墟文字类编序》。

③ 章太炎：《史学略说》。

史进化论分析考察了上古历史,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同西方近代史学相比,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产生迟缓,发展时间短暂,成果也远不如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那么丰富。

虽然如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毕竟使史学发展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较之封建史学,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反对天命、循环史观,反对封建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提倡人性、理性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家大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严复等人都信奉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存在着生存竞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动力和规律。夏曾佑在他的《中国古代史》中明确写道:“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以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生存竞争被视作历史进化的动力。那么,人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和结果又是受什么制约的呢?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历史观多为多元论,他们注意到了制约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但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等人尤为重视和强调的是人们的心智因素,强调人们的心理变化、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他们用这种以人性、理性为基础、以历史进化为内容的历史观来呼唤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维新和改革,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2. 反对把历史撰述归结为给统治上层立传续谱,主张写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他们提出,写历史不能只供统治者体验安邦治国之道,而应面向广大国民,启迪民智。

3. 在史书编集体裁上,便于综述和论证的章节体,代替了古代史书盛行的编年、纪传等体裁,成为史书撰述的主要体裁。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观的主要特征。
2. 简述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观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古代、近代的西方史学

一、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学

西方史学发源于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人的历史意识最早萌发于希腊神话中。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化宝藏中一颗璀灿的瑰宝。希腊神话中关于地母该亚及“提坦”神和奥林匹斯神的传说,涉及了世界和人类的起源,描述了神系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时序观念。希腊神话还折射反映了人类历史早期的某些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形成于公元前 9—8 世纪的《荷马史诗》反映的历史意识和具有的史料价值较希腊神话更前进了一步。《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描述了公元前 12 世纪希腊联军对位于小亚细亚的特洛耶城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的某些片断。《荷马史诗》的主人公已不是神,而是俄底修斯、阿喀留斯等作为部落军事首领的英雄。《荷马史诗》是一部反映希腊原始社会历史某些片断的英雄史诗。史诗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识,并有大量有关此期社会生产力、经济与社会关系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记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约与荷马同时代的诗人希西阿德具有了比《荷马史诗》更为明晰的历史意识。他的著作《田功农时》描述的不是神和英雄的活动,而是凡人的劳动生活。希西阿德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把它分成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五个时代,表达了历史退化的意识。希西阿德注意描述现实社会及其历史,并赋予历史变化以某种连续性和方向性,向真

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跨进了一步。

与古代东方一些国家相比,古代希腊历史记录的产生要迟缓一些。希腊一些城邦成文的史事记录大都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之后。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在爱奥尼亚出现了一批用散文记事的“纪事家”,将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和自己的各种见闻用散文形式记录下来。这些纪事家的活动对希腊史学的产生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希腊史学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被后人称为“史学之父”,他的传世著作《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努力从人事的角度探讨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去分析战争的结局,注意观察分析历史事变之间的因果联系,充满了人本主义精神。对于史实,他并不盲目轻信,而是进行了一定的历史批判。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了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详述其始末的历史叙述体和记述人们生存和生活方式各种内容的社会文化史。

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6年)是古代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公元前431—前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进行了长达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期间,修昔底德曾被推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但因一次战争失利,遭人诬陷,他被革职放逐。但他始终关心着这次战争,并在放逐期间开始撰写他的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具有比希罗多德更为彻底的人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希罗多德已注意考订史料的真伪,比较各家记载的异同。修昔底德更进一步,他重视利用原始资料,对一切资料都加以严格的批判考证,他说:“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证过了

的”。希罗多德开创了历史记叙体例，但在他的著作中还枝蔓丛生，笔岔甚多，历史记叙尚不严谨。而修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一部结构严谨、内容集中的史书，他以一次战争为中心，首尾相贯，一气呵成。历史记叙体在修氏手中得到发展，并作为西方历史编纂的主要体例而巩固下来。

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标志着古代希腊史学发展的高峰。公元前5—4世纪希腊史学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此时雅典等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兴盛繁荣和思想文化活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更为关注现实的人事活动。凝聚着以往人们的智慧、经验和教训的历史，对于现实人们的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和发挥现实作用开辟了天地。但在修昔底德之后，希腊一些城邦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直接作用，史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历史编纂的体例方面，除记叙史外，编年史、传记史等体例的史书也大量涌现。伴随马其顿君主国的兴起、统一希腊和大举对外扩张，随着文献资料的积累，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叙在时空范围上也有了较大的拓展，产生了爱孚罗士的《希腊全史》之类时间跨度较长的国别史、地区史著作。在历史纪年方法上，提莫斯（约前356—前260年）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奥林匹亚德纪年。历史文献的整理和考证这时也有了发展。然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坚持的求真求是的优良传统却被削弱，史学日益向注重修辞风格的方向发展，为了取悦读者，历史记叙的不少内容常常陷于卑俗，为了情节的生动和文笔的优美，不少记载史实失真。

古代罗马的史学承自古代希腊，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希腊人在文化上却征服了罗马。古希腊的史学传统在罗马得到了承继和发扬。但由于罗马与希腊的社会状况有所不同，罗马史学与希腊史学也有差异。罗马是以农业为主，靠军事征服扩张而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与希腊的雅典等小国寡民、工商业发达的

城邦不同,罗马社会中家庭、家族等各种社会联系纽带更强,统治与服从、个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人们思想和言行的社会规范性得到了更大的强调。因之,罗马史学家大都十分强调史学的道德垂训作用,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坚持的那种追根探源、求真求知的自由探索精神却未能得到很好地发扬。

罗马帝国前期是罗马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也是罗马史学发展繁荣的时代。古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当推帝国前期的李维和塔西佗。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曾受到过奥古斯都的礼遇。他的著作《罗马史》(全称为《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十分注重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他大力宣扬爱国思想,用浓笔重墨热忱地赞颂罗马的历史与罗马人祖先的美德和业绩,讴歌罗马历史上的英雄,用罗马先人的美德来针砭时弊,抨击帝国时代社会风气的日益颓丧,唤起人们继承和宏扬祖先的美德,使罗马保持长盛不衰。李维的《罗马史》记叙了罗马七百多年的历史,是古代欧洲第一部时间跨度久远的通史著作。

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有《历史》(又称《罗马史》)和《编年史》(又称《罗马编年史》)等。他十分重视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在史学史上塔西佗是以“道德史家”著称的。他说:“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①塔西佗站在罗马贵族共和派的立场上,赞美罗马帝国之前的共和制度,批判暴政,揭露和鞭挞暴君,批判专制制度。他的历史著作被后人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但在史学思想上,塔西佗仍主张史学家记事载言,须“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弃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②故此,虽然塔西佗记事载言和评价历史不无偏

①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②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颇,但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仍是客观的实录。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希腊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如波里比阿、普鲁塔克、阿庇安、阿利安等。波里比阿是其佼佼者。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前122年)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势力如日中天、逐步征服和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时代。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变化激励波里比阿研究历史,分析历史变化的原委。波里比阿的《历史》(亦称《通史》),把整个地中海地区视为一个统一体加以研究,注意各不同地区历史事变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通史。波里比阿研究历史,不限于陈述历史事件,还努力去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分析罗马成功的奥秘,对历史,尤其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历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波里比阿提出了一套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他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用是以史为鉴,而唯有如真实可靠的历史才能为现实提供借鉴,因此,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求真。他说:“‘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是无稽之谈?”^①他身体力行,写出了一部信史。波里比阿还对史学家的素养提出了要求。首先是史德,他倡导史家治史要客观公正,抛弃一切个人成见,更不可凭主观好恶曲解历史,臧否人物。其次是史才,一个好的史家应具有必要的地理知识、政治军事知识与才干和收集整理资料的本领三种才智。波里比阿的史学理论标志着古代欧洲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陷入危机,罗马世俗的历史学也走向衰落。在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的灾难中,基督教会逐渐取得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古典世俗的历史学逐渐被基督教史学取代。到中世纪的西欧史学不在世俗的书屋,而在僧侣的寺院,史书述说的重点不在现实的人间,而在空渺的彼岸世界,人的地位、尊严与价值不在于人自身,而是要到上

^① 波里比阿:《历史》第一卷,第四节。

帝那里去寻找。史学沦为神学的侍婢。

与古典史学相比,基督教史学用宗教传说代替了信史实录,用宗教迷信代替了求实求真。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他们不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经验研究,而是求之于内心,借助于直觉体验去领悟所谓上帝的旨意,或从神学信条中去发挥微言大义,引伸比附,以此解释历史。与古代希腊罗马世俗的历史学相比,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史学具有明显的落后性。

然而,基督教史学在历史思想上也有过某些创新。基督教神学家、史学家以宗教神学的语言表述了某种历史进步观,提出了善恶冲突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动力观,提出了历史统一性和世界史的观念,尤其是他们创立了体现历史线性发展的公元纪年法。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神学历史思想是由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年)的《上帝之城》奠立基础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出自上帝的安排,是上帝通过若干必要的历史阶段而最终救赎人类的一个必然的、进步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自于上帝的旨意,并通过“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的斗争及“世俗之城”内部的斗争来实现。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提出了古代史学所缺乏的历史目的论思想,包含了一些较为深刻的思想内容,对后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是攸西比乌斯(260—340年)。他的《编年史》把他所知世界各国的历史分为“神圣的”历史(包括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包括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按统一的编年结构加以记叙,开了基督教史学写史的传统。中世纪早期西欧较为重要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主要有格雷戈里(528—594年)的《法兰克人史》和英国比德(675—735年)的《英国教会史》。比德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完善了基督教史学的公元纪年法,为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至12、13世纪后,西欧各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市迅速

复兴。现实社会的变化影响了历史学。这时,基督教史家的编年史中虽然仍旧充斥着各种宗教迷信传说,但对现实的关注加强了,记述现实历史的内容有了明显的扩大,世俗人士写史也渐趋增多。14 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风土人情。法国世俗编年史家夫瓦沙(1337—1405 年)的《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布列塔尼编年史》,记述了 1326—1399 年间上述各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世俗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推动史学中的进步倾向日益增长,为人文主义史学的产生打下了一定基础。

上古、中古时期西方史学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起伏曲折。不同于保持着连续发展态势的古代中国史学,西欧上古到中古的史学发展出现过明显的中断。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史学中,古代希腊罗马史学求真求知的优良传统被中断,古代史家坚持的人本主义史观为基督教神本主义史观所取代。基督教史学对史学发展虽也有过某些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史学较之古代世俗的历史学,是一个退步。

不同于古代中国,西欧上古、中古时期史学始终未能取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在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往往被归于修辞学之下,被看作文学的一种。古希腊和罗马虽然缺乏中国那样官修史书的传统,史学研究比较自由,追求创新和多样性、个性成为一种时尚,有利于史学的创新和进步,但片面追求辞藻和文采的倾向常常损害史学的健康发展。到中世纪,史学沦为神学的侍婢,对史学发展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二、西方近代史学

伴随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近代史学,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早在 14 至 15 世纪,在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6 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

都有所发展。17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英国、法国和欧美其它一些国家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取得并巩固了统治权力。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使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战胜了封建制度而全面巩固下来。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学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14至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展开了反封建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意大利是人文主义史学的发祥地,涌现出了布鲁尼(约1374—1444年)、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奎普亚蒂尼(1483—1540年)等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为了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史学,人文主义史学家打起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展。人文主义史学家批判了基督教神学史学的神本主义历史观,剔出了被他们夹杂在史书中的各种宗教谎言和迷信传说,研究人的活动的历史,从人事方面解释历史,总结吸取历史上人们活动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内部存在着政治修辞学派和博学派两大流派。政治修辞学派的史家们主张历史应主要研究人们以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以便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史学家们编纂史书十分注意修辞风格,用雄辩的语言、绚丽的文采、优美的情节记叙打动读者。马基雅维里是政治修辞学派的杰出史家,他的《佛罗伦萨史》和《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书》,不仅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刻意去探寻政治斗争、政体形式发展演变的规律,具有了某种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朦胧意识。

具有博学派倾向的史学家与此不同。他们研究历史目的是重建过去,如实写史。这派史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搜集、鉴别和考

证史料上。为此,他们开始建立和发展了古文字学、古文书学、钱币学、碑铭学、考古学等史学的辅助性学科,开创了近代西方史学重视历史文献研究的传统。罗伦佐·瓦拉(1407—1457年)的《论君士坦丁的赠礼》,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钱币学等方面细密地考辨证实了罗马教皇觊觎世俗权力的法律根据“君士坦丁赠礼”是一份教会伪造的文献。这一成果震撼了人们的思想,给基督教会以很大的打击。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法。他们摒弃了基督教史学将“世俗的”历史分为亚述和巴比伦、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四大君主国的分期法,比昂多(1388—1463年)提出了“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阶段分期法,后为西方史学界沿用至今。

16至17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欧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迅速取代封建制度。西欧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史学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过去和现在。以哥白尼开始的自然科学革命震动了知识界,也影响到历史学。科学革命确立了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的领先地位,带来了理性思维,也改变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考察方法。在这种形势下,16至17世纪的历史思想在人文主义史学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化。

16至17世纪的史学家、思想家开始克服人文主义史家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隔离起来考察历史的局限性,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同制约这种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改变了人文主义者的自由意志论,提出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性的思想。这时的史学家、思想家还重视了历史的时空联系性,从历史发展规律性角度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法国史学家波丹(1530—1596年)的著作《史学易解》,把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从地理环境、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解释不同地区居民习性、政治制度和历史发展的异同,描绘了世界各地相互

差异又相互联系,此伏彼起,不断进步的有规律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蓝图。16、17 世纪的思想家、史学家还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以人类知识的不断进步为核心,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念,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

关于历史学的认识这时也有所深化,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了新的发展。以博杜安·波丹、波贝利尼埃尔等法国史家为主,西欧的史学家、思想家们对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和特征、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研究的资料和处理方式、治史的原则等问题,展开了论述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自然科学的新的方法,尤其培根倡导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和笛卡尔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演绎法,也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实践中。

18 世纪的西欧是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载入史册的。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了理性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是适应批判基督教蒙昧主义、批判封建制度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也是人文主义史学发展的结果。

理性主义史学家提倡理性主义史观,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人们的理性与宗教迷信、封建专制等种种非理性力量的斗争中不断展示和实现自己、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历史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批判宗教愚昧和封建专制,揭示人类理性、启迪民智,历史是启蒙的思想武器,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为此,历史学家应当站在理性的高度,以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以理性的标准评判过去,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

理性主义史学家把揭示人类理性的发展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们反对那种以单纯追求渊博知识为目的而进行资料堆积、烦琐考证的历史学,而主张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写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著作。理性主义史学大师伏尔泰曾说过:“我的目的决非积累大量总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选择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以便使读者能自己判断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和进

步,使他能通过各民族的风俗来认识他们。”^①

人类理性的发展并不单单显示在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和穷兵黩武上,而是深深蕴含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一些理性主义史学家抨击那种以帝王活动为中心,以王朝世系为线索的狭隘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认为历史的舞台不应被帝王将相独占,而应该反映整个人类的活动。他们提倡写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史,把社会经济活动、民俗风情、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以便从中表现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追溯和展示人类理性和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轨迹和历程。

理性主义史学家坚信理性的力量,继承和发展了先前已经提出、但尚不完整的历史进步观念,考察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进步历程和未来的进步趋势,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进步理论。

法国是启蒙文化的故乡,也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中心和发源地。伏尔泰(1694—1778年)是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泰斗。他的《路易十四时代》、《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等是唯理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孟德斯鸠(1689—1755年)等人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一些史学家虽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法国理性主义史学的影响,但因具体国情和史学传统不同,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英国理性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是休谟(1711—1776年)、吉本(1737—1794年)和罗伯逊(1721—1793年),德国的莱辛(1729—1781年)、康德(1724—1804年)等人也服膺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史学思想,具有理性主义史学的倾向。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史学家当推吉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堪称18世纪西欧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对基督教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洋溢着理性主义的精神。吉本十分重视原始史料,考订认真,他的著作广征博引,注释详尽。吉本将之前西欧史学中相互分立的以史垂训的传统和博学的传统揉合为一,写出了一部体大思精、

^① 转引自: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史学思想与史实俱佳的不朽的史学名著。

在西方,19世纪被称作历史学的世纪。这时,社会急剧动荡变化,历史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历史学终于摆脱了奇人篱下的处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高等学府中建立了历史学系,历史学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史学的各种专业刊物也在19世纪纷纷问世。历史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整理和出版,卓有成就,史学思想空前活跃,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史学的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9世纪的西方史坛,流派纷呈。大致上看,在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19世纪中后期,兰克学派得到发展,并在欧美各国传播,19世纪下半叶,又兴起了实证主义史学。

19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几种力量交织斗争。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启蒙思想家宣扬的“理性王国”破灭,理性主义史学渐被浪漫主义史学所取代。浪漫主义史学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逆反。浪漫主义史学克服了理性主义史学的机械片面性和用一种固定的当代标准评价历史、忽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现代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史家研究历史不再专注于“普遍的理性”,而是关注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独特性。他们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一些浪漫主义史家也反对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提倡直觉体验与移情理解。

浪漫主义史学的思想核心是历史主义。他们主张的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有机发展的过程,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研究社会现象应追溯其起源,进行历史的分析。对历史现象,要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加以研究,具体了解各历史时期的特点,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历史模式代替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研究。

浪漫主义史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统一的学派,存在着三个派别:

1. 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他们反对法国大革命和进行法国革命式的社会变革,美化和歌颂中世纪,颂古非今,有的甚至企图复活宗教神学史观,以对抗理性主义精神。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国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均属这一派别。

2.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一派史学家不满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力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按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历史英雄。他们找不到改变现状的正确道路,把希望寄托在恢复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宗法生活上。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威美尔曼、法国的米什莱、英国的卡莱尔等人。

3. 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导派别。自由派史学家对理性主义史学遗产进行了继承、改造和发展。他们纠正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片面性和理性主义史学治史方法的形而上学性。他们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肯定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以证明“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和他们取得政治统治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们继承了启蒙学者的历史进步学说,并赋予其社会历史有机和连续性发展的内容,将这一学说同资产阶级推行的社会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自由派史学的代表有英国以马考莱、格罗特等人为代表的辉格史学,法国梯也里、基佐、米涅等王朝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德国以施洛策尔等人为代表的海得堡学派,及美国的班克罗夫特等一批史学家。

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家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的阶级斗争史学。他们认为,西欧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贯串着封建贵族阶级与第三等级的阶级斗争。第三等级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和 18 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这种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这两

大阶级的决战。阶级斗争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动力,是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的一把锁钥。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源是利益的冲突,阶级关系归结为一种利益和财产关系,这些思想都是十分深刻的。但利益和财产关系的对立又是怎样来的呢?梯也里认为源于征服,基佐认为源于人性,他们最终都走上了歧途,陷于唯心主义。

19世纪上半叶,还在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史学流行之时,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已经开始建立了兰克学派。兰克本人的史学介于浪漫主义与日后兴起的实证主义史学之间,在史学思想上,他宣扬“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唯心主义史观,具有浪漫主义史学中贵族保守派的历史思想倾向。但他主张要根据原始资料写历史,对史料考证务求详尽,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又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某些倾向相吻合。兰克主张,史家治史要坚持客观主义,不偏不倚,他提倡的“如实直书”成为兰克学派史家的座右铭。但兰克本人也未能做到完全客观,而是站到了普鲁士王朝的正统立场上。史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在兰克手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不仅重视对史料进行形式批判(外考证),更提倡进行实质批判(内考证,)要求“抓住史家的性格,从而去追查他的资料来源”。

兰克一生,著作等身,其中不少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但兰克的成就并不限于此。兰克对西方史学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他用培训班的形式培养了大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史学专业研究人才。兰克的学生大多遵奉乃师的治史宗旨和治史方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兰克学派,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史坛上取得了主导地位。

在19世纪30至40年代,西方史坛上还兴起了实证主义史学,到19世纪下半叶发展为十分流行的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家响应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的号召,努力把历史学建设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实证的科学。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

国的博克尔、法国的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等人。

实证主义史学的突出特点,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博克尔指出:“历史学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只有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①实证主义史学家明确提出以探索历史规律作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由于种种局限性,他们并没有真正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

实证主义史学家首次明确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建设历史学,博克尔曾说:“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他们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首先确定精确的史实,然后分析总结史实之间的经验性规律。他们主张史学自立,反对对历史作先验的抽象思辨,同时也反对史学片面追求文采的文学化倾向。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不受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影响,他们也要求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努力消除主体意识的影响,坚持客观的态度。实证主义史家反对兰克学派致力于研究描述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个体论”倾向,主张史学应研究常规现象,经过综合分析以发现规律。为此,他们把整个社会、把文明作为研究对象。实证主义史家还把统计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实证主义史学虽然最终仍未能把历史学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但在使史学科学化的方向上作了不少努力,对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在近代西欧,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历史哲学的奠基人是意大利学者维柯(1668—1744年)和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后,经由德国学者赫尔德(1744—1803年)和康德等人加以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

^① 转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载《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年)手中达到繁荣阶段。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们围绕着历史运动的模式、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进程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维柯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康德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著作,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作。

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提倡人性、理性史观,阐发了进步的历史理论。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依次更替、螺旋循环而不断进步的,赫尔德、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伏尔泰认为是人的理性,维柯归结为个人情欲和利益追求,康德认为是人性,即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其中尤其利己性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黑格尔则认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世界精神”,但“世界精神”还需要某种直接动力,这种直接动力就是人们利己的欲望和“热情”。

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宣扬人性、理性史观,宣扬历史进步的理论,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提出过一些颇为深刻的历史思辨,但在总体上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并不尊重历史,他们阐述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经验的研究之上,而是先验地构造出某种理论,然后拼凑一些历史事实作为证明理论的实例。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学术声誉迅速下降。

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数个世纪中,西方史坛上流派纷呈,史学思想日益深化,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历史学在追求科学化的方向上不断发展。在近代时期,西方的史学由后进变先进,并成为之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原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并非科学的历史学。近代西方史学是建立在人性、理性史观基础之上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大都或者把人件、把人的自然本能、欲望、需求,对利益、荣誉、尊严、自由等的追求,或者把理性,把体现

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原则,把人的理智能力,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用人性、理性史观取代了封建的宗教神学史观。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人性、理性史观在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中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较之封建宗教神学史观,人性、理性史观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有了深化,在正确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人性、理性史观并非科学的历史观,它把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看作天经地义、决定历史面貌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的产物。因此,虽然他们努力去探索历史规律,但他们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并非客观历史的真正规律,自然不可能得到历史的验证。相反,伴随被人性、理性史观视作完美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固有的种种弊端日益展现,尤其到了本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先后发动了两次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都证实了人性、理性史观的谬误,使它逐渐失去影响力。

近代西方史学家努力向自然科学看齐,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他们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正确史观的指导,也没有真正弄清楚社会历史现象同自然现象的联系与区别,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最终仍未能把历史学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观的主要特征。
2. 简述西方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观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史学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与早期发展

时至 19 世纪中叶,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已通过革命或改革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西欧

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蓬勃开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全面确立和巩固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用科学的历史观来认识现实社会,指导自己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代表着大工业生产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因而促使一批以促进人类解放为己任的、最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站到自己这方面来,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从理论上探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探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历史条件和道路,创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将无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斗争引导到自觉斗争上来。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为科学地认识历史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作用日益显露在历史舞台之上,使以往隐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后面的历史发展动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为人们正确认识它们提供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①

为了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一面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一面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中探索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并进而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总体的审视,终于发现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青年时代都曾相信过黑格尔的哲学。但他们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利而劳动的职业”，^①“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这使他们能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分析与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中，不断地“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下”，^②从黑格尔出发，然后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克服费尔巴哈而走向唯物史观。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又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的创立，在人类历史思想上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和普遍规律，揭开了蒙在历史上面的神秘面纱，展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此之前的社会历史观，往往从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和理性出发去说明历史，把人的动机、意识、欲望等看成历史的终极原因。唯物史观与此不同，它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⑤的原理，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找到了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为科学地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已有不少史学家、思想家曾努力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但他们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或归结为超社会、超历史的某种外部力量，或归结为人性或理性，并未能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页。

③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第3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正发现人类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这一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出发,发现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必然结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物质关系,这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一定的上层建筑。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通过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唯物史观创始人揭示出了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指引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唯物史观把人们的物质生活、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作为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自然也肯定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创造者,是主宰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唯物史观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缺陷,恢复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现实革命运动的同时,运用唯物史观作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在革命实践和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并对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投身革命斗争,通过革命实践检验了自己的唯物史观。革命结束后,他们又认真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详细地分析了革命的过程及其失败的原因,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历史著作,恩格斯还研究了16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写下了《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通过历史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分析,为新的历史科学提供了典范。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还写出了《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史学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系统总结了当时对史前人类史的研究成果,首次对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从而将对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基于科学基石之上,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对各种歪曲唯物史观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论述了原始基督教及其社会学说的起源、基督教会的演变、罗马帝国的瓦解及蛮族入侵在罗马帝国灭亡中的作用、西欧封建制的起源等一系列历史问题,开辟了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对史学的治史原则、研究方法,也作了不少论述。他们强调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点是实事求是,探索客观真理。恩格斯曾强调指出,他和马克思都认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要求是尽可能充分而全面地研究历史事实,因为只有这种研究才能向历史学家揭示历史过程的真正规律性的实际表现。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一贯反对把唯物史观当作套用的教条,主张应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①

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客观性和党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科学的研究不应带先入之见,为某种理论作解释。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①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不同于客观主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与所谓的客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客观主义盲目崇拜历史规律的作用,从而把历史规律变成了为已经完成的事件及其参加者辩护的借口。唯物史观揭示了事变的历史制约性及其阶级背景和本质,但并不站到为主人公辩护的立场上去,并不取消历史学家对行动中的各种阶级力量和事件参加者作出全面的历史、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职责。历史科学的使命不是静观已经结束的事实,而是用历史科学发现的真理、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解放事业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研究,顾及到了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他们不仅利用传统的政治史的资料,还利用了各种经济资料和技术史、军事史、科学史及文化艺术史的资料。对于各种历史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都力求详尽地占有史料,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可靠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他们不仅对史料作形式批判,更注意对史料作实质批判,揭露史料记载者及史料本身的阶级性,清除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歪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了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总体和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科学假说与证实法等多种跨史学的和跨学科的方法。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大量研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唯物史观创始人亲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初步发展。这时,在欧美国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史学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126页。

他的主要史学著作有《莱辛传奇》、《论历史唯物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等。梅林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把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用来剪裁历史事实的刻板公式,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了大量开拓性的成果。他的《莱辛传奇》一书曾得到过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拉法格(1842—1911年)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当时颇有声望。他的历史和理论著作主要有《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法国的阶级斗争》、《1876—1896年的法国社会主义》、《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等等。拉法格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基本原理及史学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人拉布里奥拉(1843—1909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他撰写了《唯物史观概论》、《历史哲学问题》等大量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及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介绍给意大利学术界,开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译为俄文,发表了大量论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撰写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批优秀的历史理论著作,深入考察了唯物史观同以往各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思想联系和原则区别,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理论著作曾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评价。恩格斯把《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在俄国的出版看作“一次巨大的胜利”^①,列宁则称这部著作“培养了一整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3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①

普列汉诺夫还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德国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拓荒性工作。虽然普列汉诺夫生平后期在政治立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理论上仍坚持了唯物史观。普氏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阐述唯物史观,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历史理论,以开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这时涌现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学术活动的重点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研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他们尚未能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大量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阐述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失误,但谁都无法否认,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期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

在我国,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传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李大钊(1889—192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思想史讲义》、《史学要论》等论著,介绍和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以往的历史观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评析。他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论著,运用唯物史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研究中国思想史,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先河。李大钊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材料和古代文献记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科学地解释中国古史作了有益的尝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267页。

试。此外,李达等人对宣传唯物史观、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中成长壮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为革命路线和方针的制订提供科学的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展开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同法西斯主义史学、封建买办史学和封建正统史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论战和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断深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在斗争中成长,涌现出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郭沫若(1892—1978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众多的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首次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交替的过程,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史的科学论著。郭沫若在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在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果说李大钊主要是在理论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则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史研究实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

吕振羽(1900—1980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在学术上都有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名著。翦伯赞(1898—1968年)对于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范文澜(1893—1969年)对中国古

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侯外庐（1903—1987年）对中国思想史、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建国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至1966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各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各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大都设立了历史学系，各种史学研究的专业刊物也相继问世。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逐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历史，使中国历史学在科学的大道上迈进。在这一时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辟和占领了众多史学领域，并围绕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在50至60年代，中国史学界先后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大问题。这些讨论深化了认识，培养了队伍，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建国后前十七年的史学发展是多方面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无数地下宝藏重见天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明清档案和其它一些历史档案资料得到利用和整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被汇集出版，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得到校勘、标点和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问世、范

文澜重新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再版、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成书、吕振羽对《简明中国通史》的修订、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完稿、及其它一些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的问世,都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水平。

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有过挫折,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政治上“左”的干扰,损害过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些颇有建树的史学家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另外,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中存在过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失误,等等。虽然如此,这十七年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仍是巨大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6年。这时,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用“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历史学脱离了科学的轨道,也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许多史学工作者受到了迫害和压制。

第三个时期为1976年至今。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科学事业展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十几年来,各种史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建立、史学刊物和史学著作的出版发行,数量之多,前所未见。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建设壮大,成就著目。

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成熟、活跃。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逐步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全面、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史学理论和方法,逐步克服了以前曾存在过的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史学家的视

野不断扩大,他们注意批判地吸收当代国外、尤其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中一些合理的、积极的成果,以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从长期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的深度上,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在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更新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展。史学理论的研究得到了重视。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及历史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同时,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微观研究也得到强化。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的方法和系统方法等多种方法都开始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之中,使历史学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沿着健康的道路向新的高度发展。

三、当代西方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历史和欧美国家历史进程巨变的推动下,西方史学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开始不断遭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一些史学家呼吁史学改革,致力于建设不同于西方传统史学的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式史学先后受到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兰普雷希特(1856—1915年)、法国《历史综合评论》的创始人亨利·贝尔(1872—1954年)和美国“新史学”提倡者鲁滨逊(1863—1936年)等人的批判。这些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着眼于精英人物的活动,以政治、军事、外交史为中心,专注于描述具有个性和特殊性的历史事实和事变的过程,具有片面性,提倡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开阔历史视野,更新史学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指出,

史学研究不应醉心于研究具有个性和特殊性的个别历史事实,而应研究具有常规性的历史现象,历史研究不应集中在政治史上,提倡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文化史。贝尔也反对传统史学热衷于研究个别的、分散的历史事件的倾向,提倡历史综合研究。鲁滨逊等美国新史学家高擎“史学改革”和“史学民主化”的旗帜,提倡研究平民百姓的历史,使史学“民主化”,提倡历史与现实结合,将史学研究与现实进步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提倡打破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壁垒,进行跨学科式的历史研究。

1929年,法国两位年轻的史学家费弗尔(1878—1956年)和布洛克(1886—1944年)在斯特拉斯堡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不过是像在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小的玩具船,然后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以《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阵地,费弗尔和布洛克对传统史学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史学研究范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年鉴》杂志成了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发源地,费弗尔和布洛克成了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费弗尔和布洛克反对传统史学迷信史实和史料的倾向。费弗尔指出:“不是‘过去’产生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产生历史”。^①并不是所有历史事实都是现成存在的,历史事实需要历史学家通过各种方式构造出来。他们反对传统史学把文献资料看作历史研究的唯一根据,反对“让文献资料自己说话”的主张,认为史料本身不会说话,需要历史学家对它提出问题。他们认为,必须通过现在和过去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历史。布洛克提出,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

基于以上认识,年鉴学派创始人反对传统史学把历史研究局限在狭隘的政治史范围内、孤立地研究和描述历史事件的做法,提倡“总体史学”,主张研究历史的全貌,研究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具体的历史现象同样要作总体的把握和研究。他们反对历史研究以精英人物为中心,大力

^① 转引自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1页。

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主张着重研究下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他们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叙述历史事件，主张史学要按科学的程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学”。适应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不断深化的需要，他们坚持史学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和吸收诸如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在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对话和联盟中，不断推进史学的科学化。

费弗尔和布洛克在批判传统史学、阐述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历史研究，为新史学提供了垂范。费弗尔的著作主要有《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土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历史引论》、《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布洛克写下了《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封建社会》等重要著作。

19世纪末叶以后兴起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对于批判传统史学、推动新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对历史学科的地位和特征、历史认识的方式、历史知识的特点等问题，加深了认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最先兴起于德国、后传播到西欧许多国家的历史主义思潮，探讨了历史现象同自然现象的区别，从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与认识方式上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主张史学自律，或曰独立。这些历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尔泰（1833—1911年）、文德尔班（1848—1915年）、李凯尔特（1863—1936年）、克罗齐（1866—1952年）、科林伍德（1889—1943年）等人的思想，虽然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是不科学的，但他们对自然现象与社会历史现象、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分，有某些思想还是合理的，对于克服近代西方史学、尤其实证主义史学不顾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盲目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倾向，认识和发扬历史科学的特点，还是具有某些积极作用的。20世纪上半叶，尤其在30—40年代，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特点的研究又盛极一

时。不少人陷于相对主义乃至历史不可知论。但这一讨论有助于揭穿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史学家的主体影响,使史学走出专注于搜集考证资料的象牙塔,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创新。

当代西方新史学包容了众多的史学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包括了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它包含了社会史、家庭史、历史人口学、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心智史等多种流派。但从根本上讲,新史学各流派大都是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史学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为代表欧美史学发展趋向的潮流。

二战后,年鉴学派有了新的发展。1946年,《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历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有了进一步的拓展。1956年,该杂志由布罗代尔(1902—1985年)继任主编。布罗代尔继承和发扬了费弗尔与布洛克的史学传统,将年鉴学派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布罗代尔继续提倡“总体史学”和结构史学,继续坚持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推进史学的科学化。布罗代尔对年鉴学派、对史学发展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三时段理论,提倡加强对决定历史运动的长时段、即结构的研究,推动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走向深化。他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等著作,充分展示了他的历史观和恢宏的历史视野,成为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作品。

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费弗尔曾说过:“今天只要稍有思考能力的史学家,都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只要他受过教育,就会沾上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方法。”布洛克也承认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能力的钦佩”。^①当代西方新史学突破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模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为值

① 转引自: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1页。

得称道的是新史学提倡“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新史学反对以政治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史学传统,提倡写普通人的历史,认为普通百姓的历史活动具有比领袖、精英人物更为重要的意义,主张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审视历史,将史学研究从体现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扩展到平民百姓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来,从反映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事件扩大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上来,使历史认识和史学研究走向深化。新史学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丰富更新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进步使西方当代史学较之 19 世纪史学具有了许多新的面貌,推动历史学不断向“科学的历史学”或“历史科学”迈进。

但是,当代西方史学仍是唯心史观占主导地位。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力图站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但又很难真正把握住它的脉搏,他们努力试图把史学推上科学的轨道,但每前进一步,又出现新的困惑。在史学本体论上,当代西方新史学家大都主张多元折衷论和非决定论,强调历史偶然性,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在史学认识论上,当代西方史学家大都摒弃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主张的“排除自我”的客观主义认识论,承认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 and 影响,重视理论的作用,这是一种进步。但不少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由此走向极端,陷入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怀疑论。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新史学家大力吸收借鉴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使史学科学化,但又往往陷入机械地搬用或模仿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倾向,使历史学的“科学化”徒有其表。

进入 80 年代以来,西方新史学的某些缺陷已开始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西方史学家能否发扬新史学的优点,克服新史学的局限,向科学的历史学再跨进一步? 人们将拭目以待。

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历史学是随着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

发展而发展的,作为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这是历史学发展的一条根本性规律。直观地看,历史学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的高低,但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参与和感受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度和广度从主观上看取决于研究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客观上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和当代史学,历史学不断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发展;历史观从天命神学史观演进到人性、理性史观,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研究的重心从帝王将相、精英人物转移到普通民众;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全部人类活动领域的整体的历史;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记事记言记行以提供历史教训发展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启迪人们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自觉地创造新的历史;其间每一步的进展都是在社会历史进程本身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的。认识到历史学的这一发展规律,使我们确信,历史学从单纯的记事记言记行以提供历史教训的一门学问,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乃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还表明,历史学要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客观上固然要取决于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发展,主观上则取决于历史研究者对客观历史和历史学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取决于研究者对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水平。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引研究者对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达到科学认识的指南。

复习思考题

1.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怎样产生的?
2. 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
3. 当代西方史学有哪些新的特点?
4. 为什么说历史学是随着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四章 历史认识的过程 层次和检验

第一节 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一、历史认识的主体

1. 谁是历史认识的主体

当我们着手对历史认识活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首先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谁在从事历史认识活动?历史认识活动认识的
是什么?这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

历史认识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历史认识主体就是现实的人类。除了那些还不能将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昨日之事与今日之事区分开来的婴幼儿之外,任何人,当他抱着某种目的或为某种需要所驱使去回顾以往、思索过去时,他就进入了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就成了一个历史认识的主体。这种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的历史认识主体,可以称为广义的历史认识主体。

人生活在空间中,同时也生活在时间中。每个人的日常活动都是以他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为根据的,根据这种认识来安排和规划他现实的活动和将来的方向。没有这种认识,他的活动就会变得漫无目标。因此,任何人都需要有关于他的历史的认识。

但是,人类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是通过群体进行的。群体由个体所组成,但不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社会生活的群体性要求人们去回顾、关心和记忆群体的历史。如同每一个普通的人需要有自己的历史意识,需要认识和记

忆自己的历史一样；人类也需要有自己群体的历史意识，需要认识和记忆群体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彼此孤立的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前进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有其内在的矛盾，因而异常复杂，但毕竟是有规律的和可以认识的。历史认识就是使我们能够架设一座从过去通向现在的桥梁，促使人们不仅对今天的，而且对明天的任务有所了解。^①一个群体的现实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有效性，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一个失去历史意识的群体犹如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常常会缺乏一种清晰的生活目标和追求，缺乏一种应战的意思和能力，甚至会丧失掉群体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于是，在人类群体中，在广义的历史认识主体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专门关心和记忆群体历史的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者或史学工作者，可以称为狭义的历史认识主体。

普通人的历史认识是自发的、散漫的，常常是随事而发，不成系统的。单个人的生活实践是狭隘的，他不必去记忆哈斯丁斯战役的发生年代，不必去关心英国大宪章是 62 条还是 63 条，他所要记忆的只是他自己和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他不需要有专门的训练和培养，只要生活在社会中，生活自会教他如何记忆自己的历史和与自己直接相关的群体的历史。

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认识是自觉的、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是深刻而系统的。群体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他们具有特殊的责任和技能。他们是经过专门教育和培养，接受了一定的技能训练的人。作为群体历史的研究者，他们要确证哈斯丁斯战役的发生年代，要考究英国大宪章的具体条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探索群体活动的历史轨迹，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

然而，这并不是说普通人的历史认识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① [苏]E. M. 茹科夫著，王瑾译：《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3 页。

的。这种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广泛存在的广义历史认识主体是狭义的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基础。一般说来,前者的状况、水平和性质,大体规定和制约了后者的状况、水平和性质;而后者的认识成果(如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能否为他的同胞所接受,并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往往取决于前者的状况和水平。一个疯狂、固执和缺乏历史意识的民族,会对他们的历史学家的意见和规劝置若罔闻。如历史上的希腊人就曾不愿听取伊索克拉提斯的规劝。伊索克拉提斯警告过自己的同胞,如果他们不改弦易辙发奋图强,他们的文明就要被毁坏,他们本身就要被异邦人统治。后来的事实证实,伊索克拉提斯的忠告比德尔斐神托的女巫的预言还要灵验。^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批评美国人缺乏历史意识,忽视历史启示,以致陷入了一大堆可怕的错误之中。他说,美国人不是正由于几乎原则上忽视历史而一下子冲进了一大堆可怕的错误中去的吗?他们随意忽视法国的经验,一下子就冲进了越南战争。他们认为他们有力量、有技术、有使法国经验变得不中肯的美国生活方式。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遭受的许多失败,如果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待现在,就有可能避免。人类是生活在时间的轨道上的,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将来,而且也根植于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不去思考甚至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在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②

2. 主体认识能力的构成和要素

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按各种要素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认识主体的感知和思维能力。主体依靠这些要素进行历史信息的采集、传递、储存和加工等活动。

^①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②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42页。

认识主体自身的感知能力总是有限的。历史学家的肉眼无法感知青铜器的性质、成分的历史信息。历史学家的头脑无法处理和计算数以千百万计的历史资料,而且人体的感知和思维器官还会发生感知和记忆的误差。但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受其自身能力的限制,他们制造和使用了许多工具,借以延长和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如考古研究中的利用光谱分析仪、红外线探测仪、以及各种化学物理实验设备等对古代遗物和遗址的分析,扩大了历史学家的感知能力;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极为大量和繁复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统计,运用微缩技术、电脑软件等设备进行历史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等,延伸了历史学家的思维器官,扩大了历史学家的思维能力。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认识主体这一层次的认知要素,还应包括作为主体身体组织和器官的延长和扩大的各种工具系统。

认识能力的第二个方面是由理论、方法、知识等要素构成的。当历史认识主体利用自身的感知和思维器官及各种工具搜集了历史信息之后,就开始对信息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将它纳入一定的概念、范畴、理论框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实现在观念中再现历史和把握历史。因此,理论、方法、知识等要素是主体认识和把握历史客体的精神工具。

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论,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对世界、社会及其历史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研究课题的确定、历史资料的选择,到史事的叙述、是非得失的评价,都受到理论的支配。客观主义史学常常标榜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其实事实本身是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曾说过:只有理论能够决定什么是可能被观察的。没有理论的引导,主体的研究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淹没在史实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法上岸。当主体运用某一种理论去观察某一种历史现象时,理论的性质、状况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活动的性质和结果。如果主体的理论与历史实际基本一致,理论

就为主体的研究活动指示了正确方向,帮助他沿着一条正确的途径去逐渐接近历史实际。反之,则把主体的研究活动引入歧途,其结果与真实的历史背道而驰。

方法是主体为获得一定的历史认识而采用的操作工具。例如,怎样搜集、考订、辨识史料;怎样对史料、史实进行分类、排比,怎样从个别性的史实中归纳出普遍性的历史认识,怎样把研究成果写作成适应不同主题和不同读者需要的历史著作等,都有一系列专门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按照揭示客观历史的真相和规律的需要而制定的一系列认识的规则和程序,为主体的认识活动规定了起点和过程,步骤和阶梯。主体按照科学方法所规定的程序去展开研究活动,就可以减少错误和曲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科学家们说:“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作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事无成。”^①

知识要素在主体认识活动中主要是作为主体理解对象的已有知识基础而发生作用的,如果所见所闻的东西与主体原有的知识没有联系,主体就不能立刻把它确认为对象,也不能“消化”对象。一个没有考古学知识的人去观察一块石器工具,至多获得一些有关石器工具的颜色、形状方面的认识,而捕捉不到其中包含的有关原始先民生产状况的历史信息。主体有没有与对象相关的知识,知识的多少、知识的正确和深刻的程度,对认识活动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主体掌握的知识越丰富、越渊博,主体的理解力、洞察力就越强,就越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知识过于狭窄和浅薄,会妨碍和限制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

主体认知要素的第三个方面是由情感、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构成的。情感、意志等也是主体从事历史认识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① 《科学家论方法》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认识的内在要求需要经过一种具有放大功能的媒介才会演变为具体的认识活动,而起着这种放大激化作用的就是主体的情感因素。情感是主体对认识对象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通常表现为爱与恨、满意与不满意、愉快与不愉快、尊重与鄙视等心理状态。它一经产生,就会对主体的认识活动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①没有认识活动开展前的情感激动,主体就难以激发出实际的认识活动。与情感相联系的是意志,意志是主体为实现某个认识目的而有意识地支配和调节自己认识活动的一种心理现象。历史认识活动充满了困难和曲折,主体要克服种种干扰和障碍,有始有终地完成研究任务,就离不开意志要素的作用。古今中外有作为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他们的学识才干,也与他们坚强的意志力分不开。很难想象一个毫无科学热情、情绪低落、意志颓废的人,会在史学研究领域里有什么建树。

上述三个方面中的各种认识要素,有的为主体的认识活动提供了物质载体,有的是主体认识对象的思维工具,有的是主体认识活动的控制调节器。各种要素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相互依存,相互结合,构成了历史认识主体从事认识活动的根据和条件。

二、历史认识的客体

历史认识的现实客体与潜在客体

历史认识的客体,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但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会因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潜在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过程,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已客观地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

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①或者说,只是一种潜在的存在。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一位历史研究者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和确证他是历史认识主体一样;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只有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历史认识客体的地位。也就是说,历史认识客体是指那些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的客观历史,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等。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内容也不会固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和层次上。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内容不断地进入到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成为人们现实的历史认识客体。所以,从与主体的认识关系来看,历史认识客体又可以分为现实的认识客体和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认识客体是指那些客观上虽然已经发生过,但尚未进入主体的认识活动,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是指已被纳入主体的历史认识活动,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历史。例如,存在于公元前3000—2000年间的爱琴海诸岛上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在其后三、四千年里一直没有为世人所认识,处于潜在客体的状态。直到100多年前,它才逐渐地为世人所知,由潜在的认识客体转化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陕西临潼的秦兵马俑,已存在了2000多年,但只是到了1974年发现它们时,才成为历史认识的现实客体,在此前2000多年间只是潜在的认识客体。这种区分,既体现在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的空间范围的认识上,也可以体现在主体对历史的多方面属性、关系的理解上。

潜在认识客体和现实认识客体的区别,是以主体的实践和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61页。

识活动暂时所达到的程度和范围而言的。两者的区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和范围,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也就相应地在怎样的程度和范围里成为他们现实的历史认识客体。随着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原来那些远处于主体视野之外的历史内容,不断地进入了主体认识活动的范围,即由潜在的客体转化为现实的客体。这种转化,标志着人们历史视野的扩大和历史认识的发展和进步。

三、历史认识客体的三个层次

历史认识的客体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但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已经一去而不复返,只是留下了一些遗物和遗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那些史料可以称之为客观历史的遗存体,而客观历史本身则是历史研究者要追寻的原型客体。

但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不仅具有原型客体和遗存客体这两个层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层次,那就是历史研究者首先直接面对着的现实社会。这个现实的社会本是过去的社会的延伸体。

后面我们将要证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正是首先从他对作为历史延伸体的现实社会的体验和认识开始。

直观地看,历史学家认识历史,似乎是从对史料的认识开始的,与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没有关系。然而,作为历史的原型客体的遗存客体的史料,只是一些零星断片的遗物和遗迹,自己又不会述说它们自己的来历和相互间的联系,历史研究者又怎能通过它们去追寻原型客体呢?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在他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写到:“那个(历史)整体中只有一个微乎其微的片断能够被知道。过去的绝大部分事实已经泯灭,而且永远不可能借助我们的研究手段而重新恢复。曾经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的数以亿计的男女老幼之中,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留下了一点记载,如果要使其中的每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意

识过的东西都留传下来,就需要庞大无比的篇幅,而如果同那样一部记录比较起来,我们的全部历史知识按比例来说还比不上从一部失传的大百科全书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孤零零的逗点”。克拉克对历史学家面临的困境未免有些夸大,但却也反映了历史学家通过历史的遗存客体去追寻原型客体的任务的艰巨性,而且单纯通过历史的遗存客体去追寻原型客体,确实是不可能的。然而,追寻原型客体的目标,绝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实际上,历史学家面临的认识客体与探寻天体形成过程的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对象有某些相似性。天体物理学家所见到的现在的天体,其形成演化过程,已是许多亿年以前的一去而不复返的历史了,那个过程留下的“遗物”和“遗迹”,也就是一些极为稀少的物理、化学物质,比起那个宏大无比的物质运动过程,按比例来说,也不抵沧海一粟。但天体物理学家毕竟还能够利用那一些极为稀少的“遗物”、“遗迹”,逐渐探寻到那个“历史过程”的某些原貌。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首先是根据他们在现实中能够直接观察和认识到的物理、化学物质运动和现实的天体运动过程和规律,去对许多亿年前发生过的天体运动过程留下的“遗物”、“遗迹”进行分析,提出各种当初可能发生过的情景的假设,再利用现代实验手段加以检验,通过试错和证伪,排除不符合实际的假设,筛选出既符合现今观察和认识到的天体运动和物理、化学物质运动规律,又与新发现的“遗物”、“遗迹”不相抵牾的认识,由此而逐步恢复那个许多亿年前发生过的“历史过程”的某些原貌。

人类社会历史运动比之天体物质运动,自然是更为复杂多变的。而且,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天体物理学家那样利用实验手段去模拟和重现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但是,正像天体物理学家现在能直接观察到的天体运动和物理、化学物质运动规律与许多亿年前发生过的天体演化过程的根本规律具有一致性一样,历史学能够直接观察体验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与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规律,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历史学家也可以而且实际上也确是

在不同程度上像天体物理学家那样,以他们对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的认识为依据,去分析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留下的遗物和遗迹的含义及其相互联系,从而逐步探寻到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的某些原貌,进而逐步达到恢复比较完整的历史真相的目的。

因此我们说,历史学家面临的历史认识的客体,实际存在着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历史原型客体的延伸体的现实社会,接着是作为历史遗存客体的实物和文字史料,最后才是隐藏在历史的现实延伸体和遗存体后面的历史原型客体。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历史认识的主体?
2. 历史认识的客体包涵哪几个层次?

第二节 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

一、“鉴往知来”与历史认识的开端

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者循着历史认识客体的三个层次逐层推移地考察和研究的过程。

我们首先来看历史研究者是怎样从他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和感受而开始他对历史的认识的。

历史学是一门专门解答人类历史领域中的问题的科学。历史领域中的问题,之所以需要人们去关心和研究,那是因为它与现实的问题密切联系。古人曰:述往事,思来者。意思是说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和思索,为的是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和展望未来的趋势,但是,从起因和缘由上讲,我们又可以说,人们是为了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和展望未来的趋势而回忆和思索历史。所以又有“欲知来,鉴诸往”的说法。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说,“人不像北极冰层用冰冻保存几千年前的猛犸一样将过去保存在他的记忆之

中。人从现实出发——而正因为总是通过现实，他才认识和评价过去。”^①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怎样激发起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呢？对此，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作了详细的说明。

克罗齐曾说：“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那么，当前生活中的兴趣是怎样使人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呢？他举例说“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察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的情形一样。”^②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学家，只有她或他感到古希腊人的生活习俗、爱情情感或柏拉图的思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时，才会去认真地考察古代希腊人的生活习俗、爱情情感或柏拉图的思想。这种息息相关之情感的产生，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他事先已经通过课堂或其他途径获得了一些历史常识，其中包括有关古希腊人的生活或柏拉图的思想的粗浅常识。但此时他还没有感到那些常识跟他自己的现实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还没有列为他的研究课题。第二，后来某个时候，他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向他“提出了”有关的“文化”问题，使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上去寻找某些答案。于是，他就回忆他的历史常识，想一想其中有哪些与他想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有关系。这样，他就想到了古希腊人的生活或柏拉图的思想，正好与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文化”问题息息相关。于是，他确定了研究的课题，带着强烈的寻求答案的情感去研究古希腊人的生活或柏拉图

① 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郝应伟译：《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②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的思想。克罗齐又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①

应该说，克罗齐对历史认识的开始过程的论述，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即历史认识主体首先是感到现实生活向他提出了使他感到“焦虑”和“折磨”的问题，再带着那种“焦虑”感和“折磨”感去向历史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而一旦当她或他从历史中寻求到了使她或他的“焦虑”感和“折磨”感得到“解决为止”的答案，就最后形成了他的历史认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对历史发展过程作过系统性思考的历史认识主体，他们的历史认识活动的萌生和形成，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例如，司马迁既惊叹秦汉之间的历史巨变，又亲历了西汉由盛转衰的种种境遇，现实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刺激了他到历史领域里去寻求解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罗网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撰成史学巨著《史记》。又如，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与人谈起他在抗日战争时期选择《通鉴》胡注、明代滇黔佛教、南宋河北新道教等课题的目的及动力时说：“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②西方史学中的无数事实也证明了同样的真理。例如，近代法国的历史，风云变幻，激励动荡，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拿破仑的帝国、波旁王朝的复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诸多的历史人物像走马灯似的轮流亮相，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问题，激励和刺激着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感受着这种激励和刺激，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② 转引自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基佐、米涅等，追源溯本，回顾历史，写就了《法国革命史》、《法国文明史》、《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等著作，发现和描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卡尔曾举历史学家格罗特和蒙森的史学研究为例来说明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认识与他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和认识之间的联系。他说：格罗特是19世纪40年代进行写作的一位开明而激进的银行家，他的《希腊史》，通过一幅理想化了的雅典式的民主图景，来体现政治上进步的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愿望。在他的笔下，庇里克利斯被描写成一个边沁功利主义的改革家。蒙森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由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混乱和屈辱而感到理想幻灭。他在19世纪50年代进行写作。他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收拾德国人民由于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而留下的混乱局面。在他的《罗马史》中，他那种人所共知的把凯撒理想化的作法，实际上是他极想有个强悍有力的人来挽救德国危亡的要求的产物。^①有些历史学家生活在激烈变动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史学著作所反映的往往不是一个社会和时代，而是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如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他的生命以及创作时期特别长，经历了他的国家命运中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和灾难性的大变动。人们可以在他的史学著作中看见几个不同的梅涅克，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言人。^②

同人类的各门科学一样，历史科学的认识活动产生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历史认识活动与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共同点。然而，历史认识活动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也有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地方。在社会历史科学的认识领域里，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不同的研究者，例如，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韦伯和帕森斯，会产生不同的“焦虑”感和“折磨”感，并由此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对此，克罗齐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总是回避对这样的现象作出明确的回答，或者至多只是说，那是由个人的生活经

①② 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第35、39页。

历不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那是由于历史研究者总是在不同的社会和阶级地位中生活，必然会在他的社会生活实践体验中形成或接受带有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烙印的社会历史观；由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社会历史观不同，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焦虑”或“折磨”感受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即使研究同一个历史过程或同一个历史人物，就会得出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结论。

由此可见，历史研究者在现实社会中的体验和感受，一旦开始激发起他研究历史的冲动或动机，他的历史认识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已经是把现实社会作为过去社会的延伸体来对待的，而且已经认为过去的社会与现实的社会有某种共同之理或共通的规律性，这样才促使他产生“鉴往”可以“知来”的信念，促使他要从历史中去寻找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的某些答案。

由此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从作为历史延伸体的现实社会体验中开始他的历史认识，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实社会中的体验和感受，促使他形成或接受某种社会历史观，那种社会历史观可能是很不系统的，诸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鉴往知来”……之类，也可能是比较系统的，诸如天命神学史观，人性、理性史观或唯物史观等等。第二，他从现实社会中感受到他觉得特别需要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教训的某些领域或问题，从而初步确定他要着手研究的领域或课题，甚至形成某种极初步的假设。

二、历史认识的形成

历史研究者形成上述两个方面的初步的历史认识后，就进入认识客体的第二个层次，即对作为历史原型客体的遗存体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考辨，弄清有关的史实。史料和史实考辨的得失，也受到社会历史观的制约，但同时还取决于史料搜集是否充分，考辨方法是否科学、严谨。史料和史实考辨的结果，往往

会促使研究者不断改变或修正原有的初步性或假设性的历史认识，在某些情况下只会涉及到局部性的历史情节的认识的修改，但一些关键性史料的新发现或新的考辨成果，会引起对某个历史认识的根本性的修正或改变。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对史料和史实的考辨，形成全新的历史见解，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对原有的认识加以否定，甚至突破原有的立场和社会历史观的局限，把整个历史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者对他的研究课题有关的史料和史实认识清楚后，就开始运用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或理论分析工具对那些史料、史实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加以理解和解释，做出因果判断或价值判断，最后形成对他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或过程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影响等方面形成整体性认识。这个过程就是研究者进入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第三个层次的原型客体并对它形成整体性认识的过程。

因此我们说，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循着历史认识客体的三个层次逐层推移地考察、研究的过程。

在研究实践中，这三个层次的认识过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互相交错的；认识顺序也不一定全都是从第一个层次依次推移到第三个层次。我们只是从一般认识过程来考察，说明历史认识大体上是循着认识客体的三个层次逐层推移地考察、研究而形成的。而且这主要是就历史研究者的整体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研究者，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毕生侧重甚至专一地从事第二个层次的认识即史料史实的搜集和考辨，并不着重涉入第三个层次，即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和规律性的探寻；有的则可能侧重于第三层次的探寻，而对于第二个层次的知识缺陷，则吸取有关专家的已有成果加以弥补。但是，必须记住，无论在客观历史中还是在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中，三个层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而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在三个层次的认识中都起着制约或导向的作用。但是需要看到，尽管研究者的立场和社会历史观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历史认识的结论也各不相

同，但只要他对历史真正做过一番认真的研究，他的成果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定的历史真相，或正面地反映，或侧面地反映，或颠倒地反映，总之，是不能轻易地全盘否定的。

复习思考题

为什么说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是研究者循着历史认识客体三个层次逐层推移地考察和研究的过程？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真理及其检验

一、历史认识的真理及其检验层次

真理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历史认识的真理就是经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和社会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

前已阐明，每一项历史认识实际上都包含着对历史客体的三个层次的认识，即首先是研究者在作为历史原型客体的延伸体的现实社会中的实践体验中形成或接受的一定的社会历史观和对某些现实的社会与历史的联系的认识，其次是对作为历史原型客体的遗存体的一件件史料和史实的认识，最后是对史料、史实的含义及其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乃至规律性的认识。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认识成果即历史著述中，第一个层次的历史认识一般并不直接显示出来。直接显示出来的主要是两个层面上的认识，即对一件件史料、史实的真假的判断和在此基础上对那些史料、史实的历史含义的理论解释性的判断，后者又包括对那些史料、史实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及历史规律性的判断和利弊得失、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简言之，每项具体的历史认识包含着“史实”和“解释”或“史”和“论”这样两个层面。

例如，研究商鞅变法或梭伦改革的著作，首先要通过对有关史料、史实的考辨，说明它们发生在何年何月，发起者是何许人，

他们的生卒年月和生活历程，该项变法或改革的开始、经过和终结的具体情况，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具体活动情况，变法或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贯彻实施情况……等等。总之，要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辨，阐明有关商鞅变法或梭伦改革的一件件史实，作为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判断。然后，研究者就要对那一件单项史实的历史含义做出解释，如商鞅变法或梭伦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相关的历史现象和事件促成了它们的发生，支持和反对的人各自出于什么动机去支持或反对，为什么变法或改革的措施终能得以贯彻和实施，变法或改革的发起者为什么会有他们那样的命运，有哪些偶然因素影响到变法或改革的成败，那些偶然因素后面有没有某种必然性在起作用……这些都是对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或因果规律性的判断。此外，研究者还要对商鞅变法或梭伦改革及其发动者其人其行的是非得失做出评价，要论证商鞅变法对于中国历史、梭伦改革对于希腊历史的前进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此类论证就是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

研究者对史料、史事所作的是非真伪的史实判断和包括因果、规律性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内的解释性判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就成为历史认识的真理。

怎样对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的进行检验呢？

由于在历史著述中直接显示出来的历史认识主要包含史实判断和理论解释性判断这样两个层次，由此决定，对历史认识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的检验，也相应地分为对史实判断的检验和对理论解释性判断的检验这样两个层次。

对史实真伪判断的检验主要是考察原来的史实判断的依据的史料是否充分，对史料真伪的考辨及其含义的理解是否准确，与已知的或新发现的相关史料或史实是否互相矛盾，等等。

对史实真伪判断的检验，是对整个历史认识的进行检验的基础，因为史实判断是理论解释性判断的依据和根基。如果依据和根基经过检验证明是不可靠的，理论解释性的判断就会成问题。

有时，一项关键性的史料或史实依据如果被证明是伪品，会导致整个的理论解释性判断被全盘否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达·芬奇所作的心理史学研究。他从达·芬奇的一个笔记本中发现后者对自己童年时代一次“经历”的追忆，其中写道：“那时我尚在摇篮中，一只秃鹫朝我飞落下来，以其尾撞开我的嘴，并以尾多次冲撞我的嘴唇。”弗氏便以此作为主要的史料和史实依据，对达·芬奇一生的成长历程做出解释。他推断这段追忆的具体情节不可能是真实的，不过是达·芬奇本人幻想的产物，但其中隐含着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某种真实历程的追忆。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一步推论，达·芬奇把秃鹫的“吻”附加到自己童年经历中去时，必定已经知道当时天主教神父经常讲到的把秃鹫视为母爱象征的埃及神话，而且正是那个神话诱发了他把自己想象为“秃鹫之子”的幻觉。他断定这正好与达·芬奇5岁之前的经历吻合，当时他是一个被生父抛弃的私生子，依偎在把他视为心肝的生母身边，充分舒发了他的“恋母情节”。但5岁之后他又被生父收养，此后经受的“性压抑”，促使他的“性欲动力”升华而成为更加强烈的探索欲望，驱使他始终围绕对生母的怀恋，执着地从事于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探索。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著《达·芬奇及其对童年一个记忆》一书的主要梗概。该书文笔优美，立论新颖，但却经不住历史研究实践的严格检验。后来有的历史学家发现，弗氏依据的达·芬奇笔记本那段“童年追忆”的意大利原文是一只“鸢”而不是弗氏作为史料依据的德文本中的“秃鹫”，达·芬奇本人对鸢并无好感，不可能视为“母爱”象征；还有史料表明，达·芬奇本来就是在他父亲家里出生的。这样一来，弗氏对达·芬奇成长历程和成就动因所作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解释，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倾塌下来。这个例子充分表明，对史实判断的检验在整个历史认识的检验所占有的根基性的地位。

对理论解释性判断的检验，要以对史实真伪判断的检验为基

础和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史实判断本来就是理论解释性判断的依据。但是,即使某项理论解释性判断所依据的一件件史料和史实都经过检验证明是符合实际的,对那些史料、史实的历史含义及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价值性判断也未必就一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还需要对理论解释性判断本身进行检验,主要就是对理论解释性判断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历史观进行理论和逻辑的检验,最终要归结到由社会历史运动的实践来检验。例如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做出了理论性解释。他认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的核心,是人们在经济、政治、宗教和一般文化观念等领域走向“理性化”的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的实现,也就是说,他是根据多元折衷论的社会历史观对这一历史过程做出理论性解释,在多种因素中,他特别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他认为西方那种要求人们为此生此世建功立业而艰苦奋争的“新教伦理”,激发了西方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促进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因素,并认为东方社会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儒家伦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缺乏西方那种“新教伦理”。他还认为,西方那种“新教伦理”来源于古犹太教、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中包含的“个人主义”因素,而其他宗教信仰中都缺乏类似的要素,所以不可发育出类似“新教伦理”那样的文化观念。可见,韦伯的多元折衷论的历史观实际上还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怎样检验韦伯的这种理论解释性判断的是非呢?当然要对它所依据的史实判断进行检验,于是我们发现,他对精神因素的作用的论证所依据的不少史实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可以肯定他的论证有某些合理性。但是,他引用的一些关键性的史实却并不确实。例如,西方古代历史文化观念中虽然确有某些肯定个人意志和选择的所谓“个人主义”因素,但最终还是强调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群体意志及其主宰者神的

意志,这一点,东西方古代文化观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次,从实际的社会历史运动进程来看,即使承认西方古代文化观念,特别是上古中古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确实包含着某些所谓“个人主义”因素,为什么那些因素只是到16世纪而不是在此之前发展成为新教伦理呢?究竟是文化观念自己决定自己的发展还是文化观念随着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呢?这就涉及到了对韦伯的据以作出理论解释性判断的社会历史观的检验,而社会历史观的检验又离不开对社会历史运动的实际过程的史实探寻。于是我们发现,14、15、16世纪时,首先是因为西欧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产生出来,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由此才形成了新教伦理,新教伦理的形成和传播,才反过来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助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经过这样的检验,使我们确信,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韦伯的多元折衷论和精神、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社会历史观的检验,最后还要归结到现实的社会实践检验。如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在当今“亚洲四小龙”发展资本主义的实践中受到了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四小龙”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因素促成,但强调群体凝聚力和群体协作以及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观念确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也证明了韦伯判断的谬误。我们说社会历史观的检验最终归结为现实社会实践的检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人们接受或信仰某种社会历史观,是由他的社会实践体验决定的,有的人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体验接受和信仰唯物史观,有的人则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体验接受和信仰唯心史观。我们根据自己的现实社会实践体验,确信唯物史观是真理,但信仰唯心史观的人们,只有根据更多、更新的社会实践体验,才可能改变原有的信仰。唯物史观要得到全人类或所有的历史研究者承认为真理,有赖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以

致能够促使全人类和所有的历史研究者都能从自己的实践体验中认识到它揭示的历史运动规律的确是真理。我们确信,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二、历史认识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9 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家坚信人们的历史认识是可以达到真理性和客观性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名言:如实地说明历史,不仅是一种治史的态度和原则,也是历史认识的目的和目标。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可以达到一种“不是我讲历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①的境界。同时,客观主义史学家们坚信,随着文献档案的开放,全部的历史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来到,但已经为期不远,”“不久的将来将产生终极的历史。”^②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家们对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抱着一种“悲观”,否定的态度。他们批评客观主义史学家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让事实自己来说话的治史信条,实际上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幻想。如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由于“个人的目的、愿望和偏见都掺杂在我们对它的认识过程中”,因此“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③ 乔治·克拉克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写道:有关“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由他们‘加工处理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素……。

① 法国历史学家福斯太·德库朗慈语,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② [英]查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9、10页。

③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7页。

既然所有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一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①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客观主义史学家们看到并肯定人们的历史认识能够获得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真理性的认识,这是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合理性一面。但是他们对历史的真理性采取一种绝对肯定的态度,把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客观性看作一种绝对纯粹的东西。历史学家只不过是一件工具,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而已。然而,历史学家不可能是一件消极被动的传声工具。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着本人所具有的某种主体意识的支配,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怀着某种情感去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所谓纯客观的、不带任何倾向的历史真理是不存在的。历史认识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如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②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他们看到了历史认识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主体的因素,不可能达到像客观主义史学所相信的那种纯客观的历史真理。他们看到各种历史著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根据自己对历史客体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的结果,是经过主体加工而成的主体化历史,所以它与历史客体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相同。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合理性的地方。但是,他们未能辩证地理解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关系,而是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客观主义史学对历史认识真理性的完全肯定走向对历史认识真理性的完全否定。他们把主体的“加工处理”活动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东西,看不到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客

① 《历史是什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

体的“加工处理”，总会要或多或少地或者从正面、或者从侧面、或者颠倒地反映一部分历史客体的真相。

客观主义史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分别代表了历史认识真理问题上的两种片面的观点，前者只看到历史认识的真理的绝对性而看不到它的相对性，后者只看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它的绝对性。两者的结论虽然对立，但在思维方式上却犯了相同的错误，都不是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认识的真理。在他们看来，绝对是没有相对的绝对，相对是不包含绝对的相对，相对与绝对是彼此分离、互不相容的。要克服客观主义史学、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的缺陷和错误，要坚持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即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认识的真理。这就是历史认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历史认识真理的两个属性，任何一个历史认识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只有绝对性而没有相对性或是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的历史真理是不存在的。

具体地说，历史认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包含了三个含义：

一、通常我们用绝对性来表示某一历史认识真理所包含的客观性内容，用相对性来表示这些客观性内容的近似性、不完全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历史认识真理对认识客体的反映总是近似的、不完全的，这是它的相对性；但是，近似的和不完全的反映又包含了不依赖反映者为转移的客观性内容，这是它的绝对性。

二、通常我们用绝对性来表示一种局部的完满的历史认识，用相对性来表示这种局部完满认识的有限性和有条件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历史认识真理相对于某一个具体限定的范围和条件来说，它是完满的和确定的，这是它的绝对性；一旦改变了具体限定的范围和条件，它的完满性和确定性就变成了不完满和不确

定了,这是它的相对性。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有关具体史实的单称判断,相对于要说明拿破仑死于公元哪年哪月哪日来说,它是一个完满和确定的认识,这是它的绝对性;但是,一旦改变了限定条件,把对拿破仑死亡时间的认识精确到要确定他的死亡时刻,已有的认识的完满性、确定性就不再是绝对和永恒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要完完全全地确定一个人的死亡时刻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①这同样也说明了该单称判断对对象的描述也只是近似的和不圆满的。

三、通常我们用绝对性来表示历史认识的至上性,用相对性来表示历史认识的非至上性。历史本身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反映这个无限发展过程的历史认识的真理,只能在人们的世代的无限系列中实现。人类的历史认识“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也就是说,按人的思维本性和认识能力来说,可以从无限多样的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的内容,这是它的绝对性;从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每次实现来说,只能通过对有限的、暂时的历史客体的认识有条件地获得客观性的内容,这是它的相对性。

相比之下,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具有更为明显、更为突出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的不完全性、近似性和未完成性更为明显和突出。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谈到历史认识的这个特点。他把人类的“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第三类科学,即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在这三大类别之中，认识的相对性一个比一个更明显、更突出。在第一类科学中“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渐渐出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在第二类科学中，由于“在这一领域中，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在第三类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①

为什么历史认识会比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具有更为明显、更为突出的相对性呢？这主要与历史客体的异常复杂性、非重复性和非直观性有关。

所谓异常的复杂性，就是说历史认识的客体较之人类其他学科的认识对象更为复杂。一方面它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服从于一定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这种运动过程和规律又不同于自然界的那种盲目的、不自觉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98页。

的目的的。”^① 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是具有高度能动性和思想感情的人类有意向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正确认识由各怀不同意向、带着各不相同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活动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历史运动,要比认识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复杂和困难得多,认识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完美性,近似性也就更明显更突出。

所谓非重复性,就是历史认识的客体较之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不重复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专门论述过历史认识客体的不重复性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关系。他说:“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②

所谓非直观性,就是指历史认识的原型客体本身已经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不能为人们直接观察,历史认识主体只能借助它在现实中留存的各种遗物、遗迹或文字记载去认识它的原型。由各种遗物、遗迹和文字记载构成的史料同历史客体的原型相比,总是存在着整体与局部、全面与片面、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和差异,由此而获得的历史认识也总是具有更为突出的相对性。“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7—98页。

自己的无知与荒谬。”^①

除了上述原因外,历史认识相对性的突出和明显,还与历史认识客体内容的特殊性有关。历史认识是人类对其自身以往的活动认识,历史活动虽然过去,但它并未“死去”,而与现实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历史认识主体很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一种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来静观其发展和变化,历史认识的客体也不会像自然客体那样消极被动地让人观察,而是通过它的直接延伸体——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来干扰和影响人们的认识活动,其中最主要、最强烈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和影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里,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规律作用的揭示对每个人、各个阶级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既便利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便利了对知识的检验和修正。而在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历史规律的发现,历史规律作用的揭示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它对某一阶级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②它可以有利于这一阶级,而有害于另一阶级。即使是一些有关史实的单称判断,也常常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集团、政党等等的利益关系密切联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深有感触地说:“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③历史学家顾颉刚推翻了经书所建的古史帝王体系,在《中学用本国史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③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科书》中,将“三皇五帝”列入传说时代,结果遭来了众多的反驳和批判,理由是这些“非圣无法”的历史认识,足以动摇国本,陷溺人心,贻误世道。甚至认为把这种观点写进教科书,大量发行,就是犯罪,应该惩办。^① 所以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② 马克思虽然说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也适合历史研究。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关系的社会里,历史认识的目的不再是渊源于社会中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某个阶级的主观动机,而是渊源于整个社会的客观需要;或者说,在那里个人和集团的主观意图将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完全吻合,自由的科学研究才得以实现,那些导致认识偏差,甚至将认识引入歧途的干扰和影响“消失殆尽”(其实不可能完全消失殆尽,只是缩小和减少),历史认识才能以一种真正自觉的活动向历史客体无限逼近。^③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历史认识的真理及其检验层次?
2. 怎样理解历史认识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① 刘起钊:《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2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③ M.B. 柯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14—115页。

第五章 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一、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说明,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社会中的实践体验开始的,这突出表现为研究者在系统地研究历史之前即已初步地形成或接受的社会历史观。下面我们将通过实例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并进而说明,社会历史观一般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我国西汉时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持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历史观。他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显然是直接来自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感受:他亲自经历了西汉统治阶级由崇尚黄老之学、倡行“与民休息”政策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与民休息”,为大兴攻伐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对司马迁产生直接影响的显然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那崇尚黄老的父亲司马谈因故不能跟随武帝封禅泰山而“发愤且卒”,临终前嘱咐他继承乃父写史传世的宿愿;二是他本人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被判极刑,“深幽圜墙之中”,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些切身经历,使他痛苦地感受到西汉王朝可能由极盛转向衰败的种种征兆,更加决心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从《史记》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所领悟的“成败兴坏之理”,也就是他的社会历史观的主要内容。首先,他从“文景之治”的“与民休息”政策的成就中,领悟到统治者的政策能否顺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民心民情,使人民安居乐

业,乃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他从西汉现实社会中还观察到“凡编户之民”都不得不屈从于富豪权势门下,乃“物之理也”。这些体验,使他领悟到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这使他的历史观中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成份。他亲自经历的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政策的重大改变,还使他直观地认为决策者的主张和政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民心民情中的“物之理”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统治者、决策者中又为什么会时而出现顺乎那个“物之理”的人物,时而又出现悖于那个“物之理”的人物呢?或者说,社会历史过程中贯穿于“古今之变”的最终“成败兴坏之理”究竟是什么呢?他终究得不出一个确切答案,最后还不得不以天命或天意来作解释。例如,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慧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土,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籍,不可胜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等等。这说明,他的历史观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仍摆脱不了天命史观的窠臼。

从世界历史来看,法国复辟时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和梯叶里、米涅等人,发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于欧洲史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着重以基佐为例,看他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怎样促成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的形成。

基佐(1787—1874年)出身于一个信奉新教但具有保守倾向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最初拥护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后反对激进民主潮流,站到反革命一边,被处死。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促使年轻的基佐崇尚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成为法国保王立宪派领袖之一。1830—1847年间,他两度出任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内阁部长,并于1847年出任总理。他的政策是忠实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坚决反对来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任何民主潮流。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被迫逃亡伦敦。他曾力图联合拥护君主政体的党派重返政治舞台,

但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就集中力量从事他早已开始但时断时续的历史研究和写作。

基佐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特别他的政治生涯,铸成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他亲自经历的阶级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使他深深体验到“我们社会之各阶级的斗争在填充着我们的历史”,“我还知道,毫无畏惧、坚信胜利、并能自行其是的革命,自然地而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居于全社会之上的自己的贵族,但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贵族,在组织上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种四分五裂的贵族完全不一样。”这里所说的“四分五裂的贵族”,就是基佐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贵族”即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与之斗争的封建贵族阶级。这充分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的阶级属性。他还认为,法国革命中出现的新的上层贵族是具有特殊精神气质和智慧的优秀人物,理当承担掌握权力领导社会的重任,而劳动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则是愚昧落后的下等人,只会给社会带来动乱。他说:“现在,……在中等阶级对面跳出了个劳动阶级,在资产阶级对面是无产阶级。这一斗争也是殊死的斗争,因为新的觊觎者与从前的觊觎者一样,都是排他的”。因此他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试图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加以镇压。基佐认识到,阶级斗争产生于不同的阶级利益,而不同的阶级利益与所有制和财产关系有关。这是他的历史观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他往往又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归结为不同的政治原则和观念之间的斗争,有时甚至认为一定的所有制和财产关系也来自某种观念。这就使他的历史观中具有观念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成分。特别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他认定只有资产阶级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命运的主宰者,而劳动大众、无产阶级都是“下等人”,只能永远居于被统治地位。这是他的阶级斗争史观的阶级局限性的突出表现^①。

① 关于基佐的社会历史观的评述和本段中引述的基佐本人的论说,参见前苏联著名中世纪史学家科斯敏斯基著《中世纪史学史》第28讲。该书中文译本由尹世、陶松云、白玉等多位同志译校,郭守田教授统编定稿,东北师大历史系1985年印作教材。

通过司马迁和基佐的实例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首先来源于他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体验,进而把那种体验升华成为观察古今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种现象、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因果规律性的理论观念。也就是说,社会历史观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或前后更迭的前因后果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二、社会历史观转化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历史研究者一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历史观,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他的社会历史观就会转化成为指导他进行具体研究的理论原则,或者说,转化成为指导他的具体研究的导向性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社会历史观还可能进一步深化,甚至还可能由于发现与他原有的理论观点相悖的史料或史实,导致对他原有的社会历史观作出某些局部的、甚至根本性的修正,相应地,他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也会更加系统化。

例如,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中具有重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对国家富强还是贫弱的重大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就成为他探寻秦王朝兴亡原因的指导原则。如他在《商君列传》中指出:商鞅变法“行三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功效。他在《河渠书》中谈到秦修郑国渠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他还肯定秦统一之后,曾力图继续奉行“上衣除末”、以使“黔首是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政策,本是正道,但到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统治时,大兴土木,连年征战,致使“赋敛愈重,戍徭不已”,以致“财匱力尽,民不聊生”,“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终于引起“俊杰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的结局(以上分别见《史记》中《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张耳陈余

列传》、《平准书》等篇)。他还由此批评到汉武帝南征北战,“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已经造成“财赂衰耗而不赡”的困境(《平准书》),以此对西汉王朝的前程敲起了警钟。这些研究结论显然是司马迁以他的社会历史观作为指导研究的理论原则而取得的成果。这些指导原则,也就是指导他进行具体研究的导向性方法,促使他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治乱和国家兴衰的关系的研究,也是他用以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使司马迁在中外古代史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终究未能系统地阐明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和因果规律性,因此他最终仍免不了要把“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成败兴坏之理”归之于某种“天意”。

再如基佐,他的阶级斗争史观同样也转化成了指导他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或导向性方法。我们从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欧洲文明史》中,可以看到他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怎样贯彻那些指导原则。基佐所说的欧洲文明史是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开始的历史。他力图通过历史事实来证明,罗马帝国遗留给欧洲中世纪的主要遗产,就是市政自由思想和专制皇权思想这样两个对立的原则,而基督教会则成为连接欧洲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的纽带;在北后的中世纪野蛮时代和封建主义时代,充满了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政治原则、以王权为代表的君主制原则和以公社为代表的民主制原则之间的斗争。他特别看重中世纪城市公社从封建领主统治下争取自治权的解放运动,认为那是推动欧洲文明发展的最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开端;在城市解放运动中,各市民集团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就是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原则的体现者,下层是愚昧无知的大众,是盲目的、不受约束的民主精神的体现者。他认为城市公社的解放斗争为以后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历史拉开了序幕,此后就逐渐演化成为他自己所处的时

代的阶级斗争。^①由此可以看到，基佐力图把他的阶级斗争史观贯彻到他对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去。出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他敏锐地看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城市解放运动的历史进步性。这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他看到了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与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联系，也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他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去强调罗马帝国给中世纪欧洲留下了什么“市政自由”和“专制皇权”这样两个“对立原则”的遗产，把西欧中世纪的社会阶级斗争归结为各种“对立原则”之间的斗争，蔑视普通大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为他理想的维护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寻求历史依据等等，都是违背客观历史实际的，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和由它转化而来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历史研究者把他们信奉的社会历史观转化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或导向性方法时，那些原则或方法本身与客观历史实际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与客观历史实际的吻合或背离程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要坚持把唯物史观转化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或导向性方法，其目的就在于要从理论和方法上避免出现背离客观历史实际的偏颇，达到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的目的。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社会历史观的形成与历史认识的关系？
2. 试举例说明社会历史观怎样转化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① 对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的评述，参见前引科斯敏斯基著《中世纪史学史》第28讲。

第二节 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①

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部分,它要回答的是:哪些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力量在历史的运动中各占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地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说明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如何运动和朝着什么方向运动,它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也指导人们正确地创造现在和预见未来。

千百年来,人们对历史动力问题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他们不是把历史的动力归之于天意或超乎历史之外的“绝对精神”之类,就是归之于卓越人物的活动、个人的意志乃至天灾、疫病之类的偶然因素,或者归之于地理环境、文化观念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指出,在人们纷繁错杂、意愿各别、交互作用乃至互相冲突的无数历史活动中,“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②从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没有动力,就没有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历史过程内部的矛盾性。

历史过程的矛盾性是多样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多样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① 本段采用了宁可教授的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的部分文稿。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因此，在所有的矛盾中，物质生活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部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更基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生产力所反映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是永恒的，连续的，不能中断的，先后相承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后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并且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的生产服务。不仅如此，人们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在需要本身已经得到满足，以及人口的繁衍等等，又引起新的需要。这就使得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发展，不仅要维持简单再生产，还要进行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已有的生产的积累，而且要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在生产中获得的经验、工具、科学技术、方法、组织管理形式以及生产者素质等，总是要不断地迭加到原来的基础上去，使得生产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和内涵、越来越高的水平和质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不间断的、日积月累的，往往是通过日常的、细小的、局部的、无数次的生产活动表现出来。在古代历史上尤其如此。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它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② 邓小平同志根据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形成生产力,还必须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否则便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种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形成的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当它形成之初,它是适合或基本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因而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或形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了,往往需要进行若干改变或调整,使之适合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也因此总的量变过程中发生局部的质变。生产力也就有可能在调整了的生产关系下继续发展。然而,生产力的发展终于会达到这样一个时刻,在原有生产关系下所作的任何局部的调整都不能适应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已有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刻就来到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或是从旧社会母胎中形成的新生产关系,或是崭新的、从未有过的新生产关系,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生产关系从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到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然后经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再次使之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运动过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决定因素。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正确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或欲望,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片面的。

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而生产。问题是,这种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又是怎样才能得到满足。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有实现可能的需要。原始人最初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无意识地尝到了烧烤过的动

植物的美味,才产生了有意识地烤煮熟食的需要;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人们才产生了讲究烹调艺术的需要。人们可能产生超越已有生产力水平的需要或欲望,但只有当那种需要或欲望确是在已有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有一定的实现可能时,才能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否则,就只能像上古时代人们关于上天入海之类的幻想一样,至多起到激发人们产生龙宫、月宫之类的艺术想象力的作用,不可能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有到近代人们在已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探海航天的需要和愿望,才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这后一种需要和欲望本身已经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发展决定需要的产生和满足。

不仅如此,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个人的物质利益、需要和欲望又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这种不同和冲突,归根结底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们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 杠杆的力点,正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利益和需要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②。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强调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最终会陷入唯心史观。因为第一,那样就看不到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产生的真正根源,而势必要把它们的生产根源归之于“人性”或“人类本性”,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论者主张的“人性决定论”;第二,在那样的情况下,需要和欲望就成了不受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的纯粹主观精神因素了,把这些主观精神因素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陷入了唯心史观主张的“精神决定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环境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92页。

素,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南方”由于土壤肥沃易于取得食物,加上气候炎热,使那里的人天生懒惰而怯懦,若不迫于惩罚和威胁,就无人去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由此决定了南方盛行奴隶制和专制制度。北方则土壤贫瘠,人们不得不从事艰苦的劳动,而且战争频繁,这使得“北方”人较为勇敢、强悍,有利于发展民主制等等。有的论者还认为,临海的自然环境易于使那里的人们形成开放型的国民性格,而大陆环境则易于形成封闭型的国民性格。这类观点在论及自然条件对人们物质生活过程的影响方面,固然有某些合理成分,但把自然环境说成是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民性格的根本性因素,就成了极为片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理论不但在理论上陷于谬误,实际上也与历史事实相违。历史表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奴隶制、民主制度、专制制度等等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曾在同一个地域出现过,或者同时并存,或者前后交替地出现。历史还表明,许多海岛居民曾长期处于很少与外界交往的封闭状态,而一些大陆国家很早就建立了经常性的对外交往联系。如中国,很早就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唯物史观重视自然环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但它首先是把自然条件作为影响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来判断不同的自然条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同影响,不赞成离开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状况去强调自然环境直接决定社会制度或国民性格之类的观点。

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的水土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从而使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出现差异。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本来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当然要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还会对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马克思指出:“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

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①,显然与上述条件有关。但那些条件只是补充条件,而不是根本的决定性条件,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地处温带的中国没有成为资本的祖国,也正如马克思指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②总之,自然条件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制约作用,以及制约强度的大小,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自然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强度就相应地减弱,从而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作用也相应地减弱。

可见,唯物史观是把自然条件或地理环境的作用纳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考察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历史是人的活动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抽象地、自动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的,即由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矛盾和斗争来体现的。

阶级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562页。

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也就是说,阶级的划分,首先和根本的是经济的划分,阶级关系首先和根本的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上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的乃至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形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人们的多方面的活动和关系,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活动和关系,虽然不能说全都具有阶级的性质,但其本质的活动和关系,或者明显、或者隐晦、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或者通过多种中介,归根到底是要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和阶级的关系。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的动力作用,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通过阶级之间的关系、矛盾和斗争体现的。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方面和形式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也有和平的和激烈的形式,而最后的与最激烈的形式则是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列宁称之为“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②或“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③但这绝不是意味着暴力和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有些细小的、甚至不引人注目的形式也是阶级斗争。日积月累,它们也对历史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尽管列宁称这类斗争是“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④它不可能起到最后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和低估。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随其具体的历史条件、规模大小、深刻程度而不同的。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合生产力性质,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页。

②③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454页。

于自身利益,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就成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强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仗代表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起而斗争,而且往往要采取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给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以应有的统治地位,从而解放生产力,使之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的社会进程。“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直接的推动作用,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是十分明显的。

当某一社会制度还没有走完它的历史路程,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还适合或还没有完全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还能在现有的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得到发展的时候,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这是因为阶级社会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整个存在过程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在生产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压迫的力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的要求,总是要促使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只要这种调整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不改变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剥削阶级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剥削阶级出于本身利益,还可以主动地作一些调整。这种对生产关系的局部的、量的乃至部分的质的调整,往往需要经过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的斗争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剥削阶级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终归是以不致损害其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了威胁,就要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进行坚决的镇压。这样就使阶级斗争往往发展到再也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时就出现了被剥削阶级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只要还没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没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中译本,第813页。

先进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这些起义总是失败,即使推翻了旧政权,也不可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它限于主客观条件未能成功而否认它的伟大作用,更不能诬之为暴乱。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把暴力和革命在一定时期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归之于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无视这种斗争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看不到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一种表现,缓解或消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

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割裂开来,片面地绝对地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是错误的。同样,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割裂开来,忽视、淡化乃至否定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直接的动力作用,也是错误的。

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历史的动力也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是通过人的活动来显现的,而人的活动又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意愿和目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因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

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不同的个人的意志尽管都包括在历史的合力里面,但作用是很不一样的,有大有小,有的顺历史发展方向起作用,有的则逆历史潮流而动。而那最伟大的力量,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②“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③ 广大群众、整个阶级的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方向,也就是终归是经济的情况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方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中,最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是经济的力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则是先进的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意愿与力量。

人的活动不仅有经济领域的活动,还有政治、法律、宗教、军事、文化、思想等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这种反作用有时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决定性的。

比起经济来,这些上层建筑对历史的作用毕竟是第二位的。以政治权力与经济的关系来说,“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535页。

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当不推翻反动政权就无法解放生产力时，以革命推翻反动旧政权就成了决定性的；当革命群众没有理论指导就无法正确行动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然而，这种决定作用不过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直接表现。旧政权之所以需要由革命来推翻，是因为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严重桎梏的生产关系靠着它来维持，不推翻它就无法解放生产力。所以恩格斯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③理论只有与群众结合，才能形成物质的力量，而革命的理论，只有是物质力量的反映，才能与群众结合。哪些因素或人们的活动成为当时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或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从而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哪种历史任务决定的。上层建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正是经济的最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决定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直接的表现。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多种因素决定论”和笼统的“合力论”,因为这类理论大都是把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宗教、文化、思想观念、习俗风尚,乃至地理环境、气候、……等等因素平列看待,认为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单独地或随机组合地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方向和性质起决定性的作用,否认在多种因素中存在着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这类理论貌似全面,实则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多元折衷主义理论。它使研究者可以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认定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对某个历史过程起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或另几种因素又对另一个历史过程起决定性作用,最终会导致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导致否认唯物史观揭示的最终决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的科学理论。

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①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对这个问题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

唯心史观从意识决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极力否认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从而也就否认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帝王将相之类的“英雄”“豪杰”的个人意志、个人智慧决定历史的命运,或认为上帝之类的神的意志决定历史的命运。

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是与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低下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观察社会历史的时候,只能看到少数英雄人物的活动和作用,看不到群众的作用;只能看到英雄人物的动机,认识不到这些英雄人物思想动机的社会与经济根源。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

① 本段采用了林博士教授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的部分文稿。

水平的低下,是唯心史观存在、发展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使之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愚民政治,神化自己,因此要竭力宣扬唯心史观,颠倒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竭力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其目的就是让人们相信“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上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从而让“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世界。^①

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包括一切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的普通大众,而劳动人民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并不否认非劳动人民中一切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在促进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主要是强调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对历史唯心论主张的英雄史观。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与唯心史观不断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布鲁诺的唯心史观,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从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历史的发源这一唯物史观出发,驳斥了布鲁诺蔑视群众的唯心史观,第一次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做了深刻阐述。当时,布鲁诺极力提高自我意识的作用,宣告“自己是历史唯一的创造因素”,^② 宣称工人什么也没创造,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创造,并强调“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意识更强的意识”。在布鲁诺眼里,群众是“精神空虚”的、“消极”的。马克思、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③ 马克思批判和分析布鲁诺否定群众作用,强调英雄人物“精神”作用的根源时说:这不过是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22页。

格尔历史观的再现,“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又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人脑活动”。^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

一切强调英雄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精神”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活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③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④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把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强调这个“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不像唯心主义那样,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过去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历史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

西则被说成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了”。“因此,这种观念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①

列宁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唯心主义的历史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就在于“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其中所说的“人们即人民群众”。他尖锐地批判了俄国民粹派把人民群众视为群众的唯心史观。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而这也正是“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他还指出:“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的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②民粹派分子正是把群众视为仅仅是实现他们主观制定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材料”,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毛泽东同志也一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从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原理出发,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求共产党人像移山的愚公那样,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上帝”,而“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第1卷,第1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31、1094—1095、1102页。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非常注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的阐发。这既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直接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原则问题。放弃这一原则，就会失去群众，导致革命失败，中外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物质前提和基础，人类历史就无法存在和延续。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 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劳动。有劳动，有物质生产，才有“现实生活”。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劳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③ 对此，恩格斯还做过以下精辟论述：“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④

总之，没有劳动，没有社会生产，历史的创造就无从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这是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其一,人民群众不但通过物质生产劳动创造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民群众只创造历史发展的基础,不能推动历史发展,认为物质生产劳动仅仅是简单动作的重复,不可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如果孤立地从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的劳动生产过程来看,劳动人民从事的物质生产劳动似乎是简单动作的重复,说不上创造和发展;但从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长过程来看,却是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发展和演变的最基本的动力源泉。

正是普通劳动群众成年累月的物质生产劳动,积累着生产的经验和技术,积累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而为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源泉。在漫长的上古中古时代,许多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能干的农民和能工巧匠们直接创造出来的。近代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日趋专门化和脑体分工的发展,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主要是由科学技术专家发明和创造的,但专家的发明创造也是在普通劳动大众千百年间直接生产劳动过程积累起来的经验、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而且有不少技术专家本身就是从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的普通劳动者当中成长起来的。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史以及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普通劳动大众和科技知识分子对人类历史发展共同做出奉献的结果,而普通劳动大众在其中做出了基础和源泉性的奉献。

而且,普通劳动群众在日常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技术的过程,也是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

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①毛泽东对劳动群众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的作用，也做过言简意赅的精辟论述，他指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社会关系。”^② 这些论述对于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都是极富有启导意义的。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这种矛盾达到再也不可能原有基础上调整的对抗性程度时，就引起社会变革；而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是由人民群众做为基本的决定性的力量来实现的。当已经陈旧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时，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而也正是他们首先发起破坏旧生产关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汇合成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促进了奴隶制的解体；农奴和农民的无数次斗争，促进了封建制的解体。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变革，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能完成的。社会形态演进，阶级斗争作为杠杆，使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这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作为被压迫阶级不懈斗争的结果。

人民群众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是大多数，这就决定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新兴阶级要推翻旧制度，不联合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会失败。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利用农民、平民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才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依靠工农联盟，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是精神财富的生产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精神财富升华的源泉。同时，人民群众也是精神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9页。

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精神财富创造的源泉。所谓精神财富,主要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成果。人民群众是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第一线的主要实践者。任何科学的总结,首先必须有群众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作基础,依据这源泉,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知识总结、提炼、升华,创造出有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人类文化发源的过程告诉我们,原始艺术的原生形态,都是产生于劳动。源泉自身就是一个创造。诗歌在劳动生活中产生,建筑艺术、雕塑、绘画、农业生产知识……等等,都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生产,而且是在人民群众参与下产生和发展的。当然,我们同时要看到,许多精神财富,尤其是高层次、高水平的精神财富,是由脑力劳动者直接创造的,即知识分子创造的。正因为此,我们绝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历史创造作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创造是以普通劳动群众的创造为基础和源泉的。

总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是有充分的理论和历史依据的,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但我们也要防止对这一原理做简单化的、片面的理解,要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本身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们的历史创造作用的发挥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沉默地、被动地创造向积极地、主动地发挥创造作用的过程。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总是受到该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的总的水平的制约,受到人民群众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人民群众中的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作为一个群体,也像任何一个人一样,其历史创造作用的发挥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所设定的限度。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奴隶和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分散、落后的小手工劳动方式

的束缚,在一般情况下只能以他们的“静悄悄的劳动”创造该时代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决定该时代历史前进的总的方向和趋势,而不可能直接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台去参与重大历史活动的进程。只有在被迫发动大规模反抗斗争的时期,他们才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台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在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因受到剥削阶级的强大压抑和摧残而处于极其愚昧落后的状态下,他们更不可能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去变革现实。在只要还能维持最低条件下的生存的情况下,只能表现出听天由命和顺从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的消极态度。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奴隶阶级或农民阶级即使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也不可能单独地推翻陈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而只能在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领导之下,作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群众力量,去促成社会制度的变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无产阶级逐渐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台参与重大历史活动,但他们参与历史创造的自觉程度和积极主动程度仍受到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如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群众的不同部分在1848年革命中的不同表现时指出:“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①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仍然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生产生活条件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产业部门仍有巨大差别。即使已经形成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参与历史活动的态度以及对待本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5页。

级的先进政党的态度仍会有极大的差别,特别在复杂历史背景下,相当大量的无产阶级群众仍有可能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蛊惑宣传的影响,参加到有损于本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行列中去。希特勒纳粹党统治德国的一个时期,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特点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群众参与重大历史活动的情况就更显得复杂多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处于国家主人地位,得以作为历史的主人而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参加历史创造活动,但他们实际上发挥历史创造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参与历史活动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仍然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的水平和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的制约,仍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在复杂的历史形势下,仍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受到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煽动的影响,以至投入到有损于自身根本利益的历史行列中去,只是在经历了切身痛苦体验之后,终归会转到捍卫自身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达到高度的发展,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那时全体社会成员都会成为自觉的、积极主动的历史创造者了。

尽管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存在复杂曲折的情况,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人民群众总是通过生产斗争以及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同时也推动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且,在每个时代,也正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该时代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前进的基本方向。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必须正确地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唯物史观肯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针对英雄史观提出来的。它否定的只是离开人民群众决定性的历史创造作用而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但从不忽视杰出的个人在历史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本人就赞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肯定“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实际上,每当历史进程出现重大的转折关头时,都会有关键性的人物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唯物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考察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个人作用寓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

首先,杰出人物只能延缓或加速历史进程,不能改变历史的根本方向,人民群众最终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根本方向。

创造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归于人民群众,是由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过程中展现的。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在这一历史规律面前,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是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方向的。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影响力,是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基础上产生的“力”。真正伟大的杰出人物,其伟大和杰出之处,正是在于能充分地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投入到伟大的历史创造活动中去。历史上的一切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力的大小,总是与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吻合程度的大小成正比。正如列宁指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②历史上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当他们的历史活动适应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时,他们的事业和人格就放射出使人们赞颂的光芒;而当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5页。

害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时,他们的形象就暗淡下去,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其次,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来看,某个英雄人物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的发挥,是一种偶然性的因素,但这种偶然性终归是受必然性制约的。恩格斯对此有过深刻阐述,他在《致瓦·博尔古乌斯》的信中说:“在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① 马克思也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②

唯心史观否定历史必然性,夸大历史偶然性,把一些领袖人物或拥有权势的人物的偶发动机或性格特征视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唯物史观不能赞成这样的看法。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③ 唯物史观并不否认研究参与历史活动的人们的动机的必要性,但它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为“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途径。”^①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忽视历史偶然性,而是把历史的偶然性纳入整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并通过历史偶然性的研究,发现历史的必然内容;它把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纳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并通过对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的确定,补充、丰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内涵,使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更加完善,更具科学性。

其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包括群众和革命阶级的领袖,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文学家等等,他们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进程起着重大推进作用。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实现程度实际上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所能接受和响应的限度。这是因为,如前已论及,真正伟大的杰出人物,其伟大和杰出之处,正是在于能够体察和顺应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每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从他们现实的生产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同他们在那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上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相适应的。杰出人物应当站在时代前列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否则就不成其为杰出人物。但是,如果他们的思想、主张和行动超越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所能接受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响应的最高限度，就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孤立地位。当然，有些历史人物虽然由于其思想、主张和行动超越了他们的所处时代能够接受的限度而招致在当时当世失败，但只要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仍然在历史上占有了应有的地位。而有些超越了当时当世局限为后世指引了长远方向的人物，终于能在历史上赢得崇高而久远的历史地位。当然，那种历史地位也只是到后世的人们真正能够领受和吸收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时候才能获得。一般而论，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与该时代广大人民群众达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的发展水平保持着一定的吻合程度，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着那个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

由此可见，科学地考察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上的文化现象^①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又反过来对经济和政治发生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看待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现实生活、生产活动、物质交往、经济条件、斗争实践，一句话，人们的社会存在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本质的源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一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

① 本段采用了蔡乐苏教授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的部分文稿。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

政治和法律观念、道德、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始初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发生反作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经产生出来，它们中的各个部分不仅会相互影响，而且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唯物史观并不认为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它肯定“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③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社会意识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第一，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继承性，思想家、艺术家总是在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成果和留下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创造，而“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是他所不知道的”。^①这就形成了各种意识形态发展在形式上的“独立历史”；第二，社会意识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历史上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②另一方面，当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旧的意识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第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并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影响。但是这种反作用只是第二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明确肯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③所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首先必须承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来源于人们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过程的；其次，要看到观念形态的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人们现实物质生活过程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第三，在强调文化的反作用时，仍不能忘记它毕竟是第二性的作用，归根到底，“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④

“文化基因论”或“文化根性论”，认为文化中有一种不依存于实际过程的发展演变而独自世世代代传袭下去的“基因”或“民族根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特性，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荣辱。如认为：“文化的基本内核来自传统，其中的价值观念最为重要”；又如过于夸大“文化习惯”对人的决定作用，认为“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⑤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5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⑤ 本迪克特著，《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正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是随着实际生活过程的发展演变而相应地发展和演变的,这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总是具有反映着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的特征。所谓实际生活过程,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还包括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这些生活过程都是在自己特有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必然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中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的封建文化是各有特色的。同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意大利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又都各有不同特点。唯物史观不但不否认这些差异,相反还要重视分辨和研究这些差异,研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十分重视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特殊性的研究,特别是在对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存在,而且把这种特殊性作为考虑斗争形式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看法与前述那种“文化根性论”和“文化决定论”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它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特征都是来源于该民族的物质生活过程,并随其发展演变而变化,不可能有一种不依存物质生活过程而独立自在和永恒不变的“文化根性”或“民族根性”。其次,唯物史观主张对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及其对现实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做具体的分析,反对从种族主义观点出发,把某些民族的文化 and 传统判为优等,把另一些判为劣等。

唯物史观在承认民族文化存在一定特殊性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文化作阶级的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总是离不开一定的阶级地位的,从实际生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也就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特性。“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

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①“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②“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③在阶级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由于在社会的物质关系中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因而在观念形态的文化中也占据着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把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等观念说成是全民族的、超阶级的，把它们提出来作为普遍的生活准则。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维护统治的精神手段，和对自己统治的一种粉饰。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④列宁则明确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所谓两种文化，就是指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和被剥削阶级的文化。列宁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⑤这些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抽象地谈论一种文化，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抓住文化的真正本质。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恩格斯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 尽管这种改变的速度、程度和形式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是，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基础相应的新的时代特征是明显的。从社会发展大的阶段看，原始公社制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都有相应的时代文化特征。

例如，从自由、平等观念的时代演进过程看，原始时代还没有产生阶级，人们普遍承认原始平等原则，但不能容忍任何部落成员保持不同于本部落公认准则的独立个性。在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绝不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认为不平等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奴隶制时代的人们首先要承认自由民与奴隶生而不平等。在自由民内部虽然承认某种相对于奴隶而言的平等人格，但仍要按财产、门第和职业区分高低贵贱。封建社会也是等级界限森严的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不但首先强调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生而不平等，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把不同等级门第之间的不平等视为天经地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打破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们才逐渐普遍地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和个人独立性的原则。但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统治一切，仍然存在着阶级的不平等和对抗，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不过是以法理上、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人们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掩盖少数人运用资本的权力支配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与此相适应，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则是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们在经济生活、社会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页。

和文化上的实质上的平等,逐步实现个人在能力和个性方面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对文化的时代特性的分析原则,同它对文化的民族特性和阶级特性的分析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过程的特点来考察和判断观念形态的文化特性的。马克思对此曾做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①

文化既然是随着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发展演变而相应地发展和演变的,这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必然是既有继承和累积,也有扬弃和更新。因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延流的实际生活过程本身总是既有连续性,又有拓展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②每一代人在物质生活领域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的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也必然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每一代人在物质生活领域从事改变旧的条件活动的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也必然要从事改变旧的条件活动。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生活过程的继承和更新,与物质生活过程的继承和更新一样,是历史的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是不以任何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过程。这种历史必然性还意味着,更新只能在继承基础上更新,而继承也只能在与更新的客观要求相吻合的条件下继承。

继承和更新虽是一个客观上必然的历史过程,但毕竟是通过人们自觉或自发的选择行为来实现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现实生活的需要对文化遗产做出取舍的选择。例如,中世纪初期和中期的西欧封建统治阶级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大都加以抛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下而不能接受那些遗产,主要还是因为那些遗产的内容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如封建教士们并非目不识丁,却用锋利的刮刀把书写古希腊、罗马文献的羊皮纸上的文字或者全部刮掉,改写宗教文献,或者刮掉那些他们不能接受的文句,删改成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文献。对罗马法遗产,西欧封建统治阶级只继承其强调主人对奴隶的绝对支配权的内容,以维护农奴制度,罗马法中强调君权至上的内容,因为与当时西欧世俗封建贵族割据统治的需要相忤而遭拒弃。至于罗马法中反映商品交换关系的那部分内容,更是与当时西欧封建统治阶级竭力维护自然经济的重农抑商需要相违,所以也遭到排斥。直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市民阶级法学家,为了适应市民阶级发财致富和支持封建王权消除分裂割据的需要,才把古罗马法中反映商品货币关系和强调君权至上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挥。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才打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而其实质却是“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久受尊崇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而。”^① 中国封建儒学在二千多年间也经历了几次重大更新,每一次也都多少反映着由于封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出来的新的精神需求,而且每次更新也都是在对原有儒学的某些部分加以扬弃的同时,对另一些部分着重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以阐扬或赋予新的含义。即使添加了全新的成分,也力求使它们至少与原有体系中的某些部分互相衔接或吻合。这些事实都说明,继承和更新,都是以是否适应人们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转移的。

在继承和更新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然积累起一些有利于本民族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成分,同时也必然会积累起一些阻碍该民族发展的消极成分。一切反动的阶级和社会势力总要顽固地保持和继承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没落的文化成分,抵制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分,进步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总是力图从历史文化遗产中继承和发扬那些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分,扬弃那些阻碍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分。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那些阻碍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分终归要被扬弃,只有那些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分才会被长久地传袭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继承和传袭过程中,各个时代的进步阶级逐渐把那些进步文化成分中掺杂的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要素过滤出去,只留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成分。经过这样一次次的过滤,各个民族都会积累起一些超越短暂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而具有久远价值的文化传统,成为促进各民族继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2. 怎样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3. 怎样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上的文化现象?

第六章 历史研究的方法

研究历史的方法很多,根据它们在研究过程中的功用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即搜集史料、史实和辨识其是非真伪的方法,又称考实性、技术性的方法;以及探寻历史事实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因果规律性的方法,又称理论导向性的方法。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阐述过,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导向性方法,就是由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转化而来的指导他探求各种历史事实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因果规律性的理论原则,并对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原则或导向性方法做了阐述。因此,本章第一节只着重阐述考实性、技术性的方法,也就是搜集史料史实并辨识其是非真伪的方法,第二节介绍当代史学中常见的几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们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理论导向性方法和考实性、技术性方法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节 搜集史料史实和辨识其是非真伪的方法

一、史料搜集的方法

史料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一个人不可能遍读所有史料。要找到自己研究所需要的史料,必须掌握搜集史料的方法。

第一,充分运用文史工具书搜集史料。工具书是专供解释疑难或翻检资料的书籍,被誉为“治学的得力助手”。借助工具书提供的资料线索,可以按图索骥,有效而快捷地寻找到所需要的史料。

文史方面的工具书很多,按其功用,大致有如下几类:首先

是用于解答疑难的字典、词典类,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国历史大辞典》、《世界历史辞典》、《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等,从中可以便利地查到专业知识或资料。再者就是为搜集史料指引线索的目录、索引类。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指篇名或书名,录是指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把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我国从汉代起就注意对当时流传及以前保留下来的书进行整理记录,编成目录,以后历代传衍,留下了丰富的书目遗产。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书目最常见的有“二十五史”中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崇文总目》、《书目答问补正》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官修大型工具书,共收书 3503 种,存目 6720 种,分经、史、子、集四部,下分 44 类,类下再分 67 个子目录。部有大序,类有小序,每书各附提要,可查阅出关于某书的内容、价值、版本及材料的真伪、作者简历等,是研究古代学术指示门径的重要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丛书目录,集中收录了国内 41 所图书馆收藏的古籍丛书 2797 种,书名子目 7 万余条,包括古籍 38891 种,为查寻书目藏书之所提供了方便。索引可以提供所需要的专题研究论文篇目,确定研究选题方向,指示材料来源。重要的索引书目如《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八十年史学书目》、《廿五史人名索引》、《十三经索引》、《全国报刊资料索引》等,可供查阅。

最后是类书等史料汇编类。类书是通过摘录各种书上有关材料并依照内容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以备检索的书籍,如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等。

第二,分类搜集法。根据研究的课题,分类搜集史料,是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搜集史料的方法。这种方法亦可反其道而行之,即确定研究的大方向后,着手广泛搜集史料,然后将材料分类排

比,形成具体课题,得出结论。梁启超颇重视分类搜集法,他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轻重,及汇集同类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的状况可以跳活表现。”^① 梁启超在考察古代中西交通的道路和学术文化相互影响时,曾运用了这个方法。他从许多记载传说中搜集出中国僧人西去印度的姓名可考者107人,姓名失考者80人。再将这187人分时代、籍贯、学业成就、经行路线作种种统计,最后得出“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的结论,弥补了常人只知中国人西去印度的前有法显后有玄奘的片面认识的不足。

第三,追踪搜寻法。此法指的是研究者为搜求某事史料而浏览某书时,发现某书提到与该项史事密切相关的另一些史事,或在注引中提到了与该项史事有关的另一些书名或篇名,便追踪寻读有关的史著,循此一直追踪到未见新的踪迹方休。如为搜求有关屈原的史实,读《史记·屈原列传》,得知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与张仪的活动有关,便追踪寻读有关楚怀王和张仪的史书。这种方法用于阅读近现代人的史著尤为有用而且必要,因为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近人著书不像古人那样受到极狭小的篇幅限制,为阐明自己的见解,大都尽可能广征博引,并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成果加以评述,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追踪搜寻法更能富有收获。

第四,通过调查、采访收集口碑资料。西汉司马迁为太史令写作《史记》时,有无数皇家图书典籍可供阅读,但他仍注重实地调查,亲自寻访古代遗迹,搜集时人提供的口碑活资料,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主要地区。在《史记》里,有不少材料采自碑刻资料,历史文物资料及民间的“谶语”与神话传说。《史记》内容丰富、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读来倍感亲切,正是司马迁注意实地调查、采访,占有大量丰富史料的结果。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研究近现代史,更需要通过实地调查,获取资料。近年来,西方颇盛行“口述史学”,这是一种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取得某一特定问题的第一手口述凭证为基础,经过对照和筛选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在我国,参加或目睹过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人物尚在,口碑史学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史料辨伪的方法

搜集史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初步工作。搜集来的史料不仅经常是零乱、分散的,而且可能真伪错杂,互相抵牾,需要加以辨别。这就是处理资料的“去伪存真”的辨伪工作。

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文献中,有不少伪书。仅近人张心澂在《伪书通考》里提到的伪书就有经部73部,史部93部,子部317部,集部129部。伪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内容全伪者,如《孔子家语》、《鬼谷子》;有部分伪者,如《列子》、《竹书纪年》;有内容不全伪而书名伪或书名、著者全伪者,如《春秋左氏传》、《商君书》;或内容虽真,但时代为伪者等。这些都是研究者征引史料时应加以注意的问题。

伪书的出现,使史料真伪难辨,时代不清,给后学者带来很多认识上的难题。因此,史料的辨伪工作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辨别伪书的工作早在汉代已经开始。至明代,胡应麟在前人辨伪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见解,在《四部真伪》内,把辨别伪书的方法归总为八点:其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检查最早的目录书是否著录过。其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检查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验明此书何时代见于著录,考其流传的线索。其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考查与作者同时代的著作中,有无谈到或称引这部书的地方。其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考查后世的著作有没有引用或发挥这部书中某些言论、观点的地方。其五,“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核

查这部书的文体是否符合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其六，“核之事，以观其时。”即考查书中所记叙之事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其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托名。其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考查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胡应麟这八点辨伪方法，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概述如下：其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其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其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其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其五，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其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其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选择。其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其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二俱伪。其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畀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其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况，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推见其崖略。若其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其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以上十二例，举事证、物证、理证，基本概括了如何辨伪的各方面内容，值得今人认真借鉴。梁启超另著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所言辨伪方法，更加详密，可供参考。

辨别史料是为了去伪存真，弄清史料的可靠性，便于更好地运用史料。但伪书考证出来后，该如何处理呢？正确的态度是不应简单地弃之不用或束之高阁，而是客观地衡量伪书的价值，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利用其可取的方面。任何伪书总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以借助作者的思想观点,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考察那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所以,史料的真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样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以为某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真材料矣”。所以,对于这样的材料,“重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与作者而利用之。”^①而不是一旦确定真伪,则将伪者绝对一律摒弃。

三、史料校勘的方法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出现错误。雕版印刷未广泛应用前,书多系手抄,容易以伪传伪。有了雕版印刷后,“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袭,校讎稍疏,辗转失真,‘乌’、‘焉’成‘马’。”^②书中字体缺谬,语句脱落,衍文增句,文字、篇章前后错位,甚至改易原文等等现象,无所不有,影响了史料的真实可靠性。这说明史料的校勘,同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必要的工作。

如何做校勘工作呢?

首先是依据善本,辅之以其他佐证。清人钱大昕总结校勘工作所依据的资料时说:“凡所校定,必考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③说明校勘的基本依据有三:“善本”、“它书”与“他人意见”。

所谓“善本”,按张之洞解释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② (清)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三,《进呈前汉书考证后序》。

③ 《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卢氏群书拾补序》。

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伪不阙之本也。”^① 现在理解的“善本”，一是宋、元刻本，或称旧本、古本。宋元刻本保留下来的不多，而且人们“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② 故视之为善本。二是清代学者的精校精注本。清代学者特别讲求校勘，精校精注，取得了很大成绩，多为后人称引，故此也被称之为善本。

所谓“它书”，涉及面颇广。从文献图书以至金石碑刻，几乎无所不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谈到“它书”的范围包括：“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径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兰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之以供佐证。”

其次，注意校勘的方法。陈垣在前人校勘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校勘实践的经验，在所著《校勘学释例》中提出了校法四例，可供我们参考和采用，现节录如下：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单、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采用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选摘异同处，进行比较判定，以求知其中的谬误处。此法在未得到祖本或别本之前，最适宜采用。例如《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最后发现了节目讹误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通过少则数页，多则数卷的本校，往往可发现自相牴牾之处，从而达到校勘的目的。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是本书采自前人版本的，可用前人之书校定，如本书曾为后人所引用，可用后人

① 《潜研语·语学篇》。

② 陈乃乾：《与胡朴安书》，见《国学汇编》第一集。

之书校定；其史料如同时被两本或两本以上的书所载，可同时用转载之书核之。他校法，涉及书的范围较广，耗费功力也较多，但有时非此法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这是根据书文的体例和遣词造句的特色，对书的内容加以校勘的一种方法。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原本中“经”和“注”混在一起，很难释读。戴震潜心研究该书体例和行文特色，归纳出区分“经”“注”的三条原则，终于使该书易于释读。采用此法者，必须学识俱佳，既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力，又要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术见识，如鲁莽从事，往往难以纠误，甚至以不误为误，加剧已有的纠纷。因此，理校法是最高妙的方法，也是最危险的方法。但若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因而无所适从时，就必须运用此法。

以上所举的四种校法中，第一、二种是以本书的不同版本或本书内容进行校勘，故有人也称之为“内校法”；第三种是以要校对的书以外的各种有关的比较可靠的记载来校勘，所以又叫“外校法”；第四种方法是在以上三种方法均不能校正的情况下，根据上下文并联系当时各种历史发展的背景和线索，运用逻辑思维来考证的一种方法，是最高级也最难运用的一种方法。

四、史事的考证

对史料进行辨伪、校勘，总体上都属外考证工作，是第一级的。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对史事进行第二级的考证工作，即内考证。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由于编著者本身受到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许多伪事及谬误被有意无意地保留在他们的著作内，使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背离关系。对含有伪事和谬误的史料，非经考证鉴别，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是不能引用作论据的。

伪事的产生，主要的根源在于史学的社会历史观和其所处的阶级、社会地位的局限性。历史典籍无论是政府纂修，还是私人著

述,史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因素的限制,难免要把自己的观念、思想感情、利益倾向折射到历史记述之中,从而在史料的取舍、记载的方法和史事的评价上掺杂各种偏见与歪曲。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史籍中,史家明知其事,但出于维护统治者的脸面和利益,往往故意避讳、曲笔的现象,相当普遍。《春秋》以所谓“春秋”笔法,通过精心遣词用字,用“微言”寄寓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大义”,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首先开创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恶例,是反映史家思想观念与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的联系的典型。孔子主张写作要有充分根据,强调“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而最终是以其“必也正名乎”为准则的。比如,明明是赵穿弑其君,董狐却写成“赵盾弑其君”。孔子既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做到了“书法不隐”;又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做到了“为法受恶”。再如,明明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春秋》却讳之为“天子狩于河阳”。把周天子不得不屈尊去见晋文公写成周天子到那里打猎时碰上了晋文公,歪曲了基本事实。显然这是牺牲客观真实性以迁就主观道德规范的典型表现。再如,陈寿《三国志》中的《魏志·武帝纪》和范曄《后汉书·献帝纪》中关于曹氏篡禅的记载的歧异,是又一典型事例。《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领冀州牧”;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王不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这些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基本反映出曹氏逐步控制汉政权,最后篡禅的过程。在陈寿的笔下,情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天子以公领冀州牧”;“汉罢三公,置丞相,以公为丞相”;“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我们看到,曹氏夺取汉位的种种举措与基本过程在这里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权势斗争被掩盖了。《三国志》开创了以后修史时处理朝代更替问题的一种模式,进一步发展了《春秋》“三讳”的先例。

历史当事人对当时事件的记述往往被人们视为第一手的资料

而深信不疑。殊不知,这样的记述也未必一定能客观地反映全部历史事实。梁启超自己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①这是历史当事人对记述自己亲身经历事件的真实程度的中肯坦白。再如,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客观主义”史学鼻祖的修昔底德,他本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任雅典的将军,亲自指挥过与斯巴达的战斗。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贯被视为了解这场战争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修昔底德本人也一再申明,“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②然而人们在该书中不难发现作者对雅典的记述表露出的强烈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他甚至借伯里克利之口,自己加工了一篇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这些记述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伪事的产生,和史家著述旨趣、品德、学识等方面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史家道德品质高尚或卑劣,往往是史家能否写出信史的一个基本条件。缺乏高尚的史德,或为名利所诱,或为权势所屈,或任情使性,或挟个人恩怨,虚美溢恶,而肆行曲笔的例子为数不少。

人因传闻异词,史籍难稽,记忆失真,将文学形象的艺术真实误认为历史真实等,也会造成伪事。《史记》有“实录”之誉,人称“信史”,但其中伪事谬误仍然很多。金人王若虚著《史记辨惑》十一卷,指出《史记》有“采摭之误”、“取舍不当”等失误之处。清人钱大昕在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写《序》时也指出过:“去圣浸远,百家杂出,博采兼收,未免杂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齐画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为之讳也。”说明伪事的产生表现为多种情况,出于多种原因。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页。

史事的考订,需要有一种“致疑”精神。能疑方能致其思,能思方能究其理。只有多闻阙疑,剖析史事的源流,才能还历史以真相。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等,凭着“疑古”精神,把先秦至两汉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做了系统分析和考辨,提出了关于古史的观点,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发现,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的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时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还成了一个孝子贤孙的模范。古史辨派史学家们基本廓清了有关古史的一些缺乏实据的传说,致使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失去了依据。古史辨派的成就,为我们考证史事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例证。

史事伪误的情况很复杂,考证伪事的方法也很多。中外史学家在史事考证方面各有所长。基本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求源法。考证史事,就要追寻史料的来源。一般说来,同样内容的史料,就要优先选择用时代最早的记载。相对来说,原始史料比较准确,史事比较真实,以后辗转抄袭的第二、三手资料,容易出错,史事也因而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著名史学家陈垣很重视求源法。他曾在大学开设“史源学”课,教导学生追寻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① 因为《资治通鉴》是北宋时编成的书,其中讲述唐朝及唐以前的历史,都是根据前代的各种典籍编成的。相比之下,两《唐书》、《唐大诏令》、《唐会要》、《册府元

^①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86页。

龟》等书中记录的资料是更为原始的。

运用求源法还应注意结合研究作者写作的条件、过程及作者本人的习惯、性情、地位、品格等因素，不可将史料形成的早晚与史事可靠性的联系绝对化。例如，《三国志》成书于司马氏统治之时，较《后汉书》早得多，但关于三国时代许多史实的真实性反而不如《后汉书》，因为《三国志》作者撰稿时还在承受着直接的政治压力，有着更多的避讳和曲笔。

其二，运用反证法，举出有力的反证，以判断是非。梁启超把反证法形象地比喻为“以矛陷盾”。如《唐书·玄奘传》称玄奘57岁卒，《玄奘塔铭》则记为69。经考证，有人发现玄奘于显庆二年九月三十日上表之事，内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之语，证明玄奘卒年必在六十以外无疑，则《唐书》所记可能有误。再如，《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①对书中所载孔安国献书一事，后人多有怀疑。清初阎若璩用荀悦《汉纪·成帝纪》校读《汉书》，发现《汉书》于孔安国下脱一“家”字，原文应为“孔安国家献之”，解决了多年的争论。如果运用反证法，可以进一步说明《汉纪·成帝纪》所载可信。其一，《景十三王传》载：“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的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武帝在位凡五十四年，则《汉书》记鲁共王坏孔子宅的时间在武帝末年，显然是错误的。其二，《史记·孔子世家》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如是，安国不可能看到征和二十年的“巫蛊之难”。可见，《汉书》记载有误，孔安国本人献书之事显然不能成立。

其三，注意运用旁证法。即利用本书以外的资料作为依据，

① 《汉书·艺文志》。

对某一史事加以他证或补证,达到考订史事的目的。考据当中有“孤证不立”的原则,如果一个历史论断只有一项证据来支持,而没有旁证,则该项论断不能成立。例如,《尚书·无逸篇》有殷代高宗“亮阴三年不言”的记载。孔子把这句话的含义解释为殷代实行“三年守丧之制。”此说历代相传,无人提出疑问。但郭沫若发现,把“亮阴”解为“居庐守丧”缺乏根据,“三年不言”也不合情理。由此对旧解提出怀疑。郭沫若搜集和参考甲骨文中的有关资料,皆无相关旁证,反而发现了与历代相传的解说矛盾的记载,得出“亮阴三年不言”不能证明殷代实行“三年守丧之制”的结论。他又根据医学知识断定,“二年不言”应是一种不言症。郭沫若的论断最后从甲骨卜辞中“今夕王言”,“今夕王乃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总之,郭氏用旁证法对长期未置可疑的结论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最后,还可适当地运用理证法。前代的事未必皆有记载,或原本有记载而现已亡失或销毁,找不到任何证据,需要以学理作为判定是非的根据,这就是理证法。梁启超又称之为“高度的推论法”,主要是正确运用逻辑推理,达到考证出史事真伪的目的。当然,是否运用此法以及运用此法是否得当,都与史学家本身的素养密切相关。

总之,考证史事要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坚持无证不信,孤证不立,条分缕析,以理服人。相反,真假不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曲解材料,则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

复习思考题

1. 试述史料的搜集、辨伪和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内容。
2. 怎样考证史事的真伪?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新方法

一、比较史学方法

(一) 比较史学在二战后兴起的背景和一般特点

20 世纪初期前后,比较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方法,开始流行起来。1900 年召开的国际史学代表大会的名称就叫“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但是,历史学界出现“比较热”,形成现代型的比较史学,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西方的比较史学的兴起,是西方传统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发生巨大变迁的主要表现之一。

美国著名史学理论家伊格尔斯对促成当代西方史学的巨大变迁的历史背景曾作过概括性分析。他认为,西方史学领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 20 世纪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以及思想倾向方面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产生的影响。传统的史学越来越表明不能理解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社会及其伴生体中起作用的复杂过程。传统的政治秩序在西方被民主化秩序代替,在东方被社会主义政府制度所代替,两者都表明了传统的显赫人物的社会和政治垄断权力的破灭。随着世界上一些从前被西方史学家视为缺乏历史传统的地区逐渐具有了民族的自觉意识,欧洲人对世界的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虽然还巩固地确立着,但已在西欧失去了相应的重要性。对历史过程的幻灭感,代替了一度曾深信不疑的看待近代文明性质方面的乐观主义。”^①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下,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越来越感到需要对他们的思想前辈的社会历史观,以及社会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估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史学学科。

^① 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 页,引文参照英文版做了修改。

比较史学方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盛行起来的。其中一个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交换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和精神领域的交往活动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世界各部分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而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下,西方学者感到再不能像其先辈那样把目光仅仅放在西方文明上,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因为,倘若仅从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仅从一种文化模式出发去判断事物,在许多情况下,认识上的失误往往难免。于是,西方学术界出现“比较热”,不仅历史学,其他各门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都开始普遍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世界日益一体化的新背景,显然是比较史学普遍兴起的直接原因。

(二) 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

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规模庞大的文明体系的比较,第二是有限历史进程的比较,第三是社会结构的比较。

以施本格勒、汤因比等为代表的“各文明体系的比较”是第一个发展阶段。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以往将世界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种文明的发展各成体系,所以历史研究的单位应是各种特定的文明,而非年代学意义上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等。施氏认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8个自成体系的高级文化,汤因比则把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划分为21个“单元”或“文明形态”。这些叫做“文化”或“文明”的各种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他们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①由此,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之间应该而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第2页。

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比如,中国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之间,伊斯兰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间,虽然他们在距离上相距遥远,但在上述意义上可以当做平行的,同时代的“文明”而加以比较。于是,汤因比和施本格勒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形态学的方法,力图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人类历史的规律和趋势。他们倾向于把“文明形态”机械地类比为生物界中的生命形态,认为两者都有自身的生老病亡的“规律”。

施本格勒、汤因比等人的研究结论不同于上古、中古时期那种天命神意决定论,也不完全同于启蒙运动时期赫尔德的“生命周期”论,这突出表现在汤因比强调各文明形态可能在不同的“挑战”面前做出不同的“应战”,从而具有不同的历史命运。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越出传统思想的窠臼。汤因比文明兴衰的模式未免显得牵强附会,而且像其他唯心论者和形而上学者一样,把那个“固定模式”的产生原因归之于上帝,把历史归结为“上帝”自己所创造的作品。^①这类宏观的比较研究方法,虽然也给人以某种启迪,但缺乏理论的明晰性,严谨性和经验上的实证依据,无法指导人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致使人们对这类比较研究的方法产生怀疑。

于是,人们开始将历史比较的方法运用于范围比较有限的一些问题上。布洛克对中世纪初期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和西哥特王国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比较,就是其中一例。^②克兰·布林顿的《革命剖析》和 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两部著作也是西方比较史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产物。布林顿主要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四次革命的典型事例作了比较,试图确立革命必须经过的几个“规范化”的阶段。罗斯托

①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② 见马克·布洛克:《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译文见《世界世纪史研究通讯》1983年版总第4期。

主要通过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了当时正在激烈讨论中的经济增长问题，试图用比较方法建立工业社会起飞和发展的阶段模式。批评者指出，他们研究的基础过于狭窄，难以作为某种规范化的阶段或历史进程泛而推之。更重要的是，这类比较史学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有关社会之间的社会结构的差异。

对社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是当代西方比较史学方法发展的新阶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布莱克教授主持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就是属于西方现代化研究中有很影响的“结构功能学派”。布莱克和他领导的研究组把现代化过程定为“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其中不仅涉及工业或经济领域，还包括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方面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功能性变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些“现代性”(modernity)的共同特征，从而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相似特征”或“共同特征”，由此形成分析模式，再以这个模式作为理论框架，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比较和验证。还值得一提的是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摩尔用比较方法，依据大量历史事实雄辩地指出：西方民主不可能是一切国家效法的楷模；各个国家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都必然是特殊的，因而是形形色色的。这是正确的。可是，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因果必然关系决定着各个国家、各种现代化道路的兴废成败或利弊得失呢？不论是摩尔，还是布莱克，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承认了特殊性，却不能超越特殊性。这是结构比较法，也是整个当代西方比较史学所面临的困境。

(三) 当代西方比较史学的局限性

从全球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历史，对世界各种社会的各个层次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出研究和解释，在这方面比较史学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总趋势下，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历史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更需要发展比较史学。但是，当代西方比较史学中，流行的结构比较法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和研究者本人所受到的主体观念的限制，使它难以承担此项重任。

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分析往往与系统论的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这一套方法的确比我们前面所列举过的所有的比较研究方法都更加具有科学化的形态。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归属于大小范围不同，层次位置不同和结构功能不同的各种系统；再把各个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诸方面定义为相应的各个变量或参量；再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实证归纳，得出那些变量或参量之间的因应函数关系，从而归纳出某个系统呈良性或非良性运转的特征及其趋势的经验模式。此类模式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认识价值。但是必须同时看到，这种结构功能式的系统——模式归纳比较方法仍然是一种平面式的单层次的现象归纳比较方法，由此归纳出的经验模式，即使归纳的事实确实存在，也最多只能算得上约翰·密尔所说的那种“经验规律”，而不是揭示了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律”。因为那些参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必然性关系，而只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理而归纳出来的因应函数关系或协变关系。可是如何保证研究者在构造模式时对各变量、参量的作用及其因应函数关系或协变关系的判断不致发生错误，又如何保证不遗漏重要的变量、不低估变化的重要性呢？这就涉及到了社会、历史科学的一整套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具体说，这就涉及到研究者的主体观念，所以我们说研究者主体观念是比较史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比较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研究者主体观念的制约，而西方学术界普遍信奉非决定论的本体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无疑大大限制了他们比较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包括历史学界在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本体论方面大都信奉社会

历史过程本身无因果必然性规律的论断，即坚信一种非决定论的
本体论。由此决定他们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拒绝或回避从因果必然性
上去探讨决定社会历史过程的终极原因，而只限于运用直观经验性
的实证归纳方法对现象进行单层次的平面归纳，得出各种经验性的模
式或法则，或叫做经验规律，即几率性、描述性的规律，总之，不是
因果必然性的规律。我们在前面叙及的西方比较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超出这种经验规律模式。总之，他们是从某种“
经验模式”出发，以那种模式为标准去进行社会历史现象的异同类
比，再以模式的验证为归宿，即着重于通过比较进行模式的验证，而
不是通过比较进行因果必然性和普遍规律的探求。我们固然不应排斥
他们所取得的一切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包括结构功能比较分析和系
统模式比较分析的方法和一切符合实际的比较结论。问题是，那些具
有不同程度的科学价值的成果，只有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引
下才能被纳入科学比较史学的严密体系之中，使之升华到探求因果
必然性规律的科学高度，而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决定论正是指
引研究者向这一科学高峰攀登的指南针。否则，势必像大多数坚持
非决定论的历史学家那样，在探索规律过程中，陷入无法摆脱的困
境。

二、计量史学方法

（一）史学中数学热兴起的背景和概况

计量史学像比较史学一样，是适用于历史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的一
种研究方法，所以在西方著述中它往往被称为：Quantative
Methods of History，即历史或历史学的计量方法，也就是把数
学方法特别是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套方法。就历史
渊源来说，中外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作数量的
考察和描述，中国古代史家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堪称首屈一指。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

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经济运动和某些社会现象的演变趋势。到19世纪,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已日渐增多。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说不系统地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至多只能说是它的滥觞,因为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更没有在史学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的诞生时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认为是在1955年前后,这个判断是可取的。195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胜利的一年,他们的“新史学”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尊重,以至在西方史坛上逐渐取代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学派的地位。年鉴学派是倡导结构分析的,而且主张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深层结构加以揭示和分析。结构分析和模式归纳都难免要运用数学工具,特别是长时段的结构分析和模式归纳,离开计量表述就寸步难行。正因为此,年鉴派大师的著作中,都大量运用了计量分析。可以说,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计量史学的内容。然而如果把计量史学的诞生仅仅看作某一个学派呼吁的产物,似过于简单了。事实上,也正是在1955年前后,在法国诞生的历史人口学和在美国诞生的新经济史学,都是靠数学工具和计量方法而生存的,尤其是新经济史学,又被称为“计量经济史学”,后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又被认为是“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称呼。

上述情况说明,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实际上是同当代西方的整个“新史学”潮流一起诞生的,它本身就是新的史学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也和整个新史学的潮流一样,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发生一系列巨变的产物,那一系列巨变促使新一代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对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个别描述”,而要对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和趋势加以剖析、解释和预测。他们力求创立一种能够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的新史学。一些学者还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而要揭示深层结构或要从下往上看,就必须对大量群体性

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进行考察。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二）计量史学的发展历程

追溯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的开端，需回顾它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因为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计量史学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哈佛大学的康拉德和迈耶于1958年4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一文，宣告美国“新经济史学”出世，同时也标志着计量史学在美国诞生。该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的效益作了计量分析，他们分别对蓄养男奴和女奴的收益率作了计算。关于蓄养男奴的收益率，他们首先算出蓄养和使用男奴的人均资本费用，包括购买男奴的平均费用和供男奴使用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其他设备的平均费用；然后再根据当时奴隶制种植园主出售的棉花价格和男奴的人均生产率算出蓄养一个男奴可获得的毛收益，再减去蓄养和使用男奴的人均资本费用，得出当时大多数种植园蓄养和使用男奴的净收益率为5%至8%的结论。至于蓄养女奴的收益率，除按上述方法计算外，还加上出售女奴生育的幼奴的净收入，由此确定蓄养女奴的净收益率为7.1%至8.1%之间。据此，他们对当时在美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提出挑战，那种观点认为内战爆发前夕南方奴隶制经济已经无利可图的结论。此论一出，引起不少反驳，同时也激发起一些研究者对历史的计量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围绕奴隶制经济问题和其他一些历史问题，纷纷发表运用计量方法而写成的研究文章。1960年12月，珀杜大学举办“经济史中的计量方法”讨论会，虽仅有20名学者出席，却对计量研究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后该讨论会成为每年举办一次的年会。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的著作和论文日渐增多。1964年福格尔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用计量方法得出1890年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此书问世后，在历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再一次推动了计量史学的发展。

到1970年，计量史学家在社会史和政治史领域都已有了进展，在经济史领域赢得了更明显的胜利。他们办起了专业性杂志，出版《计量史学研究丛书》，汇集出版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到人口、生育、家庭、种族关系、奴隶制、社会活动、公共政事等众多领域。美国历史学会设立了一个计量研究的特别委员会，以促进计量史学的发展。同时，各大学历史系纷纷增设数理方法训练课程。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的计量史学成就较为突出，由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领导的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成了推进计量史学研究的中心，法国计量史学的成就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人口史和经济史这两个领域。勒·鲁瓦·拉杜里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发现15—18世纪朗格多克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曲线，是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的彼得·拉斯勒特和理查德·沃尔出版的《过去时代的户和家庭》一书，汇集了英国和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家庭史和人口史的重要成果，已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名著。显然，到60年代末，计量史学已成为国际史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三）计量史学的成就与困境

研究实践已证明，计量史学方法确实有助于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定性论断中隐含着的模糊的数量判断明晰化，从而对那些包含着模糊的数量判断的定性论断加以验证，或加以修正，或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断。例如，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学家总难免要使用“重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常见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不大的”……等等用语。这些都是隐含着计量或统计内涵的概念。这个事实说明，历史学本来就离不开计量。但是在历史研究实践中，人们往往未做任何估算就使用了这类概念，使这类本来属于定量判断的概念成了模糊性很强的定性判断的概念，由此常常导致失误。计量史学家通过系统的计算，对以

前的许多结论提出确有依据的否定或修正，这不能不说是计量史学方法的优越性带来的积极成果。巴勒克拉夫认为：“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正是这种（对计量的）关注使 1955 年前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学有别于旧历史学。”^① 这样说确有一定道理。

同时需指出，西方史学家对计量史学也提出了许多责难，归纳一下，对它的责难和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历史学研究的历史现象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而参与历史活动的每个人群和个人都是有独特个性和意志的，硬把他们抽象成为没有个性和意志的数日字或数字符号去加以计算，其结果不但不可能反映历史真相，而且导致把人的历史变成没有人的数目字的历史。对于这类批评或责难，即使像福格尔那样的计量史学家也不得不逐渐有所接受。他在其所著《苦难时代》一书的下卷序言中，回答“计量方法能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答案是干脆的：‘不’”。他还承认，“我们对历史著述中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将来很可能还是如此。计量史学家引起的问题并非历史学能否变成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方法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范围。”^② 可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但大大降低了计量史学方法的作用，而且彻底放弃了要使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抱负。

其二：许多学者认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时性”的现象，即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现象，这就不但需要对各种“共时性”的状态作出判断，而且需要“历时性”的变迁作出解释；而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至多只能对有关“共时性”状态的某一判断作出验证或提出某种新的判断，而不可能凭计量结果本身对“历时性”的变迁作出解释，而且即使是对计量结果本身的含义也不可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139 页。

② 见《历史计量研究法》第 234 页。

能凭计量结果本身作出解释。因此，即使凭计量结果可以否定某些已有的结论，也只能是有破无立，不可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新的结论来代替原有结论。

第三，批评者们还指出，计量史学的倡导者夸大了计量证据的客观性，要让人们相信计算机那样的机器本身就具有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功能。实际上，任何数学工具的运用，都是运用数学工具的研究者在起支配作用，因为研究者总是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进行运算的。的确，运算结果有可能否定原来的假设，单从这方面讲，数学工具有助于防止主观任意性。但其作用主要限于在单项史料或史实的是非判断上防止主观任意性，而不可能在计量结果的含义的解释上防止主观任意性。这些论述和告诫无疑都是很中肯的。

上述这些责难，反映了西方计量史学确实面临着的困境。只有依靠科学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摆脱那些困境。

三、心理史学方法

（一）心理史学方法兴起和发展概况

当代西方心理史学的兴起是以心理学中的一个分支——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历史研究为开端的。它是在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通过弗洛伊德等人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初步努力而兴起的。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具有明显的泛性论倾向，它把性本能理论从解释精神病扩延到解释一切人的行为，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本能、性欲夸大为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原动力，忽视社会因素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氏和他的追随者发生了分歧。

西方社会的巨变不仅影响了历史学家，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学家。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化使精神病患者日增，其病因

主要不是性压抑，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所致。在这一背景下，40年代在西方出现了以阿德勒、荣格、埃里克森、沙利文、霍妮和弗罗姆等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该学派虽然保留了古典学派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仍然坚持潜意识的驱动力和先天潜能的主导作用，但它强调自我的自主性，认为自我具有自己的能量来源、动机和目的，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家庭环境、养育方式等）对人格的重大影响。精神分析理论的这种发展，帮助铺平了心理史学家的研究道路，心理史学所使用的正是这种新精神分析理论。

埃里克森、李夫顿和海因茨·克胡特是当代美国心理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克森为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得到了后二者的赞同，即认为心理史学实质上是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① 这种观念代表了西方心理史学的主流。下面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埃里克森的主要学术成就。

埃里克森是心理史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儿童时代与社会》和《新同一的范围》。他的心理史学理论来源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其中主要是人格发展渐成说和伟人理论。^②

埃里克森认为，“成长和变化贯穿于生命周期的始终”。他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认为每个阶段都会遇到社会心理危机。人格便是通过解决各个阶段的社会心理危机而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人的成长是通过对外在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而实现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埃里克森最重视青春期的“认同”和“认同危机”。人到青春期之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充分发育，他自觉到再也不是儿童了，他面临着新的生活问题和社会角色的选择。他潜在的旺盛精力（包括性欲）需要在外界找到依托和表现的对象。此时他如果坚信通

^① 伊格尔顿：《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89年，第50页。

过自己以往的发展所形成的自我的 一致性和连续性同他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就实现了认同,实现了社会化。因此,认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社会混乱,可能使认同不能顺利形成,从而出现认同危机。这种青春期危机的解决方式很多,危机的解决既可以变成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在这一人格渐成说基础上,埃里克森提出了伟人理论(The great man theory)。他认为,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者,一方面是因为领导者与追随者基于同样的经历(主要是指个人的早期经历,尤其是养育方式)而具有相似性,“领导者在他的个人斗争中,聚集了他那一代人的潜在问题”。^①所以才能一呼百应;另一方面,伟人可以像精神病医生分析、治疗病人那样,知道他那一代人在想什么,并通过解决自己精神上的问题为其他人找到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的方法和途径。

纵观西方心理史学,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个体心理传记,即主要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人格形成、心理变化和各种行为的心理动因的描述和解释而写出的人物传记,如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洛温伯格对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研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研究,以及许多人对希特勒的研究。(2)群体心理史。随着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由上层人物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心理史学家在群体历史研究方面的探索日益深化,主要是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群体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他们涉猎的课题包括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奴隶制、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革命与暴力、欧美文化史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心理影响等等。(3)童年史和家庭史。心理史学家们确信,童年时代的经历和家庭环境对人的个性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他们一般都十分

① 斯崔泽尔和奥弗尔:《领袖的心理史学论析》(Charles B. Strozier and Daniel Offer, *The Leader: Psychohistorical Essays*), 1985年英文版,第53页。

重视对“养育方式、家庭模式、童年和青年的社会化”的研究，但心理史学家通常把童年史和家庭史的研究融合在心理传记或群体心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研究的侧重点是变化的，心理传记越来越受到当代史学家的轻蔑，而童年史、家庭史和群体心理史则日益走到“历史兴趣的前沿”^①。

（二）当前发展的一般趋势与困境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当代西方心理史学的一般发展趋势：

其一，心理史学家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趋势。

心理史学最初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历史上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行为的一种史学方法。它把历史看作“个人心理的景象或射流的表现”，^②而极少探讨人们的心理动机本身的来源。随着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一些心理史学家日益感到这种解释的缺陷。他们由强调内在的心理力量转向强调外在的社会文化的力量，把人们的心理看作“外在的历史力量的产物”，认为“家庭、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所有这些环境在个体内心创造了一种感情、认知和知识的动力模型，这一模型决定了生活中的动机和行动”。^③也就是说，不是心理因素决定了人的行为，而是各种制度、组织等“最终的社会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心理及其行为。

这种由“心理因素决定论”向“外在环境决定论”的转变，意味着心理史学已不再局限于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个人和群体的历史行为了，而是把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心理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把历史上的心理现象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只是把心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史学方法了。所以，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心理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历史心理学和心态史学了。

① 洛温伯格：《译解过去·心理史学方法》（Peter Loewenberg, Decoding the past: The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1965年英文版，第33页。

②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01页。

③ 杰弗里·考克斯：《心理史学》，第11页。

一些西方学者似乎认为,群体之所以成其为群体是因为他们处在同样的制度下或隶属于同样的组织,而群体又是由若干个性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所以无论是研究群体还是研究个体,分析的重点应集中在“人们被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组织上”,集中在“人们与他们当前的环境发生联系的方式上”。所以,心理史学家应把注重社会文化因素,注重外在环境的社会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引入自己的研究中。

其二,社会学对心理史学的渗透。

社会学对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对美国心理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学家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认为,个性是社会关系内在化的结果,没有任何层次的个性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包括本能的在内,所以,“因果关系的推演必须是从社会到个性”,^①这就是帕森斯的“社会内在化之精神分析的对象关系模式”的基本内容,把这一模式应用于心理史学的是弗雷德·温斯坦(F·Weinstein)和普拉特(G·Platt),前者是历史学家,后者是社会学家。他们合著有《心理史学面临的危机》等重要论文。^②他们并不否认群体中个体的独特性,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驱力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必须和外在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所以,社会冲突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体和社会的冲突;一是社会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某人或某群体的心理驱力的“喷发”,而是在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致使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上的“统一基础”被打破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社会——心理——行为”的认识模式必然导致相应的分析模式。总之,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一方面为解释群体行为提供了深邃的心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也扩展了对群体进

(1) 杰弗里·考克斯:《心理史学》,第246--247页。

(2) 有关温斯坦和普拉特的资料来自《心理史学面临的危机》,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75年6月号。

行心理和社会分析的可能性”。

其三，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史学中的应用。

在所有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理论中，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心理史学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行为完全是环境决定的”，^①不承认本能或遗传的能力和才干，认为人类行为中所有那些似乎像是本能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不是内在驱力在环境上的投影。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只有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能力，强调行为通常是后天学得的，这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社会学习理论。

埃尔金斯(Stanley M·Elkins)在其所著的《奴隶制》一书中运用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他认为，19世纪北美种植园奴隶的性格特征的核心是“孩子气”(Childness)。这一特征既不是奴隶们原始的文化源流的延伸，也不是集权主义的奴隶制体制影响的结果，而是主人和奴隶在“有权和无权”这独一的封闭关系中共同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处于无权地位的奴隶只和他们的主人发生关系，事事都要看主人的眼色，努力把自己变成主人所要求的样子，就像孩子讨好自己的父母一样，总之，奴隶们的“孩子气”是主人所要求的，是奴隶对主人的要求的反应。^②阿瑟尔(Harvery Asher)运用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集团压力理论等，分析了德国人追随纳粹的原因。他认为，许多德国人追随纳粹并不是由于热诚的信仰或无意识的依从，而是由于对纳粹行为的模仿。

总之，在这些心理史学家看来，决定奴隶和德国民众的心理和行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以生产活动为基本层次的现实实践，而是和这些运动主体相对的外在条件，即奴隶主和纳粹头目。这种外在环境决定论和普拉特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在本质上是同样的，

① [美]舍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② 阿布拉姆斯：《历史社会学史》(Phil: 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1982年，第241--251页。

它只强调人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的一面，而忽视了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现实的人”创造环境、创造社会关系的一面。就是说，他们不能解释被他们当作引起某种结果的“原因”本身出现的原因。

当代西方史学家一方面看到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领袖人物越来越受到公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也看到任何个人的命运既受到共同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总是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历程。他们对这种矛盾现象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往往在个体和群体、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困境。具体到心理史学家，他们或强调个人心理、行为的作用，得出心理驱力决定社会现实的“驱力——现实”的模式，陷入心理因素决定论；或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作用，得出社会现实决定心理驱力的“现实——驱力”模式，陷入外在环境决定论。怎样摆脱困境呢？唯物史观指引了方向，那就是，应该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人们实际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去找到人们的心理和人们的社会现实发生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如马克思指出，人们不仅通过生产实践改变着“客观条件”，也“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①也就是说，不但制度、组织之类的“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②而且人们的内心需求、压抑感、想象、“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③总之，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活实践，就有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心理史学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将有助于摆脱上述困境。

四、口述史学方法

（一）口述史学兴起的背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

③ 同上，第30—31页。

口述史学方法的含义很广,既是指史学家搜集和利用口头史料的方法,又是指史学家全部或部分地依据口头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口头史料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口述回忆,是指“史学家访问当事人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这通常被称为口述史(oral History);二是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是指“那些以口头语言的形式流传了若干代的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绘”。¹

历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由来已久,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学方法,则诞生于本世纪30和40年代的美国,并于60、70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地区得到广泛利用。

口述史学的兴起,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如前已指出,当代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巨变,促使历史学家们日渐认识到,普通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较之精英人物更需加以注意,由此出现了撰写“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的潮流。但要研究普通人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文献资料不足,因为文献资料向来很少记载普通人的情况,这就促使研究者们求助于口述史学方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正如美国口述史学家罗森伽特西奥多所说,口述史之所以在60年代末成为“一门发展特别快的新行业”,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的兴趣的增长。

口述史学的兴起,还与文献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有关。本世纪以来,随着兰克学派的历史客观主义日益遭到摒弃,研究者对文献资料本身的客观性所持的怀疑态度日益加深。人们并不完全否定文献史料的利用价值。但是,一些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认识过程的反思逐渐认识到,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存在文献史料的“纯客观”性。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也越来越感到,政治家们由于害怕后世学者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也不愿把自己某些

¹ 约翰·托什:《追踪历史》(John Tosh, The Pursuit of History), 1984年,第172页。

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文献档案中为政界服务的宣传品越来越多。由于文献史料的客观性越来越受到怀疑,促使一些史学家把目光重新转向口述史料。

口述方法在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运用所取得的成就,使史学家对口述方法重新抱有信心。19世纪以后,尽管口述方法在史学界遭到冷落,但它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司格特(Walter Scott)是19世纪英国出生的小说家和诗人,他在大学期间就常常利用假日去苏格兰高地的偏僻地区搜集历史传说和民间歌谣。他用口述方法汇集有关资料写成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深受读者欢迎。此外,他还利用自己在苏格兰的采访经历写出了另一部曾经得到马克思高度赞扬的作品《清教徒》。司格特深入生活进行口述采访的取材方式,直接影响了19世纪欧洲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此外,口述方法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对口述史学的复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为现代口述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范型。

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历史研究的状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口述史学方法在各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呈现出多样性。比较而言,口述史学发展较快的国家是美英两国。但其他许多国家也都有不少的有志者致力于发展口述史学,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 口述史学的发展概况

60年代后期,美国的口述史学家们在继续收集上层人士以及那些能使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机构的有关口述回忆的同时,把研究触角深入到黑人区和穷乡僻壤。美国新一代的口述史学家们开辟了许多新的应用领域,如民族史、部落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地方史、城市史、社区史等。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们自己的声音媒介,“让历史承认黑人、卡诺奇人、女人和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文化所作出

的贡献”。^①新一代的口述史学家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威斯康星福尔斯特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是美国部落口述史研究的典型。该中心所收集的采访资料,能够提供圣克罗瓦河流域从北印地安人定居以来直到最近为止的生动而多样化的生活侧面。在黑人史研究方面,田纳西州非斯克大学图书馆的研究项目可以算作是最大的项目之一。他们通过录制各居民阶层代表人士的谈话记录,为人们提供生动的、各种各样的黑人生活信息,从而填补了美国黑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空白。此外,口述史学在美国已成为普及历史教育的一种手段。阿列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口述史著作《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尽管在史料史实的运用方面受到不少批评,但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该书曾获得1977年美国国家书籍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历史类特别奖,不仅畅销美国,风靡世界,而且在西方掀起了“寻根”热潮。

与美国相比,英国从另一个角度使口述史成为促进历史学大众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英国口述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口述史学方法主要应用在社会史领域,例如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的《乡村生活与劳动》,杰里·怀特(Jerry White)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Christopher Stormm·Clark)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以及保罗·汤普逊的《爱德华时代的人》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英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另一大特色是口述史学家坚持自己不同于专业史学的独立性,坚持口述史学直接扎根于本地普通人社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普通人不仅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而且应该“在提供具

① 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6页。

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①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伦敦东区的“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就是当地居民的一个开放性团体。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编纂口述史，“发展社区自己的历史，发展自己的特性。”^②像这样的组织在英国不止一个。

除了英美以外，加拿大和北欧也是口述史研究发展较早的国家。加拿大的口述史学家们在研究加拿大境内的移民生活状况方面成就很大。加拿大口述史学家研究的特点是：大多数口述研究工作都是由非专业史学家完成的；大多数被访者都是普通人；口述史料都是未经史学家加工的原始史料，史料分别用英、法、日、三种语言保存。^③北欧的口述史主要是在民歌、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入70年代以后，斯堪的纳维亚的口述研究范围已经从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日益扩大到城市人口和社会变迁等领域。西方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口述史运动兴起的较晚。但是，这些国家的口述史研究的进展并不比英美国家落后。总之，口述史学影响了历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文化史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认为，口述史能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探索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远远地超过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生活史领域的贡献。

（三）运用口述史学方法能否揭示历史真相

口述史学虽然已成为现代史学中一大潮流，但它的可靠性仍受到怀疑。

由于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而回忆既包含着事实，又包含着想象。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回忆与事实完全相符。由此决定了口述回忆的史料和史事不可能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口述者的遗忘、夸张或掩盖某些事实的个人动机、言不尽意、访

①② 托什：《追踪历史》，第177页。

③ 哈大利斯：《口述史书目摘要与参考指南》，第26页。

记者的误解等等,都可能导致失真。所有这些因素一直是一些学者对口述史学提出责难的主要依据。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却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面对这样的责难,口述史学家大都承认,口述史料的确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因此也不可能运用口述史料来完全地“再现往事”。但口述史学家们争辩说,文献史料也存在着同样的局限;正像对文献史料需要通过“内考证”和“外考证”来尽可能排除失真成分一样,口述史学家也尽力通过“内证”和“外证”来排除口述史料失真成分。口述史学家还争辩说,他们虽然不能通过口述史料完全恢复“真实的过去”,却能描绘出一个历史当事人头脑中“记住的过去”,即使他们记忆中的失真成分,即有意或无意地对某些历史情节加以夸张或掩饰的部分,也反映了口述回忆者们特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历史观,因为正是在这些夸张或掩饰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回忆者自身最深层的价值观和心态,这本身就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历史真实是一般文献史料中不可能提供的。应该承认,口述史学家们的这些反驳是有道理的。

但是,运用口述史学方法是否就只能描绘出“记住的过去”,而不可能恢复“真实的过去”呢?这实际上不单是口述史学面临的难题,而是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题,因为历史学各个学科能够利用的史料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而且都不可能是十分完整而系统的。那么,历史研究者又怎样才能揭示客观历史真相呢?对此,我们已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做了论述,那些论述也应能有助于解决口述史学面临的难题。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和运用比较史学方法?
2. 怎样理解和运用计量史学方法?
3. 怎样理解和运用心理史学方法?
4. 怎样理解和运用口述史学方法?

第七章 历史认识成果的表述

第一节 史学著述的体裁和体例

历史认识的成果通过史学著述表达出来。为了适当地表述历史认识成果的内容,史学著述需要有相应的体裁、体例和表述语言。

一、史学著述的体裁及其演变

史学著述的体裁,笼统地说就是史学著述的编撰形式,具体地说,是史学著述编排内容、叙述史事的形式。史著编排内容、叙述史事的方式不同,由此形成的史书体裁也不相同。例如,以时间为线索来编排内容和叙述史事的,称为编年体裁;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来编排内容和叙述史事的,称为纪传体裁。

我国的史学研究源远流长,各种史学著述层出不穷,史著的体裁也丰富多样。最早的史书体裁是记言、记事两种,《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的,如《尚书》、《国语》等,都是以记载帝王大臣等历史人物的言论为主的史书;记事的,如《诗经》中的《周颂》、《商颂》等记载的是古代政事王迹的史实。春秋战国以后,史家著述日多,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入和视野的拓阔,原来的记言、记事的形式已难以表述新的认识内容,于是产生和发展出许多史学著述的体裁。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学案体、图表体、章节体等,其中最主要和常用的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四种。

编年体就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历史的内容逐年逐月逐日地编排、叙述的一种史书体裁。晋代经学家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里说它是“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就是说记事首先标明年代,年下记月份,月份之下注明日期,日期之下记述史实,这样就可以区分史事的先后顺序和彼此的同异了。编年体源于古老的编年记事的方式。人类最早的记事方式是结绳、刻木或口耳相传,所记的史事总是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等到文字、历法产生之后,古代的史官便把这种方式沿袭下来并发展成一种史书的体裁。所以,编年体的出现较早。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史学史上,较早的一些史书都是用编年体写成的,如中国先秦时代的《春秋》、《左传》,被称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国史学奠基人比德的《英国教会史》、德意志最早的史书是兰伯特的《编年史》、俄国最早的史书是奈斯托尔的《编年史》等,都是采用这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编年体的史学名著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

采用编年体写成的史书,史事发生的时间明确,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能顾及同时发生的各个史事,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例如,《资治通鉴》在公元199年栏下,既记载了北方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持的情况,又记载了刘备乘袁曹相持而在徐州起兵屯守小沛的史事,南北形势及其联系一目了然。所以刘知几称它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①但是,编年体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编年体将一件历史事件或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分散于几年、几十年的记载中,结果是“年不一事,事不一年”,“一事而隔数卷,首尾难稽”。同时,这种体裁主要适用于记载军国大事和统治者

^① 《史通·二体》。

的活动,不适于记述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史事,因为后者的内容往往难以系定年月,结果因体裁形式的限制而影响了历史内容的表述。

纪传体是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编排、叙述史事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的中心是人物传记,具体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分别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以及各类不同人物的事迹。同时辅以“志”,用来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和变迁;“表”,用以记录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难以立传的人物事迹;论赞,用以阐述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等。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的创始者是西汉司马迁,他的《史记》是纪传体的通史。其后的历代史家都沿用这个体裁编撰断代史书,如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肖子显的《南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魏收的《魏书》等。尤其是唐宋以后,官修史书,均以纪传体为正宗。清乾隆年间,钦定《史记》以下至《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纪传体被视为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体裁。

纪传体是一种较好的史书体裁,史学家翦伯赞认为:“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纪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纪事’‘纪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①它的缺点是纵向的综合概括力较差,难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间的相互联系。历史的进程和史实被分割于各个人物的传记之中,结果是“同为—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

^① 翦伯赞:《论刘知几的史学》,载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32页。

前后屡出”，“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之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足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①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来编排、叙述历史内容的种史书体裁。将某一时段的历史内容分为若干大事，每事一篇，篇与篇之间按时间顺序编排，每叙一事必求首尾完整，详其始末，故称为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中国古代的三大史书体裁。

宋代之前，史书编撰体裁不外乎编年和纪传两类。但这两类体裁的共同缺点就是叙事方面的“断续相离”，所谓“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阵。”南宋史学家袁枢为克服编年、纪传体在叙事方面的不足，将《资治通鉴》的内容区别门目，分为239个题目，按历史年代的先后编纂，如王莽篡汉、光武平赤眉、西晋之乱、孙氏据江东、杨坚篡周、唐平东都、安史之乱、藩镇之乱等等。“每事各详其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②编成的《通鉴纪事本末》及新创纪事本末体裁，很受学者的欢迎，后世的史学家纷纷接踵，仿其体裁写成的史书有十余种。^③如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等。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体裁上的一大流派。

纪事本末体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基础上产生的，综合两者之长，克服两者之短，所谓出于二体而异于二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评论说：“按本末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评价更高，他说：“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

① 《史通·二体》。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 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的纪事本末类的存目有16种史书。

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①把纪事本末体的创新看作是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突破。

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主流是章节体，它是一种以章节为顺序来编排内容、叙述史事的史书体裁，全书以卷、章、节等层次编排，全书之首冠以绪言或导论，书末附以跋、表、附录、参考文献目录、注释等内容，具有叙事首尾一贯、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的特点。

章节体的创立是西方近代历史编纂学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为史学家们接受采用。较早的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南海康先生传》、《中国史叙论》，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等都采用章节体裁。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研究范围的开拓，史观和治史方法的更新，使传统的史书体裁已难以适应新的历史认识内容。与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裁相比，章节体的确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既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因事立题、分门别类地进行叙述，又注意综合通贯、横向联系，揭示各历史事实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用章节体史书作教科书，能按照讲授课时的要求、讲授对象的深浅程度灵活编排内容，做到篇幅适宜，脉络清晰，简明扼要，便于初学。经过近代史学家们的移植和改进，外来的章节体已逐渐扎根于中国史苑，成为一种比传统的史书体裁更受欢迎的形式。^②吸收其他体裁中的一些优点或长处，以丰富自己的表述能力。如早期的编年体史书，记事十分简略。《春秋》一书仅18000余字，记载史事最少的仅一字，最长的也不过40余字。《左传》记事虽稍详细，但基本上还是机械的按年按月记事，对于那些无年月可考的、或难以系于年月的史实，只能阙而不记。东汉荀悦著《汉纪》，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1页。

②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为克服古编年体的缺点,吸取纪传体中的一些方式,在编年体史书中采用了追叙法(凡记人记事,均先追叙他的生平或由文)、预叙法(凡记人记事的现状,常预叙其日后的情况)、类叙法(在记人记事时,常顺便记下与之有关或同类的人或事)等,以扩大编年体的包容量。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编年体为主干,编《资治通鉴》297卷,又引入其他体裁,编成六种辅翼性的史书:《通鉴释例》、《通鉴考异》、《通鉴书目》、《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与《通鉴》并行,主辅配合,实际上已成了一种综合型的编年体,大大增加了原编年体的表述力。所以明代学者胡应麟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

整体的创新就是打破原体裁的基本格局,创立新的史书体裁。一般说来,新体裁的创立不是完全废弃了旧体裁旧形式,而是在旧体裁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近几十年来,综合性体裁的探索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有成就是历史学家罗尔纲、白寿彝的研究。罗尔纲是太平天国史专家,自40年代用纪传体写了《太平天国史稿》后,进行了多年的体裁上的探索,经三次改变,新版的《太平天国史稿》以叙论、纪年、表、志、传等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为形式,其中“叙论”概括全书;“纪年”记国家大事;“表”标明复杂繁缛的史事;“志”记典章制度;“传”记人物事迹。作者认为,用这种体裁写成的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著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的干巴巴的境地有异。^①这确是可供史家撰著史书借鉴的一种体裁。白寿彝教授从70年代开始致力于新综合体的研究,他说:“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历史,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②多卷本的《中国通史》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

① 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纪”四种体裁相配合。“序说”置于卷首，开宗明义，说明基本资料、论述和总结前人或时人的研究成果、交待作者编撰意图等；“综述”为全书之主干，用来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典志”用以对历史现象的剖析，设有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门类；“传记”为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人物群像。^①这种综合体裁的运用为大型史书的体裁创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史学著述的体例

“体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②广义的体例包括体裁，除了体裁外，还涉及史书编纂中的一些组织形式和编纂惯例。狭义的体例不同于体裁，主要是指史书的组织形式和编纂惯例，它包括史书序言的设置、标题的设计、引文、注释、附录的编纂方式，记时、记地的惯例等内容。本节论述的是狭义的史书体例，即有关史书编纂中的一些组织形式和编纂惯例问题。

史书体例上的第一项内容是“序”。古今史书，一般都有“序”。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史通评》的《序例第十》里说：“古人之序，每置篇末；全书总序外，又有各篇之分序，《史记》、《汉书》皆如此，此所以明各篇之次第，正所谓序也”。^③也就是说，史书的“序”，有全书的总序和各篇章的分序两种。全书的序，又称“前言”、“绪言”、“导言”等。一般篇幅比较长，除了交代作者的著述目的、缘由外，主要是说明研究的意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者试图解决的问题等。书序长短不一，短的序文仅数百个字，长的序文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26页。

② 体例的广义理解，可参看赵吉惠著《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52页）。体例的狭义理解，可参看白寿彝著《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3页）。

③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10页。

可达数万余字。如顾颉刚《古史辨》的自序，详细地写出作者幼年求学的经历，思想的渊源，学术兴趣、志向和追求，研究古史的缘起，研究古史的方法，作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等，共六万余字。作者自称是有生以来最长最畅的长文。^①篇章的序比较短小，往往仅几一字几百字。一般只是提纲挈领地概括本篇章中的中心思想，帮助阅者掌握其主要内容。

史书的标题，就是史书内在卷次、章节的名称。中国先秦的古书，虽有篇名，但并不是按照其具体内容来标名的，往往只是简单地截取篇首的几个字命名，并不能起到概括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的作用。今人著述，都要按各卷次、章节的不同内容而标出题目。一部完整的史书，都在卷首用目录的形式标出它的章节标题。标题不仅能向读者揭示内容和主要观点，还能反映出史书的内在体系和结构。

史书标题的设计，一是要做到准确。即要求标目能准确地概括其中心内容和观点。刘知几说：“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他批评司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批评班固撰《古今人表》“以古今为目……古诚有之，今则安在？”这都是标目与所标目部分的实际内容不符，不准确。二是要简明。即标目的文字简炼醒目，既不要烦而无要，又不要故弄虚玄，读了使人摸不着头脑。章学诚曾称古人编书，书名篇名朴实无华“皆明白易晓，未曾有意为吊诡也”。史书标题的形式，一般有叙述式、主副式、提问式等几种，史书编纂者通常是依据自己的研究课题的性质和读者的状况来选择和设计史书的标题，以更好地表述他的研究成果。

史学研究不仅要引用史料，还要引用时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引用的资料、文句、观点等，在史书编纂中都要用注释标明出处，目的有三：（一）表明作者对他入、前人研究成果的尊

①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重，也是作者学术道德的一种表现。（二）表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引证有据，绝非杜撰。（三）可使读者判定资料的引证范围和可信程度，从而估量作者论证的充分程度，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循着引证线索作进一步探索。

引证有直接引证和间接引证两种。直接引证就是直接节取史料或他人著述的原文用于正文，在形式上用引号标出，以示与正文有别。间接引文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史料或他人著述的原文大意，不加引号，随文附叙，只在正文外的注释中加以注明。这两种引证的方式可以依据著述性质、材料的状况、读者对象等不同而选择运用。一般说来，论证性的著述大都用直接引证，叙述性的著述大都用间接引证；所引的史料较短、较罕见、有分歧有争议的，多用直接引证，所引史料较长、较常见、较普通的，多用间接引证；专业性的史学著述大都采用直接引证，通俗性的著述大都采用间接引证等。史书引证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不可任意曲解。切忌凭记忆引证。人的记忆难免有误，凭记忆引证，常常会发生错误。史书的史料，尽可能不作转引，不得已，亦当说明转引的出处。辗转引用，最容易发生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的错误。

史书的注释有自注和他注两种。自注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注释。如《史记》中常有“语在某纪”、“语见某传”的说明，这就是司马迁的自注。他注就是他人对本书的注释，如《史记正义》是唐代学者张守节对《史记》的注释，《三国志》的裴注，是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旧时注释名目繁多，有传、说、训、诂、记、注、笺、解等。按其所注的内容来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注明引用史料或观点的来源出处。这种注释在史学著作中有一定的款式。一般须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页码等。另一种是将一些不便于或不适宜于正文中叙述、但又必不可少的内容，用注释的形式来叙述，如介绍各家各派的观点、补充其他相关的史料、阐述相关的论点等，这些内容如掺入正文，

就会影响史事的叙述,用注释来处理,既保证正文的行文流畅,又保留了一些不可缺少的内容。注释的形式很多,有篇首注、文中注、页下注、章节附注、书尾注等。注释符号也有多种。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所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就用了好几种注释符号。在该书中,凡引文的注释,均用“[]”号;著者的自注,均用“*”号;译者的注文,一律用“☆”标出,以与其他注文相区别。

附录与注释相似,也是对史书正文的补充和说明。注释是对史书正文中的某一段、某一句文字的补充或说明,一般较为简短,往往几句话就可以说明。附录是对整个史书的补充和说明,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往往不是几句话所能交代清楚,放在正文中叙述就不太方便,甚至会喧宾夺主。这些内容通常就以附录的方式来处理。

附录一般置于书末,内容很广,主要有:(一)考证文字。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将许多考证文字,汇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并行。(二)史料。如史料真伪的考辨、前人的评说。(三)大事记和大事年表。(四)索引和表例。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古今地名对照表、中西文地名、人名对照表,报刊杂志的译名对照表,行政机关、商业行号、学术团体的译名对照表等。(五)世系表。(六)参考著作、论文的一览表等。附录形式不仅便利了作者的观点或见解的阐述,同时也为后来的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时间和地点是历史叙述中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史书编纂的体例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史书的记时,总是依照当时通行的记年法。在我国古代,有星岁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和年号纪年法等多种方式,其中又以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法使用最广。自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后,年号便成了时间的标志,史家编史也都以年号来纪年,如清代爱新觉罗玄烨即帝位的1662年,称为康熙元年;他的儿子爱新觉罗胤禛即帝位的1723年,称为雍正元年。干支纪

年即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组成六十对，称为六十甲子，循环往复，直至无穷。用干支纪年始于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此后连绵不断。但是，干支纪年六十年一轮回，重复的情况很多。年号也因帝王的更替而经常改变，很容易引起混乱。今人编纂史书，多以公元代替旧日的纪年，如康熙元年写作公元1662年、雍正元年写作1723年。但是中西纪年方法不同，目前换算方法也不完善，中国历史上的某年并不全等于公元某年。因此，一些专业性的史学著述的纪年仍沿用原有的方式，而以公元纪年加括号注于其后，如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

史书中的记地，也有一定的规范格式。这是因为历史上地理名称及其含义常有变化，如山东、山西、关中、关内、关外、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在不同的时代其所指的具体地理位置是不同的。历史上的地名也相当复杂，有同地异名的、异地同名等等。作者在使用这些地名时，必须注明其具体的地理位置，才不会给读者造成误解。通常的方式是在某一地名之后加以说明并用括号标出。如：三国时代官渡之战的“官渡”，应注明“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夷陵之战的“夷陵”，应注明“今湖北宜昌市东”。有一些地理概念和地名在理解上有分歧，可用注释的形式，在注文中说明作者采用的某一说，或写出作者自己的考证文字。

三、史学著述的语言

史书的编纂，除了讲究体裁、体例以外，还要在文字表述上下功夫。历史认识必须依靠文字的表述才能保存、流传，才能为他人和社会所接受，文字表述的好坏与历史认识的传存和历史认识价值的发挥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迁的《史记》，写人叙事极其生动，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叱咤风云的项羽，豁然大度、不

拘小节的刘邦，眼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李斯，一个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所叙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神采飞动，读之如身临其境，《史记》一书成为千古传承的杰作，与它的优美语言密切相关。相反，一本文字呆板、叙事含混晦涩的史书，难以再现具体生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面，也难以在广大读者中流行传播。例如，被称之为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意大利史学家维科的史书，文字艰深、隐晦，不能清楚地阐明他的思想精华，从而使他的思想不易被读者理解。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一直非常重视史书编纂中的文字表述。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他认为《左传》所以传诸不朽，与它的文辞优美，叙述生动有关。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确有其道理。章学诚也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远而传久也。”^①“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②正因为文字的表述关系到史书流传的效果，历代史学评论者常常把那些富有文采的史学家称为“良史”。班彪父子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③范曄赞班固的史作有文采，“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④《晋书·陈寿传》说：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许多史学家、史评家把史书文辞的优劣作为衡量史书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宋代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的序文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口事实，二口褒贬，三口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褒贬，斯谓褒

① 《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② 《文史通义·说林》。

③ 《汉书·司马迁传》。

④ 《后汉书·班彪传下》。

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学家们对史书的文字表述也相当重视，一些“善叙事”有文采的历史学家总是受到史学评论家的推崇。希罗多德的《历史》被人称为史诗，他的语言华丽，行文流畅，可颂而有韵致。他描述的人物，众态纷呈，个性各异。人们称赞“他会带引你前行，使白闻化为一见”。^[1]古罗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凯撒，也是一位“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史学家，同时代的文学家西塞罗读他的《高卢战记》，称赞“此书叙事明快，开门见山，而且引人入胜，因此它理应受到最高的赞赏。它的文章朴素自然，绝无半点雕琢的痕迹。这犹如天生丽质，毋需衣饰增美。……在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这种一清如水、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赏心悦目了。”^[2]为了使自己的史著能获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为使它能传之久远，许多历史学家都很注意在文字语言方面下功夫。被称为18世纪的英国史家三杰之一的吉本，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他的著作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为此，他十分注意文章风格，刻意求工。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行文自然典雅，流畅可诵，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更是一位妙笔生花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于1849年出版第一、二卷，获得极大的成功，甚至在美国的销量也很大。一位书商说除《圣经》外还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畅销。1855年出版第三、四卷时，出版商慷慨地送给作者一张二万英镑的支票。这在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这部书的畅销不是因为它史料翔实、立论客观，而是因为它文笔优美、绚丽多采，善作有力的说明和巧妙的对比。有人称《詹姆斯

[1] 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2] 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1—42页。

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是一幅绚丽的历史图景，是一床生机盎然的文学花毯。^①

有关史学著述的表述语言问题，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一番话。他说：“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一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这里所说的切实、简要、生动，可以概括为史书语言表述方面的三个基本要求。

切实，就是真实、准确和恰当，具体包括叙述史实要真实而确切，对引用的史料和他人论点的阐述要符合原意，不能随意引伸和曲解；使用的概念，术语要准确、恰当，判断推理要合乎逻辑等要求。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班固评《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②也把‘文直’、‘事核’作为叙事的基本要求。同时，文字应明白、清晰、通畅，使用的概念术语应符合规范，“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③近年来，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人喜欢生造概念名词，制造别扭冗长的句型，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博学。例如有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这么写道：“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和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符号的单一表述。在寓言中，那种对应物本身处于本文的每一个永恒的存在中而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使得那种‘能指

① 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② 《汉书·司马迁传》。

③ 鲁迅：《二心集·答北斗杂志问》。

过程’的一维看法变得复杂起来。”^①这种如同九天玄女奇书的文字在史学著述中也有。诸如“我群人格类型范式”、“广而播化效应机制”、“逆向社会化情结”、“低度负生产特质”等概念，^②不仅是使人难以卒读，读了以后也不知所言为何物。这样的文风，应为史家引以为戒。

简洁，即史书文字的简明精炼。刘知几说：史家“述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要者也。”^③也就是说，作史者应用最简明精炼的文字来表述出最丰富的历史内容。在不影响史事内容的表达的前提下，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毫不可惜地删去。史学家郑天挺在《中国的传记文》中说到文字的简洁问题，他说：“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省字省句，不安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实存，渣去滓在’。”^④简洁的要求还促使作者对自己的历史认识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和清理，一些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地方经过逻辑的思考和文字推敲就会得到澄清，只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才能在文字表述上避免冗长拖沓，言之无物的毛病。

生动。历史本身是运动发展的，历史人物也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学家要把过去的事，过去的人物鲜明而形象地呈现于读者面前，除了文字上的准确、简洁，还要做到生动而有趣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到史书文字的生动问题，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

① 转引自严秀《从‘深入浅出’到‘怪人怪出’》，《文汇报》，1991年3月19日。

② 仲富兰：《少“玩”一点名词》，《解放日报》1992年1月24日。

③ 《史通·书事》。

④ 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269页。

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历史家如无这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①司马光叙述陈胜准备起义，“使吴广夜篝火，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涉。”寥寥数笔，而当时的情景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人物传记，有写舜的孝谨、李斯的自利、秦始皇的刚毅戾深、项羽的“自矜功伐，奋在私智”、刘邦的大度豪爽和流氓气等，一个个真实人物的个性特征都生动具体地凸现出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淝水之战后谢安接读前方战报时的情景：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说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在记述了一场鏖战之后，再添加这一细节的描述，不仅写出了谢安的个性和风度，也使文章的节奏富有变化，读来情趣盎然。

梁启超说：“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优劣”。^②确切地说是作者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驾驭能力上的优劣。历史研究者不仅要关心他的史书的科学性，使他的论著立论正确、观点新颖；还要重视他的史书的艺术性，使他的史著有文采、有情趣，给人以美的享受。

复习思考题

1. 试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简述我国历史著述体裁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2. 简述史学著述的体例。
3. 史学著述的表述语言应符合哪些要求？

^①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

第二节 史学著述的撰写程序

一、研究课题与写作大纲

历史研究的课题是多种多样的，凡是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课题。大的如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运动的规律和特点，国家民族的分合变迁、兴盛衰亡；较小的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古书的真伪，古今地名的沿革等。在这多种多样、广阔无边的历史大地中，如何确定历史研究的课题呢？通常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由现实问题的刺激而产生的研究课题。例如，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实践及其失败，对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严峻的课题：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是否也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中国国情是否特殊等？在这些问题的刺激下，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8年至1929年间，选择了许多古史研究的课题，如《易经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金中的社会史观》等。1930年，他把这些论文汇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序言中说明这些古史研究课题产生于“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而“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去的向”。对现实问题的感受，不仅能产生和确定一些宏观性的研究课题，也能产生和确定一些微观的、考证性的研究课题。如，光绪朝的西北史地和元史研究兴起，主要是受到时局的刺激。其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清政府军事上一败再败，外交上连连失利，《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不战而失。目睹外患频迫、国土日蹙的形势，有感于清廷用事人臣不谙地理边务，勘界谈判动辄失地千里的现状，一部分历史学家群起研讨西北地

理,究明疆域沿革变迁,以资边界交涉之用。因为清西北地区,皆元时旧壤,蒙元史地也被择为研究课题。^①

(二)由史料中的问题而产生的研究课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与历史本身相比,总存在着真与伪、正与误等问题,由此也可以引出许多研究课题。例如,新疆所出的佉卢文书,是研究西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史料所显示的时代特征不明显,只有规定清楚史料的时代性,才能进一步用来研讨西域的历史,这样便产生了有关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的研究课题。^②又如,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诗歌,曾经为许多人传诵,但能否据此来论述石达开的思想,首先应确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于是便引出了有关石达开诗歌的真伪问题的研究课题。^③秦汉时代的有关史料中常常提到一种刑法叫“城旦”,是指对犯罪的男子罚以筑城四年的苦役。筑城的苦役何以称“城旦”,前代学者注家都把“城旦”解释为“早晨起来去修筑城墙”,但“城旦”既为一种苦役,劳动时间必定很长,决不会只限于早晨,解释为“早晨起来去修筑城墙”于理不通。于是便有史料含义的诠释问题的研究课题。^④

(三)在不同的历史认识的争论中引出的研究课题。例如,《唐律疏议》是解释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永徽律》律文的名著,历代文献、书目著录都认为它是唐高宗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奉诏为《永徽律》所修撰的《律疏》。而自上世纪末起,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它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采用此说,几十年来,极少异议。但是细疏文献,旁证史实,日本学者的论点并不可靠。《唐律疏议》究竟是《永徽律疏》,抑或为《开元律疏》?修撰者是长

①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24—125页。

② 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载《文史》第七辑。

③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④ 陈金生:《“城旦”解》,载《文史》第六辑。

孙无忌等人,还是李林甫等人?不仅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也是研讨唐代典章制度史实所应解决的问题,这就有了关于《唐律疏议》制作年代的研究课题。^①又如北魏六镇,是北魏政府在北边所设的六个军事重镇,但六镇究竟为哪六个镇,自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后一直有分歧。杜佑、胡三省、顾祖禹以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为六镇;李吉甫、沈垚等以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为六镇。此两说谁是谁非呢?抑或六镇一词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呢?由此产生了有关北魏六镇的研究专题。^②有关思孟五行说的内容,历来聚讼纷纭,利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卷后所附思孟学派无题佚书,结合前人的各家观点,又产生了有关思孟五行说的内容的专题研究。^③

对选定的论文课题,还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即考察主、客体方面的条件。主体方面主要是考察研究者个人或集体是否具备从事某项课题研究的能力,包括他的理论修养、专业知识结构、研究经验、学术积累等。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而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修养,研究殷商史而缺乏古文字、考古学的专业知识,那么选定的课题是难以完成的。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条件选择一些与之相适应的题目作为研究课题,同时,也应该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来充实和学习一些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从客体方面说,应考察有关该课题的资料积累是否完备,有没有新的资料、有关资料的搜集的可能性。如果资料极为稀少、或者是极其分散难以收集,那么就不宜确定为研究课题。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的《关于选择研究题目》一讲中说:不论从科学工作的正常秩序方面说,还是从科研能力的锻炼成长说,我劝青年在选题时要考虑这样的次序:先个别,后一般;先局部,后

① 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30页。

② 陈仲安:《八镇臆说》,载《文史》,第14辑。

③ 庞朴:《思孟五行新考》,载《文史》,第7辑。

全体；先断代，后通代；先分析，后综合；先具体，后抽象；先把局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搞清楚，然后进行全面的发展规律的抽象概括。总之一句话，从“小处着手”。^①选题应从小处着手，不要一上来就急于做内容很广、抽象层次很高的大题目，是历史研究者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时应该注意的。

选择和确定了研究课题后，史著撰写的第二步是拟定一个写作大纲。写作大纲既是一份史书编纂者的工作计划，依照计划的安排，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做到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同时，它又是史书的结构体系的表现。一份写作大纲，就是一本史书或论文的结构框架。从根本上说，大纲所表现的史书结构是客观历史的内在结构的反映。正如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历史研究者依据他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来组织和排列叙述的次序，用简明的标题列出史书的框架结构，这就是史书的写作大纲。

一定的写作大纲依据于一定的历史认识，如果研究者的历史认识是混乱和无条理的，那么由此而拟定的大纲及大纲所反映的史书结构也必然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大纲的拟定及史书结构的设计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认识，也取决于作者的编纂技巧和方法。这里，还存在着一个运用怎样的方式方法来拟定大纲和设计史书框架结构的问题。

一般说来，史书写作大纲和内在结构的设计主要有二种方式。

（一）历史的方式，即严格按照历史过程的时间顺序来安排

①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叙述次序和设计结构体系。各种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和各种章节体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等，都采用这种方式来拟定大纲和设计结构体系的。

(二) 逻辑的方式，即以历史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运动的逻辑结构来安排叙述次序和拟定大纲的体系。一些专题论证性的历史著述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如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大纲编排就采用这种形式。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绝大部分，即前四编的结构，与一般单纯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只有最后一编，即第五编，才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史进行纵的分析”。^①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通常运用的以事物的矛盾运动的逻辑关系为顺序的结构体系。又如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作者没有死板地追从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具体细节，而是以劳动为逻辑起点来展开事物发展运动的内在逻辑，论述了劳动怎样改造了猿的生理特征，怎样推动人类思维的产生和发展，怎样使猿变成了人等，其大纲或结构框架的设计是逻辑式的。

当然，上述两种方式在实际运用中总是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纯粹单一的。例如编著一本中国近代政治史，一般是用历史的方式来拟定全书的总体大纲，分章叙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历史大事。而在每一章中、即在叙述每一件历史大事时，又运用逻辑的方式，按照史事的主次关系、轻重关系，历史的矛盾运动来设计具体的节、目等。这样拟定的大纲，使史书的结构层次、条理清晰、纵横联系、严谨有序、统一完整。

史书写作大纲的拟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研究者在确定课题之后所草拟的提纲，可以作为进一步思考和收集资料的向导，

①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7月版，第1页。

一旦进入了具体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时，又会发现原先草拟的提纲很不确切，或者是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而原先的提纲则没有列入；或者是缺少提纲所规定的资料，等等。这都需要研究者依据思考和史料积累的状况而加以修正，即使在编撰过程中，修正提纲也是常有的和正常的事。

二、史料的积累和整理

在确定研究课题和草拟写作大纲的同时，还要进行的一项工作是积累研究资料。

史料的积累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往往要花去全部研究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八十。^①历史科学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虚构，不可随意推测，论点或结论都应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这就离不开史料的收集和积累。史料积累讲究多和全，前辈学者有“竭泽而渔”之说，意思是说要收集到有关课题的全部史料，不要有任何遗漏。虽然要掌握全部的有关史料的要求，在实践中是难以达到的，但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和要求，朝这个目标和要求去努力。恩格斯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②一个历史实例尚且如此，一些宏观性的课题研究的史料积累那就更加繁重艰巨了。史学家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为编撰《资治通鉴》，遍阅官私图书如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和私家藏书，除正史外，采集杂史322种。书成后，余下的史料还储满两屋。包括史料积累在内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为探索真理所进行的艰苦劳动，没有艰

①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79页，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也讲到，“历史学家在资料准备工作上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真正用于研究的时间，比例很不相称”。（见该书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辛的付出，是不可能获得科学真理的。在这方面，经典作家的治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引用和提到过的著作共达505部，所用的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凡59种，报刊56种，其中包括长达40多年的《泰晤士报》，几乎每年都有引用。列宁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用外文出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统计汇编。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包括从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2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中作的摘录。”^①当然，随着史学研究手段的进步，史料积累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将逐渐减少。

史料的积累也是一项仔细和持之以恒的工作。文献的阅读要仔细，手勤眼快，随看随记。只有平时随时注意记下有用的材料、坚持不懈、细水长流，日后使用时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史料的摘录也要细致认真，书名、卷次、页数、版本一定要同时记下，以备日后用时核对原文。摘录的材料，要注意文义完整，不可断章取义。转摘的材料，一定要核对原文，辗转抄录，最容易发生错误。

史料的摘录是一件枯燥而又费时的工作。国外已开始运用电子计算机、微缩胶卷等手段来贮存史料，这种方法方便省工，且不会发生抄写中的错误。但是费用高，在条件尚不具备时，用笔记的方法摘录史料，仍是不可缺少的功夫。史料的积累，可用专门的笔记本，也可以用资料卡片，而又以资料卡片较为方便，因为卡片可分可合，可以抽换，便于补充。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讲到他为研究《墨子》、《乐记》、《吕氏春秋》等而进行的史料摘录，他说在研究《墨子》时，“对吴起发生兴趣，将《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抄出”；研究《乐记》，“把《乐记》按照刘向《别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说明，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V页。

录》的原有次第加以整理，整个抄录了一遍”；研究《吕氏春秋》，“接连几天，翻来覆去地把《吕氏春秋》读了好几遍。我的一贯方法是先就原书加以各种注意的标识，再备一个抄本把它们分类摘录下来，这样在下笔的时候，便可以左右逢源了”；他研究《管子》，把《心术》、《白心》、《内业》等诸篇整个抄了一遍。^①前辈学者的不惮麻烦、踏实认真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学习和效法的。

史料的搜索积累，不仅要有毅力，还要有一定的方法，否则事倍功半，收获不大。毛泽东在谈到历史研究时，很推崇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②苏东坡在《与王庠书》中云：“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故愿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甚非速之术。”“八面受敌”源出《孙子兵法》，谓如果八面受敌，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面。用来比喻史料收集方法，就是要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搞，每读一遍史料，只注意收集一个专题的材料，可以做到神不旁骛，专心致志。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也曾介绍过这种方法，他说：“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范围，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③

对已收集的史料还要进行分类、排比的整理。

史料的分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合理的分类是建立在对史料内容性质的正确理解上的，有些史料内容的性质很明显，不需

① 《郭沫若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471、472、480页。

② 《关于农村调查》，《文汇报》1978年12月14日。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9页。

要作专门的研究分析；有些史料内容的性质不很明显，这就需要研究者的仔细分析和考察。如果史料归类不当，后面的研究工作就会遇到障碍。如汉代的地方官吏有平均各方面灌溉用水，防止发生用水纠纷的责任和权力，这种责任和权力在《汉书》中常称为“均水”、“平水”、“行水”等。研究者不了解“均水”、“平水”、“行水”的含义，把它当作一种水税专用名称，把它归入财政税收类，用来论证西汉曾有水税的征收，就导致了结论的失误。^①又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的“素族”、“素门”等或是对宗室而言，或是对家世显贵受封爵邑者而言，实际上是士族的互称。研究者如不理解其间的区别，看到史料有“素族”、“素门”，就简单地把它归类于寒人，就会引出错误的结论。^②尤其是实物史料的分类，难度更大。例如，殷代西周出土的大量金属物件，究竟应归类于农业生产工具，还是武器、礼器或装饰品呢？物件本身并不会“开口”，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各个方面、运用各种方法或手段来破译它们的信息含义，才能进行正确的类别划分。

史料的内容是丰富多样，而不是单一的。某一段文献记载，从正面看，显示出这一方面的历史内容；从反面或侧面看，又会显示出另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研究者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只对它进行一次性的分类处理，那就会损失掉许多宝贵和重要的史料。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段记载，从正面看，不过是迷信的记录，可归入宗教迷信的门类；从反面看，却暗示了当时的人们已在开始寻求海外航线，还应归入海外交通等门类。梁启超在谈到殷周时代青铜器的史料价值时说：“此类之器，除所铸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

① 施正康：《汉代水税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4. 2。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249—252页。

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①

史料的整理排比，就是确定史料的时代性，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整齐。史料时代性的确定和按时间顺序的排比是史料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研究中，因史料时代性失考或时间顺序排比不当而导致结论失误的事也是较常见的。如秦律研究，常运用《云梦秦简》，那是秦昭襄王元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法律文书，如果忽视了它的时代性，用来论证秦朝统一后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法律制度，就犯了用早期史料论证后期历史的错误。^②又如，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论点为了证明明代中叶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把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的材料用作依据，但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当1644年清王朝建立政权时，他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屈一生六十六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清代渡过的。《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左右或稍后，该书有引录旧籍之处，但据作者自序，所记大都是17世纪50到80年代广东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能用来论证明代经济性质。该论点还依据了《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十卷织工部杂录所引《苏州府志》上的材料，这些材料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蔡方炳等所纂的《长州县志》第三卷和康熙三十年（1691年）宁云鹏等所纂的《苏州府志》第二十一卷，《古今图书集成》是从康熙志上转录的，也不能用来论证明代的经济情况。这都是史料年代失考而导致的用后期史料来说明前代历史的错误。

史料年代的确定，有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两种。有些史料可以确定其具体年代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通典·选举典》载：“延康元年，吏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3页。

② 杨廷福：《张晋藩等编〈中国法律史〉评议》，载《中国史研究》1982.4。

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秦始皇二十三年，即公元前224年；延康元年，即公元220年。这里所确定的具体年代，称之为绝对年代。有些史料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代，只能比较和推定其先后时序的，如，仰韶文化中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陶器等遗物史料，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龙山文化中的遗物史料，其年代为公元前2800—前2300年。这里所确定的年代，称之为相对年代。

史料年代的确定方法有多种，通常有根据天文学和古今历法来计算的方法，如有关屈原的生年，史料没有记载，但《离骚》中有“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可知屈原生于太岁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研究者根据天文学、古今历法以及其他文献记载，断定屈原生年应为公元前353年。^①有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推算的，如有关《唐律疏议》制作年代问题，研究者根据文献的著录、《唐律疏议》的刊本、《唐律疏议》中的避讳及地名、职官等记载来断定它的制作应在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②还有根据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推测，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设计的新方法，如碳素年代测定法（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有机物中碳—14放射性的减少程度来测知其年代）、热释光法（主要用于陶片的年代测定，根据陶器的自然热释光的积累量来推测它的烧制年代）、古地磁断代法（根据某一地区的地磁方向和强度随年代变化的关系来测定它的热剩磁性，由此来推测该地区的人类文化遗址及遗物的真实年代）、树木年轮断代法（通过对古墓或遗址中发现的本材的研究，将其年轮曲线与标准曲线比较，可确定其砍伐的年代，并进而推测古墓或某一遗址的年代）等。随着这些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史料年代的测定越来越精确、可靠。

① 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载《文史》，第五辑。

② 杨廷樾：《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30页。

对一些已经标明年代的史料，研究者可以利用各种历表、年表类的工具书进行换算统一。常用的工具书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万国鼎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中国历史纪年》（荣孟源编，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中西回史日历》（陈垣编，中华书局1962年修订重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郑鹤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薛仲三、欧阳顾编，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等。将确定了时代的史料按时间顺序编排起来，历史过程的先后顺序就显现出来了。

三、札记和论文的写作

前辈学者在论及史学著述的写作经验时，大都认为在撰写历史著作或论文之前，应先学写札记。札记也称读史札记或读书札记，就是用笔记形式记录下阅读史书或思索历史问题时的心得体会。札记的文字长短不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史学家陈垣有一条札记，考《廿二史札记》中列传名目沿革条正误，仅300字；史学家吕思勉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中的《资格用人之始》条，仅150余字，《汉世选举之弊》条，仅330余字。短小精悍，堪称札记的范文。初学者可先写一些短小的札记，待有所积累之后，逐渐增加字数，写一些较长的札记。

札记的内容很广，有诠释文献史料含义的，有考证历史人物的活动、生卒年代，历史地名沿革，文物制度的渊源变迁等。可以是自己的新看法、新发现，也可以是纠正前人的谬误。札记的写作在于勤与快，要勤思索，勤记录。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很重视札记的写作，特别强调要及时记录下读书和研究中的心得体会，他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写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入大海矣。”^①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思想火花，一

^① 《文史通义》外篇三。

瞬即逝，如不及时记录下来，过后就无处寻觅了。所以，札记的写作，必先备一本专门的本子。梁启超在谈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时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①清代不少有名的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都有以札记的形式写出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

梁启超把札记分为三类：“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②札记的写作，多用归纳的方法，其具体的程序为：“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溯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汉初妃后多出微贱》、《东汉功臣多近儒》、《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人继》、《晋帝多兄终弟及》、《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等，都是运用归纳法，在汇集大量同类事项和分析其共同特点之后，概括出关于这类史事的结论。

写札记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积累知识，考虑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字的训练。待札记写得多了，材料、知识积累较多，问题的思索也较成熟和有系统，文字也得到了磨炼，就可以开始写文章了。札记——论文——专著，这是一般的史学著述的写作程序。史学家顾颉刚说：“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

^{①②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5—66页。

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①陈垣在教导学生时也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②如果把写史学论文、著作比作造高楼大厦，那么写札记就是为造高楼大厦打地基；地基打得好，打得扎实，高楼大厦才能造得高、造得牢。史学家吕思勉费三十年的精力，先后写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断代史，这四部断代史，内容丰富而扎实，总计有二百九十余万字。后人在总结他的治学经验时，发现他能写出这样多的内容扎实的历史著作，与他的札记积累是分不开的。《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出版说明里这样写道：吕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踏实的，而从事研究工作又是极其勤奋的。除了担任大学的教学工作以外，主要把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每天从清早起来，就埋头于研究和写作，孜孜不倦，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五十年间，曾经从头到尾地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曾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每钻研一个时期的历史，每探索一个历史问题，每读一本历史书籍，都要仔细排比资料，谋求探索事实真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写成一条条札记。这样札记的写作，五十年没有间断。由于钻研的不断深入，有许多札记曾多次补充和改写，……作者的许多历史著作，特别是四部断代史的著作，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③该书汇集了他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札记，共88万余字，可以供我们试写札记时学习参考。

在学习写札记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论文的写作。论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史学研究过程——从提出问题，到分析、解决问题——进行总结。因此，史学论文的构成大体也包括引论、论证和结论

① 《浪口村随笔》油印本序。

② 赵光贤：《回忆我们老师援庵先生》，载《励耘书屋问学记》。

③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出版说明，1-2页。

三个环节。有时，论证和结论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论文写作的主要环节是引论和论证。

论文的引论如同史书的前言，但它比史书的前言更简洁，内容更集中，主要是交代该课题研究的价值，前人的研究状况以及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研究课题，都有它的意义或价值，否则，就不值得进行研究。有的主要是有学术价值，有的具有现实的意义，有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而有之，这都需要作者在引论中加以说明。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引论中也应该交代有关课题的研究状况，对前人的研究做一总结和评述，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起点，并证明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论证是论文的主要内容，目的是通过对论文课题及相关问题的分析、研究，来论述或证明自己的论点。一般说来，叙述性论文的论证部分，大都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或历史人物的活动经历为线索来展开的。而专题论证性的论文，其论证部分大都是对主题有关的各个方面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分别进行论述。

论证过程，就是通过一定的推理方式，运用真实性的论据来证明论点或论题正确的过程。作者要有效地论证自己的论点，必须保证论证过程的正确性。为此，必须做到两点：一，用于论证的论据应真实可靠；二，论证的推理过程应符合逻辑规则。如果论据虚假或推理不合逻辑规则，那么论点便没有得到证明。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如此，批驳他人的观点也如此。论文写作的最后一环是修改和润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 检验论文的结论能否成立，概念、术语的使用和推理判断是否恰当。2. 考察史料运用的情况，或补充、或删节，或是调整史料的主次轻重，或突出典型的、能说明论点的史料等。3. 进行文字上的修饰加工，务求通顺、简练，明白，修改病语、病句，删去空话或可有可无的文字等。4. 规范体例格式，如统一引文，按照一定的格式要求制作附录、注释、统一和规范论文中的标点符号等。

经过这一环节的工作，论文的写作就算完成了。当然，修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前辈学者常常主张写成的论文不要急于定稿或发表，应该放一段时间后再作修改，往往能发现一些以前忽视或不易发觉的问题，或者请同行学者审阅，相互研讨，相互切磋，以使文章更加完善。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确定研究课题和写作大纲？
2. 怎样积累和整理史料？
3. 怎样写读史札记和论文？

第八章 历史学的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第一节 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历史学的功能

一、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人类的^①活动可以区分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两大类型，实践活动是人们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的活动，对于实践活动的作用和影响，人们是能够亲眼目睹的，一般说来，是不会怀疑和否认的。认识活动是一种并不直接引起现实变革的感知活动，对于它的作用和影响，人们常常会忽略和轻视，尤其是历史认识的作用和影响，常常会被视为无用的或无价值的。人们常常会问历史学家：历史有什么用呢？数千年前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们有什么必要去了解它呢？18世纪的一位法国女数学家、物理学家马尔奎斯·杜·查特理特曾说，她与伏尔泰一样，对历史认识感到困惑：“一大堆混乱的无联系的事实，一千个关于不带任何决定性的战争的叙述。一个和我一样的法国妇女有什么必要知道在瑞典埃格利继承了哈奎恩和奥托曼是奥托古尔的儿子？为什么她要关心关于17世纪英国妇女生育率的问题，为什么她要关心现代美国炼钢工人以及诸如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的家具，法国军队的新兵中的痛风病的发病率等问题。”^②否认或轻视历史认识的作用，是一种较普遍的观念和态度，即使是一些以历史研究为

^① 恩斯特·布萊薩赫：《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10。

职业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对历史认识的作用和影响力表示怀疑。如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贝克尔,就认为“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①这种对历史认识的影响和作用的忽视和否认,对于全面理解和发挥历史学的价值、功能是很不利的。

历史认识活动就其直接的目的来说,是获取有关历史的知识,它的直接结果不是可用价格衡量的物质成果。但是,它与人类的物质活动一样,与人类的其他认识一样,也会产生出巨大的价值和功能,也会对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发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曾这么说:不要轻视闭门苦思的哲学家,因为他可以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把他视为从事着许多价值轻微的工作的无害的学究,那就是低估了他的能量;假如康德没有使唯理论神学家的上帝威望扫地,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掉国王的脑袋。海涅还警告过与他同时代生活的法国人:德国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们(费希特、谢林之类的追随者们)乃是一群狂热的信徒,他们既不会被恐惧吓退,也不会因为喜欢寻欢作乐而却步,总有一天,他们会在狂怒中揭竿而起,把西方文明的丰碑夷为平地。他警告说,当这股巨大的形而上学的浪潮把欧洲推向战争和毁灭时,相形之下的法国革命就显得如同一场区区儿戏了。海涅切身体会到,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例如他随堂听讲的黑格尔的思想)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它是间接的力,却又是深远的力:哲学家决不是无害的咬文嚼字者,而是一股巨大的或善或恶的力量,是人类未被认识的立法强人中的姣姣者。^②海涅说的虽然是哲学和哲学家,然而,史学和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呢?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逊曾在1950年的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说中说:历史学家“的决定和政治家的决定不一样,……并不会使他的国家投入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34年版。

② 麦基:《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3页。

一场血战或者屈辱投降；他的决定也和军人的不同，并不会赢得一场战役或者被打得大败；但这些决定却完全能够注入历史的长流，对未来起重大的影响。假使班克罗夫特没有如此生动地描绘出争取统一的斗争，美利坚联邦会被保存吗？如果法国历史学家没有对拿破仑一世歌颂备至，拿破仑三世会在1870年投下那致命的赌注吗？如果休谟、林加德和莫姆逊的意见占上风，而不是格林、麦考莱和特里维廉（又译屈维廉——引者）的见解被接受，英国人还会那样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始终维持他们的政治自由吗？”^①

这是不是哲学家、史学家的自吹自擂、夸人其辞呢？不是。肯定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的存在。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运动具有客观的联系性和共通的客观规律性。当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方向、计划建立在对这些客观联系性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时，人们的实践活动就较少盲目性，较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当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联系缺乏认识，对影响和制约他们实践活动的历史因素一无所知，那么他们的实践活动常常是盲目的，预期的计划、目的也难以实现。长期的社会实践，使人们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运动具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和客观规律，体会到对历史的认识与他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and 影响。如果历史只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既无联系，又无规律，那么，对历史的认识，除了满足个别、暂时的好奇心或抒发思古的幽情外，就不会再有什么影响和作用了。

从根本上说，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不外乎正与反、积极与消极两种。正确的历史认识，是客观历史真实面貌的反映，是对历史的客观联系和客观规律的把握，因此，它能帮助人们顺应客观的历史规律来制订他们实践活动的目的、

^① 萨缪尔·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64—265页。

方向、计划等，指导人们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办事；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和作用；错误的历史认识，歪曲了历史真相，歪曲了历史的联系性和规律性，不仅不能引导人们按照客观历史规律办事，反而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使人们的实践活动与客观历史的发展运动背道而驰。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种种失败、挫折，都是由于在付之行动之前缺乏对对象的历史联系和内在规律的正确认识所造成的，这种因错误的历史认识而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入歧途的事例是很多的。萨缪尔·莫里逊曾就这种情况批评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历史学家，他说：当时的美国历史学家们，以毕尔德为先导的这一派历史学家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感所影响，完全忽视战争，贬低战争，宣扬任何战争都是不必要的，一切战争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对战胜者说来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反战派历史学家都是真诚的，很少有人是空想和平主义者，这已经由他们最近几年的行动所证明；尽管如此，他们的反战热情并没有对保卫和平作出任何帮助，他们只是使1940年前后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没有为他们必须投入的战争作好精神准备。”他又说：“当然，美国人之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作好精神准备，并不能全怪我们历史学家，当时，在文学中，在壁画和银幕上，在广播节目里，到处都充斥着和平主义、幻想以及对一向公认的价值标准的忽视。但是历史学家的过失比较大，因为他们当时有责任指出战争确实也带来相当好处，战争总比被奴役好，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①

为了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性，人们需要正确的历史认识，尤其是有关历史与现实运动的客观联系和共通的客观规律的历史认识，也只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才能对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价值和功能。历史学的研究尽管遭遇了许多挫折，也出现过大量的谬误，但是，总的说来，它在人们现实社会实践中

^① 萨缪尔·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208页。

所作出积极贡献是巨大的。千百年来，人们为认识和驾驭自身社会所作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一部史学史，记录了人们不断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的历程。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最艰巨的事业，因此，也是最需要科学的历史认识为它服务。恩格斯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以启示“人们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①

二、历史学的功能

1. 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功能

历史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指导的作用。

自史学产生以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希望从这种总结、探索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达到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自觉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追求目标，也是人们对历史学所寄予的期望。

古人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这是把历史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又曰：前车覆而后车戒。这是把历史当作前车之戒。前人成功的经验，可以奉之为法，照着他做；前人失败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力图避免。周，原是一个小邦国，竟然灭了大邑商。这对周人来说，也多少感到惊讶和不解，他们不愿重蹈殷人的覆辙，认真总结殷人灭亡的原因，周的统治者一再告诫周人：我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页。

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以殷的历史教训为诫，制定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政策。这就是所谓“殷鉴”。以后，“殷鉴不远”几乎成了封建统治者们的醒世警钟，也成了他们欲保有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秦亡汉兴后，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汉何以避免重蹈秦人的老路，成了汉初政治家、史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贾谊写《过秦论》、陆贾写《新语》，总结秦亡的教训，以供汉初统治者的借鉴。《新语·无为》篇指出，秦代事功越烦，心下越乱；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但秦之崩溃，正是由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汉初的统治者改弦易辙，认识到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由此形成了“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和“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唐初的君臣，以隋代为戒。太宗李世民感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随时对照自己的言行。魏征作《隋书》，告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言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上助圣明之鉴”，他规劝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①明内阁首辅张居正编《历代帝鉴图说》，收录古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望神宗“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治世”、“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与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自觉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前人历史教训有密切关系。这些事例都表明，史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史为鉴”上。

西方一些著名史学家也都把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以垂训后世看作他们治史的目的和责任。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史》里，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著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到的那些伟大成

① 《进〈资治通鉴〉表》。

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①李维在《罗马史》的序言里说得更明白。他说：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这种在历史中寻找教益，给后人有所借鉴的作法，由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们所开创，并为后代的史学家们继承发扬。如英国历史学家博林布鲁克把史学看作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的功用就是为读者提供历史教训和事例，用以提醒世人。^②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傅里曼把历史当作政治事件的记录，强调历史对当前政治的借鉴作用，他有一句名言：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

在人们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许多现象和事物是会不断重复和再现的，时空条件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它们的重复和再现。如，“氮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生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③于是，前人的经验教训，对后人的实践活动就能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以史为鉴”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除了上文例举的在有关“军国大事”的实践活动外，在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卫生保健等方面，“以史为鉴”都能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和功能。

但是，与自然界中事物相比，人类社会的现象和事物是十分

①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② 王晴佳：《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载《中西历史论辩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2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复杂的，人们实践环境的变化也异常迅速，有些事物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似或类同，其本质已完全不同了。一定范围、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经验教训在另一些范围和历史时期里并不总是有效的，“以史为鉴”也常常会导致失败，尤其是那些不顾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将前人的经验教训生搬硬套于不同的历史条件，那就是“执陈方以医新病”。在社会变迁较缓慢的时代，前后事物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况变化剧烈时，仍是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物，怎不陷于失败呢？所以，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们，在运用历史来指导现实社会的实践方面，更多的是将它建立在对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较早发现了前人“以史为鉴”中的失误，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法。他说，所以借鉴、资治，不仅在于知治、知乱，而且要做到求治避乱，应“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①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得更明确，他说，史学“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②他又说，新史学应“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③在西方史学史上，较早的如维科，力图在历史中探求一切民族的兴起、发展、成熟和衰亡的永恒规律。伏尔泰主张着眼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寻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孟德斯鸠试图以历史为根据来寻找一般规律，又用一般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爱尔维修欲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学，来客观地说明人类社会及其

① 《读通鉴论·叙论》五。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九》。

发展规律。19世纪下半叶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阐明，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真正地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未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因此，历史学对人们社会实践的指导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总体上还未能走上自觉的道路。

迄今为止，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了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但从因果必然性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规律，而且也从因果必然性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各个局部领域，如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等领域的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低层次的“以史为鉴”逐步上升到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在这个阶段里，人们不必再在什么理想王国、正义社会或大同世界里寻找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可以以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依据，来达到对人类历史的真实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创造那更符合人类本性的、对人类来说是应该如此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地指导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真正实现。

2. 陶冶人们的品格情操和启迪人们的智慧的功能

弗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历史使人明智。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就是说，通过历史的学习、教育，可以产生一种陶冶人的情操、升华人的精神、启迪人的智慧的作用，这也就是历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这么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

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他论述的是《春秋》，但实际上阐明的是他对史学功用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体现着正义公正，褒贬是非，意存训戒，有助于敦风化俗，端正人心，起到法律所不能起到的功效，要教化风尚、培养人的崇尚情操，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历史学习。

历史就是人类的过去，一部历史书就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创造的全部记录。它记录了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历程，记录了世界上各个文明的盛衰兴亡的足迹、记录了无数个英雄伟人、志士仁人、革命先烈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马克思曾把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比作一部“历史剧”。^①向历史学习，受历史的教育，就是侧身于这一部部“历史剧”中，身临其境地去体验、观察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美的、或丑的生动的人物群像：有为国家、民族舍身捐躯者，有卖国求荣者；有杀生成仁者，有求生害义者；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有为五斗米折腰者；既有悲剧喜剧人物，又有笑剧闹剧人物。总之，各种形象和脸谱，无不具备。侧身于这样一幕幕“历史剧”中，可以洗涤你的灵魂，提炼你的品质，升华你的精神，激发你的热情。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是绍兴人。绍兴曾哺育出许多优秀的人物，如王充、严子陵、徐渭、朱舜水等，他以自己是这块“报仇雪耻之地”的子孙而自豪，曾整理过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向历史上的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好汉们学习，为推翻吃人的筵席，为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垢而呐喊，他不止一次地教导后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191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旧书，不可不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读也。一国文学，为一国之精神，物质文明，固不可缺少，而自国精神，终不可使失坠也。^①身在异国，仍不忘学习祖国的历史与文学。同他一起留学的同学后来回忆说：“紧张的日语学习，并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在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中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的绘述。”^②历史的魅力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易经》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③《左传》曰：《春秋》“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④司马迁作《史记》，也以教化训诫为主要任务之一，后人称他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戒，为后之楷模也。”^⑤刘知几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⑥“彰善癉恶，以树风声”，既是治史的任务，又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学著作也都很重视利用历史进行道德教育。李维说，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他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的热忱，意存劝诫而褒贬分明。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屈维廉认为历史学的功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它能陶冶心智，开拓胸襟、消除偏见、激发志气。在《克莱奥——一位缪斯》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已做的事的记述，比起它的原因和结果来，更能通过扩大同情心的广度，通过加深良知的赞同和反对，锻炼我们的政治判断；它用过去的榜样鼓舞青年人有抱负，鼓舞老年人能坚持；它以人们曾经有过的情况为镜鉴，使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怎样，使我们模糊地预见

① 《致父母信》，《樱花节书简》，1913年3月17日，第58页。

② 钱潮：《回忆洙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左传》成公十四年。

⑤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训》。

⑥ 《史通·直书》。

到我们将来又应当是什么样了”。^①

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历史课的教育和启迪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增强民族自信力。

历史是民族自信力的根据。中国近代文学家、史学家章太炎曾说：“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②又说：“史之有关于国本者至大，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韩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之后，炎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矣！”^③这些论述说明，国民的民族历史意识的强弱，与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中国历史为例。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持续发展，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间虽曾多次遭到严峻的考验，但每一次都最终战胜了艰难险阻，取得新的发展。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短期的分裂，但统一是主流；虽有民族间的冲突、斗争，但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共处仍是历史的主线。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众多的民族，人口转聚在一起，数千年间连续不断地繁衍和发展，这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春秋、战国、秦汉文明可以与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媲美；唐宋盛世的文明水平，更是西欧“黑暗的”中世纪所不能企及。一部中国历史，是我们民族自信力的根据，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力，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的信心。

（2）激发爱国主义的热忱。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情感和意志的表现，

①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81—182页。

② 《国故论衡·原经》。

③ 《讲谈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

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千百年来巩固、凝聚起来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和信念。这种思想感情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出一种崇高的品质和精神。崇敬祖国、热爱祖国，并为之奋斗终生，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历史讲稿》的“引言”中这么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的确，到外国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就更知道祖国的可爱。不把外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比较一下，就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并不是对不起我们的，对我们很不错，给我们留下很多珍贵品。”^①远古的先民，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开辟我们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山河，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中华民族子孙世代代生活、繁衍在这片土地上，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培养了极其深厚的胞泽之谊。保护我们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护这千百年积累的优秀文化，珍惜世代相传的民族感情，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天职。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代又一代的先烈志士，怀抱着爱国热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构成了历史上的灿烂篇章；为了推进祖国的文化发展，一代代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创造了一笔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梁启超说，历史是爱国主义的源泉，^②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能激发起我们树立要无愧于先辈和后辈的历史责任感，加深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就是激发起我们的爱国主义热忱。

（3）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历史学的特有功用之一，就是它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例为素材，提供了一部生动的道德伦理的教科书。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心目中树立几个学习的榜样

^① 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7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新中学》。

或楷模，仿照他们的行为准则来为人行事，把他们的嘉言懿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鞭策自己努力上进。李大钊曾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①这种“见贤思齐焉”的心理冲动，是不难体会的。当我们读到诸葛亮忠贞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读到文天祥宁死不屈，以诗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因禁烟被黜，然报国之心益烈而写下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怎不令人热血沸腾，心神向往呢？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家孙中山、黄兴、陆皓东、秋瑾、陈天华、林觉民，乃至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等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足以荡涤人们灵魂深处的污垢，萌生革命的豪情和崇高品质。这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使人明智，历史还使人品德高尚。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估量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2. 历史学有哪些主要社会功能？

^①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第二节 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使命和基本素养

一、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概括地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为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促进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做出自己的奉献。具体些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明历史事实的真相

任何一位史学工作者都会同意“阐明历史的真相”是他的基本责任，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过去，它并不能为人们直接观察，人们只能依据点滴、零星的历史残骸以及各种带有主观烙印的文字记载、口述回忆等来追溯那已经消逝的往事。这就需要经过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收集、整理、比较、鉴别、考证，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才能清洗出历史的真面目。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史学工作者就是为承担和完成这些任务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分工群体，从隐晦曲折、若明若暗的历史信息中，钩沉发微，阐明真相，这是史学工作者的专长，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

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使得它比自然科学更多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干扰和影响。历史真相的阐明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还常常与一定的阶级、集团、政党的利益相联系。一些阶级、集团、政党常常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或从一己的利益出发，掩盖历史的真相，歪曲历史面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借用豪斯曼的话说，准确是责任，不是美德，称赞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准确，就像称赞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中用了干燥的木材、或者适度的混凝土。

这是他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主要职能。^①虽说只是责任，不是美德，但要尽到这个责任，却不是十分容易的。秉笔直书，不怕犯忌，这在封建社会中又有几人做得到？所以，历代的史评家，也总是把它作为美德来称赞。凡是能做到“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的，大都称之为信史，其作者称之为良史；凡曲笔粉饰、掩盖真相的，称之为“秽史”，这是对史书和史家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阐明历史事实的真相，是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至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阐明史实真相的任务极其复杂而艰巨，以至需要一些史学工作者毕生专门地或侧重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史学工作者之间的内部分工。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处于现在时代，研究学问除了分工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他们（指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第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用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学’……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②这充分说明了通过校勘、训诂和考证阐明史书、史事真伪是进一步探寻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历史研究，也就谈不上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了。

（二）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发挥历史借鉴的功用

历史是人类生活经历的记录。以往社会实践中留存的大量历史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如果人们没有这些经验的借鉴，一切都要自身试验，从头开始，那么人类就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也许还

①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

② 《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三册第7页、第四册第22—23页。

停留在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的阶段。历史的经验十分宝贵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但是，要让历史的经验发挥出积极的功能或效用，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历史上，因错误地运用了历史经验而导入歧途或引向失败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说过这么一个事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看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的执着前事以推论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些失着。^①当然，袁世凯和筹安会这些人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的“洪宪帝制”与历史发展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而从学理上分析，则与他们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耗费巨资兴建的马奇诺防线，是法国人在认真地总结了两次德法战争（普法战争和第一次

①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页。

世界大战)的经验后作出的战略决策,^①以为要击破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并不会简单的重复,德军以“黄色计划”,而不是“史里芬计划”,绕过了防线,结果法军全线崩溃,这同样与历史经验的运用不当有关。

看到这种事例,偏激的人会说,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其实,历史经验是不会误事的,误事的还是历史经验的不足和对历史经验的误用、错用。如何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区别,研究历史经验的适用范围,把历史借鉴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避免简单类比,生搬硬套,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历史学家莫里逊这样说:“知道或认为自己知道一点前车之鉴的历史学家,有权利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即使这同他本身的信仰或社会相抵触”。^②

(三) 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指导

千百年来的自然科学研究表明了人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改造人们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使人们对自己支配控制自然的能力以及利用自然资源为自身造福的可能性充满信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人们对其自身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控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很少人会对物质财富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从技术的意义来看对于环境的控制这两方面进步的事实提出疑问。所提出疑问的是,在20世纪,我们对社会的整顿,我们对国内或者国际的社会环境的控制,是否有任何进步,是否真正没有显明的退步。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难道不是无可救药地落在技术进步的后而了么”?^③这种疑问当然有些片面,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为认识和控制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成果。然而,这一领域里的进步是缓

① 这条防线全长七百多公里,光地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就近十层,不但有弹仓,医院,甚至还有电影院。

② 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265页。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129页。

慢的，它的成果还远不尽如人意。

实现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有效预测和控制，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认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正确的认识和掌握历史运动的规律的基础上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走向自觉化，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目标、共同的责任和使命，而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提起历史规律的研究，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完成了，在这方面已没有什么可做了。其实不然。在历史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做了开创性贡献，但这并不等于说有关历史规律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了。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①也就是说，这方面的研究任务不仅未完成，而且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人干过。历史规律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运动及其规律都有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规律的研究和揭示，更是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历史学的任务》中这样写道：“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是对发现社会生活中的规律性作出贡献。只有在历史研究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发现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管是那些只适用于短时期的规律还是对许多时代都一直在起作用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通过控制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来组织社会生活。我们只有掌握了预见我们有意识行动的后果的根据，才能控制社会生活。而对支配着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会生活的规律的认识则为作出以上那种预见提供可能,并因此而为进行与我们目标相一致的有效实际活动提供了机会”。^①正是在这里,史学工作者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他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沉重的,也是令人振奋,使人鼓舞的。

(四) 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

以往的历史学家常常被描写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们与世隔绝,整年整月蜷缩在昏暗的档案馆中,冥注孤索,皓首穷经,宁愿把他们的成果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不愿以干当世公卿。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在《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一文中,写了一段很幽默的话,他说:“从长远来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各级教育越来越由公众负担经费,所以这一点也越来越真实。供养诸位的纳税人是讲求实际的。他说不定会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我们为本行利益着想不敢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答复导致纳税人得出历史并不能当做涂面包的黄油结论,他也许就会决定:既然这样,让历史也不要供给历史学家以黄油和面包吧”。^②当然,不给历史学家黄油和面包的事还不至于普遍地发生。但是,历史研究必须向一般公众显示你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是十分重要的。那种不顾经世致用,只顾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态度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时代需要史学工作者采取回响时代需要的积极态度。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开阔了史学工作者服务于社会公众生活的天地;将自己的知识、能力,运用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如政府机关、经济组织、新闻媒介、历史文化遗址和博物馆,这是现今社会对史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写道:“我们

① 托波尔斯基著,张家哲、王寅、尤天然译:《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64—665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49页。

生活在一个不仅需要从资本设备的投资中尽快获得利润，而且还要尽快地从花费大批经费培养人力的投资中获得利润的社会里，这种人力投资，期望着社会科学家构筑起有效的理论体系。运用这个理论体系，我们能够驾驭自然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改造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于这个要求，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①其实，许多史学工作者都已履行着这种责任和使命。如，1953年当国家提出根治黄河的规划后，历史学家岑仲勉研究了黄河的河流、河道的变迁、历代治河经验与利弊，写成《黄河变迁史》，为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科学的咨询服务。1958年，国家召开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研究沙漠的治理和利用，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参加了这个会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投身于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写出了一系列有关沙漠的形成、变迁、特点，历代治沙的经验论文，为沙漠的治理、利用工程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他的《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和《历史上海河流域的灌溉》论文，都是为50年代中期中央水利部拟制海河流域规划而作的。80年代以来，许多史学工作者深入地进行了国情研究、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企业史的研究，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机制的转换进行咨询服务和决策分析。在国外，7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产生了一个公共历史学分支，他们以历史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宗旨，走出学院，去政府机关，企业公司、公共机构、历史文化遗址等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的在联邦、州、地方的政府机关做决策分析，有的在企业公司里整理档案、撰写企业史，帮助企业作政策研究，还有的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管理和保护。他们的努力向人们证明：历史在任何事情上都有一定的位置。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历史不是无用，而是大有用途”。“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挑战意识和责任感，那么，就能更好地实现公共历史学家的崇高理想

①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342—343页。

为社会提供所有第一流的历史记载和史学评论……”。^①

（五）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众精神文明素质

史学在现实社会实践中能否发挥出积极的功能，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取决于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研究成果能否为提高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服务。任何一项从历史中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或按历史规律设计的方案、计划，只有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变为他们的观念，融进他们的行动，才能真正产生出实际的效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历史学家苦心研究而获得的富有现实价值的成果不能被他们的同胞所接收、认可。史学家们常常埋怨公众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冷漠、不关心，批评政治家不肯向他们请教。但是，史学工作者应该自问，自己在普及、推广历史知识、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是否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贝克尔曾批评说：“从1814年到1914年这已往的一百年中，人们进行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大量研究，研究伸展到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研究是细致的、带批判性的、详尽的。我们的图书馆塞满了大量的这样积累起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关于人类经验的可靠知识供社会使用。所有这些专门研究对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什么作用呢？它对于制止政客的愚蠢、或增长政治家的智慧是否起了作用呢？它对于启发广大人民，使他们能更明智地行动或适应某种更为理智的要求，是否起了作用呢？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确实太少了”。^②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史学工作者忽视了普及历史知识和提高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或者说，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得太少了。

① 游恒：《公共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载《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60—174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41页。

在我国，传统史学主要还是一种“帝王之学”，历史知识的普及、推广的对象主要还是统治阶级的上层，而不是一般民众。史学功用由单纯为帝王统治者们借鉴变为一般民众的知识财富，还只是近代以来的事。解放以后，史学研究的性质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在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如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历史学家吴晗提倡、组织了许多教授专家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150余种、《外国历史小丛书》近60种，以及《中国历史常识》等普及读物，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广大读者称赞他和作者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①

吴晗在《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一文中说：“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而且还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可读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使这些东西成为广大人民知识的组成部分。这样，广大人民都拥有基本的必须的知识了，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必然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提高的进一步发展。”“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我们要彻底改变文化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使人人懂得点自己的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②这一段30年前写下的话，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应为之努力的方向。

二、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崇高的社会责任和重大的历史使命，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很

① 《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04页。

② 《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08—109、203页。

高的要求。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完善自身的素养,以便能更好地胜任这种责任和使命呢?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非常重视史家自身素养的完善问题,提出过各种有关史家素养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是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和章学诚的“史德”说。

刘知几将史家必须具备的素养概括为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他说:“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囊,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①大概说来,史才是指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叙事、载言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和历史知识;史识是指见解、观点和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长”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提出“史德”说。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②也就是要求史学家具有追求历史真理的忠实心。^③又说:“大秘书者所以自秘,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他批评“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主张治史者应“气贵乎平”,“情贵于正”,“临文必敬”,“论古必恕”,史家的“心术不可不慎”。^④

才、学、识、德,基本上包括了史家素养的几个方面,只是时代不同,对史学才、学、识、德的要求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如今,作为一位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② ④ 《文史通义·史德》。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505页。

地完善自己：

(一) 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素养,是决定他的研究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理论素养方面,历史观处于主导地位,它对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研究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赫勒说：“反对利用指导性原则的历史学家犹如一个水手,决定不用地图、罗盘,甚至不听听别的水手有关海上经历的叙述,便扬帆出航”。^[1]没有地图、罗盘,当然不能出航;选用了误差极大的地图、罗盘,就会迷失方向,只有科学的历史观,才能为你的研究活动指示正确的方向,使你有可能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去逐渐地接近真实的历史实际。

像其他所有科学一样,历史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人们主要还是限于对历史现象和事实的描述、记载,虽然有对历史的联系和历史因果关系的探讨,其中也包含了一定合理性和真理性的因素,但还难于作科学系统的整体归纳。史学发展到今天,用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的最科学的历史观莫过于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历史研究不能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离开了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历史研究就会走入歧途。历史观的科学化,是要求史学工作者,以科学的历史观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活动,而不是把它当作现成的结论。恩格斯曾多次批评那种只知背现成结论而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乱贴的现象,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如

[1] 赫勒:《编史工作的指导工作》,载《文摘》1984年第3月。

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①恩格斯所指出的错误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个历史现象的阐明,往往要联系到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军事等许多学科;一件文献材料的理解,往往要借助训诂、版本、目录、古文字、古文书、校勘、辨伪等许多领域。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探讨,都无法依靠某一种方法来研究,而必须系统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广泛结合,把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当代史学的新特点,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知识结构的合理化。

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丰富多样的,除了理论指导性方法外,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很多内容,有史料的搜集、辨伪、校勘,考订的方法;还有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的方法、口述史学的方法;以及其他各种跨学科史学方法,和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化学,以及数学、历史气候学、历史生态学、地史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科中的运用。要求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包揽无遗地掌握一切研究方法是不切实际的,但熟悉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素养。

知识在历史认识中是作为理解历史现象的背景材料而发生作用的。一般说来,知识越多,他对史事的理解力就越强,也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知识狭窄、浅薄,常常使研究者的理解、洞察、想象力受到制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家罗核索·瓦拉考证出《君士坦丁圣赐》为伪造文书,靠的是他丰富的古文献、古文书、古拉丁文语法、以及历史人名、地名、官名等方面的知识;清代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475页。

家钱大昕勘正《后汉书·郭太传》的衍文，靠的是他熟谙的避讳、文理、史书体例等方面的知识；郭沫若凭借他广博的医学知识解开《尚书》中“高祖凉鬲（阴），三年不言”的哑谜。都说明了知识因素在历史研究活动中的重要性。

史学工作者的知识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但知识的海洋无穷无尽，学无止境。要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必须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首先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也要有相关的哲学、政治、思想、法律、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军事等各种社会科学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要能博能约，章学诚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悞，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面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①广博与专精相辅相成。著名史学家王国维不仅精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西北史地和蒙古史，而对于戏曲史、宋元词曲，乃至西方哲学、美学都有极深的造诣。郭沫若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诗人等于一身。广博专精兼而有之。具备这种知识结构的史学家虽然不多，但也是一般史学工作者应该效法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锤炼和增强对历史的洞察力

法国史学家布洛赫曾说：“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②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是史学的功能，后半句则说明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现实来认识以往。史学家卡尔也说：“只有借助现实，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了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实”。^③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把上述思想概括为：“现在和过去是以它们各自的光亮互相映照的。”^④

① 《文史通义·博约中》。

② ④ 雅克·勒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页。

为什么必须通过现在才能理解历史呢?这是因为现实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进化的本质在于以往人们的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并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以物化的形式留存于现实社会中,人们无法身临其境地去直接观察那已消逝的过去,但可以直接感知和体验由历史传承下来的现实,通过现实来理解历史。有关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所论述,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保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①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不仅是因为现实的社会中留存了大量的历史的残片、遗物;而且还是由于从现实充分发展的、或比较成熟的结果出发,更容易捕捉到不易为我们察觉的历史的征兆、起因等。在这里,现在是一扇窥视过去的窗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往来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历史。

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个特点,要求史学工作者具备一种透过现在去洞察历史的能力或素质。布洛赫指出:“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他还认为“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他曾详细地介绍过自己的“由今知古”的治史经验,他说:“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军队被包围,国家遭惨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亲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美丽的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呢?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以一种谨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来考察历史,那么其价值将成百倍地增长。我想,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①

史学工作者的历史洞察力,不是靠书本上而获得,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体验中获得的,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经验和阅历教会他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斯认为,那些掌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最适合做历史学家的人。在他看来,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和阅历,是历史研究中最易导致错误的原因之一。姑且不论政治家、军事家是否真是最合适的历史学家,但是波里比阿斯所体会到的史学家的历史洞察力来自他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则是正确的。布洛赫例举过他本人的一个事例,他说他曾和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刚到那里,皮雷纳对布洛赫说:“我们应先去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那里吧?”接着皮雷纳像是要消除布洛赫的疑惑,补充说:“如果我是一个古物鉴赏家,我会把眼光盯在那些古旧的东西上,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布洛赫以此例说明,历史洞

^①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37页。

察力的增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①

史学工作者应该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从现实的生活中吸取营养,培养和增强历史的洞察力。费弗尔曾满怀激情呼吁,历史学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把自己和人类生存打成一片,这样在研究和重建过去时他就能获得十倍的力量”。^②台湾学者余英时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也说:“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决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与我不相干一样。这虽也是一种态度,不过这样的史学家毕竟是少数。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受是紧密的”。^③

一般说来,史学工作者的历史洞察力的强弱或敏锐程度与他所参与的生活实践的广度、深度是成正比关系的,他参与的生活实践越广泛、越深刻,他由此而培养的历史洞察力也就越强、越敏锐;反之,一个史学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事物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么他的历史洞察能力也一定是迟钝和微弱的。在当前,史学工作者可以直接投身于农村、城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实践,或到工厂、商店、农村、工地,参加社会调查和考察活动,或到基层去探访有历史经历的老人或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考察当地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等。密切而热情地关心现实生活,投入到现实生活去观察、去体验,不仅可以使你获得许多在书本和文献中无法寻觅的历史信息,而且还培养和锤炼了你的历史感、历史洞察力。这对于一个献身于史学事业的史学工作者来

①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37页。

② 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8页。

③ 转引自干尔敏:《史学方法》,华东书局1979年版,第122页。

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

(三) 树立正确的治史态度,陶铸崇高的献身精神

作为一名合格的史学工作者,除了上述的能力和素养条件外,还应具备做学问的正确态度和精神。

首先是端正治史的目的。科学研究是一项为探求真理而进行艰巨劳动的事业,它与弄虚作假、私心邪念是不相容的。历代的史评家对治史者的目的不正、动机不纯的行为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刘知几在《史通·曲笔》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这段文字的措词虽有不当地方,但强调治史者应端正态度、纯正动机是有意义的。那种把科学研究工作当作进身阶梯,为猎取功名利禄而舞文弄墨的,甚至曲笔阿时,随风转舵的人,有时虽好像获得了一点“成功”,但最终还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还是要被人们所唾弃。要做科学家,先做老实人,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应树立的观念。

其二是要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不为利诱,不为名动,甚至为真理而献身;还要有勇于改错的勇气,不固执己见,不掩盖错误,虚怀若谷,服从事实,服从真理。

其三,富有耐心,持之以恒,不畏艰辛,忍辱负重。史学研究不同于艺术创造,不能靠一时的灵感,而必需要有长期的积累和思索的过程,即使是一个个别性的结论,也要靠大量的,批判过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科学研究要求有独创性,要提供新东西,不能人云我云,重复他人的观点。这一切都不是靠一时研究所能完成。所以,艺术史上常有少年神童,而史学史上,却少有特别早慧的天才。史料是一点一点披沙拣金似地积聚起来,论点要反复推敲、再三提炼,史学史上任何一本有创见性的、有价值的史书或论文,都是在相当长期

的学术积累和苦心思索后才完成的。史学研究的这个特点,要求史学工作者具有特殊的耐心和恒心,不急功就利,不急于求成,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涵养。

古往今来一些著名的史学著作,都耗尽了作者的终生精力才得以完成。司马迁继承父业,用了20多年的时间写成《史记》;班彪、班固和班昭父子兄妹相继,历40年撰成《汉书》;司马光等花费19年光阴完成《资治通鉴》。在西方史学史上,吉本用了20年的时间写成《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的《拉丁铭刻集成》,历时20余年才完成;汤因比辛勤笔耕40年,完成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顾颉刚在《古史辨》的《序言》里曾说到他幼年时,做事没有恒心,“十余岁时即想记日记,但每次写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笔记亦然,总没有一册笔记是写完的”。后来他下决心改,他喜欢看戏,就坚持作《论剧记》,“有始有终地写了好几册”。后来读书方面的兴致渐渐超过了看戏的兴致,又在《论剧记》外立《读书记》。^①如果没有耐心,不能持之以恒,那就不可能产生这些煌煌巨著。鲁迅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坚忍、韧长,持之以恒,也是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治史精神。

人们常常能体会到体力劳动的艰苦,总认为学术研究是案头工作,轻松省力,不会出汗。其实这是误解。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件轻松省力的事,不仅会汗流浹背,而且还要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凤栖梧》),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 (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 (当作‘却’) 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此第三境也。”其中“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① 《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等诗句，正是学者从治学的渴望，奋斗，到最后达成，其间所受的异常的艰辛甘苦的真实写照。马克思说得好：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只有那些不畏艰辛困苦，甘守清贫，忍辱负重，终生求索，献身科学的人，才有希望攀登科学的高峰。汤因比在谢世之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在黑暗中摸索》，在该文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我正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我们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①这正是古今中外一切历史学家优秀品质和献身科学精神的心声，愿每一位有志献身于史学事业的史学工作者共勉之。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 史学工作者应具备哪些基本素养？

① 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15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二、三、四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的通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72年。

庞卓恒主编，侯振彤、侯建新、田晓文副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学说集要·历史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又见《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1939年。

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吴泽主编，曹伯言、桂连义副主编：《史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

葛洪春主编，谢本书副主编：《历史科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赵吉惠著：《历史学概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

姜义华，赵吉惠，程林东，马雪萍著：《史学导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文思启主编：《史学概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庞卓恒主编，田晓文、侯建新副主编：《西方断史学述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威廉·德雷著：《历史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38年。

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1983年。

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